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鲍 闽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赵麟斌	陈伙金	鲍 闽
	林 山	陈章汉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54期2018年第1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鲍 闽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康 芬	何财铭	方 薇
装帧设计	乔 麦		
封面摄影	王晓峰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1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子邮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都文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20



尤恒盛家族盛衰史

P27



海洋世界，不仅仅是童话

P58

百岁青年一红楼
——记台江基督教青年会



世味流年

4 谢 冕

吴航寻宗记

在线读城

7 何少川

香高味醇七境茶

海丝海路

11 曾筱霞

追忆丝绸年华

17 凌 波

历史织就的丝城

20 郑 芳

尤恒盛家族盛衰史

27 章 武

海洋世界，不仅仅是童话

35 柏 荣

闽安纪事

左海风流

37 何 康

凭将一掬丹心在

43 吴韵成

忆父亲吴石最后的日子

48 张兆浩

被乔治国王授勋的福州水手

55 郑秀杰

戍台名将黄英

Contents

P63



“苍霞精舍”的前世今生

P79



关于福州水户事件

P93

油纸伞的故事



坊巷春秋

- 58 汪 兰 百岁青年一红楼
——记台江基督教青年会
- 63 李景端 “苍霞精舍”的前世今生

史池钩深

- 67 杨国桢 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 74 赵麟斌 黄 曦 钩沉历史话福州

闽都记忆

- 79 【日本】中村孝志 关于福州水户事件
陈鸿铨 译

闽都风物

- 85 林 山 穿越闽都六十年
——老福州居民生活实录
- 93 陈 丹 油纸伞的故事

- 封二 江爱松 观海阁
- 封三 黄民杰 鼓岭耸翠

吴航寻宗记

谢冕

闽江自武夷山脉发端，一路清流婉转，把八闽大地穿行成了一片锦绣。那江水从高处往低处流，谚云：“一滩高一丈，邵武在天上”邵武是福建一个县，与崇安齐名，均是闽北重镇。崇安作为一座古城，又有一个吉祥地名，现在被改了名，不复存在了（崇安现在的地名缺失了历史厚度，很遗憾，不提也罢）。闽江就从邵武、崇

安一带的山谷间蜿蜒南下，一路滋润着两岸成片的柑橘树、橄榄树，还有无边无际的由茉莉、珠兰和白玉兰组成的花海，香气氤氲地直抵省城福州，而后汇聚诸流注入东海。就这样造出了令人赞叹的东南形胜，左海风流。

我就出生在这座榕荫覆盖、花香盈怀的福州城。多年浪迹天涯，幼时在家乡的记忆渐渐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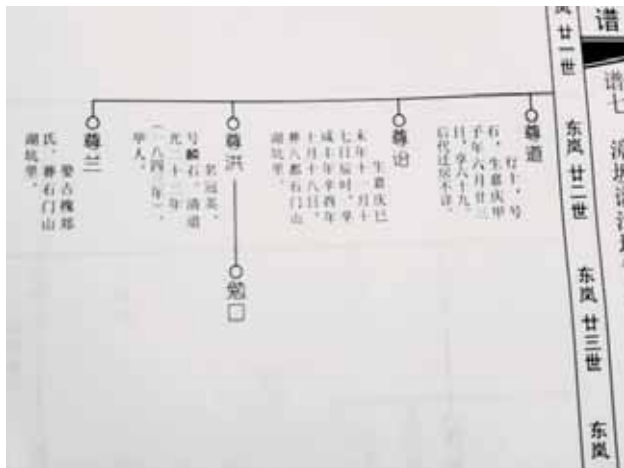
江田镇东岚谢氏支祠

糊。岁数大了，思乡心切，于是不免萌发问祖寻根的念头。就这样，一路寻到了长乐。而这番寻究，其间却有周折。记得当年，曾托友人探问自己出生地，朋友告知一个地名：旧米仓一排巷（原杭城试馆）。这“杭城试馆”却令人纳闷，为何是“杭城”？又为何是“试馆”？杭城，通常想到的是杭州，杭州是有点远了。莫非是闽西的上杭？那里有个“杭”字，舒婷写过《寄杭城》的，而我明明是生在福州，怎么跑到上杭去了？此事萦怀，一直不解。

那年长乐开作家代表大会，我和几位友人前去祝贺。会间得知，长乐为吴航旧郡，简称航城。清楚了，原来“杭”是“航”的同音字误。这样一来，我的诞生地就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所谓的“杭城试馆”应当是“航城试馆”。猜想是当年长乐人来省城应试住宿的馆所。原来我就

出生在当年乡亲来府城应试的地方，感谢先人泽惠，使我一生长下来就多少沾了点书香墨韵。遥想当年，那些从长乐挟带着东海浪花前来应考的考生中，也许就有我的先祖。

我的长兄生前留言：我们曾祖尊鸿公早年读书，中年“改仕为估”，开设茶纸行于崇安，并“船走山东”，曾置业于郎官巷。我的祖父友兰公，清时为“邑庠生”，单看友兰这名字就知也是读书人。从上面这些叙述看，我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几代都有翰墨因缘。父亲应时先生早年就学于英华学堂，诗文嘉好，写一手好字，业余参加民间诗社活动——一种自由结合的旧体诗词创作和品赏的友谊结合，在旧时福州，这种形式广泛流行于民间。父亲很有文士情怀，他为唯一的女儿（我的姐姐）起名谢步韞，是寄望于她能“步”谢家才女谢道韞之文才的。我和弟弟的名



《东岚谢氏漳坂谱》

字“冕”和“黼”，典丽而富书卷气，也出自父亲的“创意”。

那年拜谒冰心先生，与她谈起家乡。先生与我同姓，又是同乡，先生问我是谢氏的哪一个堂号，我答：“宝树堂。”先生欣然曰：“我也是宝树堂。”临别她送我一张照片。先生题款时，我屏住呼吸，心想，她可能遵当时通例，会以“同志”“同学”称我，也许更近一层，会冠以“同乡”称呼，不想写下来却是“同宗”！这帧照片对于我，格外珍贵，因为这是先生对我的家族认同，除了诗和文学的，更加上一种宗亲的。我掩不住内心的喜悦，先生的题款使我与她的心更加亲近了。论辈分，她应当是与我的父母同辈。

我的漫长寻宗之旅，就这样因“杭”“航”的辨识而停靠在东海之滨的一个码头上。这个码头，目前已是东南重要城市福州南向发展的新区。从地理上看，长乐位于闽江入海口，是个有

来历的滨海古郡。吴航者，三国时吴国航海造船之所也。这样一想也合理，对于当日的吴国而言，东海之滨的长乐远离战事中心，乃是较为安全的后方。利用长乐滨海临水的优势造船练兵自是常理。遥想公瑾当年，他的那些被诸葛先生“借”走的万千飞矢，其中应该有发射自我的祖居地长乐制造的战船的。

北京大学物理系郑春开教授，长乐人，与我同年考入北大，是我同乡又兼同窗。近年为帮我寻宗，南北信件往返频繁，终于有了结果，他的精神令我感铭。2015年6月19日《吴航乡情报》以近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郑春开的署名文章：《谢冕寻祖终有果 长乐江田漳坂人》。郑教授以学者的严谨精神，协同诸多乡亲进行“考据”，从谢氏族谱找到我的曾祖父尊洪（鸿）公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应当是自尊洪公之后，谢家的行止重心就从长乐转移到了省城福州。父亲的诞生地未曾询过，据我所知，我家的几位姐姐都是在福州诞生的。

当然，跻身宝树堂或东山堂的谢氏后裔，总乐于将自家身世溯源到王谢当年的显赫家族史上。我的长兄曾将福州祖上某宅邸的厅堂长联传给了我弟弟，这长联突出了祖先的功业：“族肇西周溯宣王祚土申伯分茅姓氏光昭垂史册；蕃支南渡羨淝水将才东山祖业功名彪炳壮旆旌”。曾游金陵故地，流连朱雀桥畔、乌衣巷口，也是这一份遥远的追思。

香高味醇七境茶

何少川

丁酉年农历五月，正逢闽省雨季。芒种节气连日雨下不停，意想不到的的是我们到罗源的两天里，老天爷作美，竟然无雨且气候爽朗，方便室外的参观访问活动。

一天下午，我们一行前往罗源城区附近的休闲农庄游览，感受农村建设的新风貌。其间，我们在茶室喝茶，泡开的茶品香高扑鼻，入口味醇，显然是好茶。于是，我好奇地问道：“什么茶？”主人笑答道：“本县生产的七境茶。”

罗源位居福州与宁德之间，福州和宁德均为历史悠久的老茶区，罗源属福州茶区，植茶同样古远，那是必然的。唐大中十年（856），杨华《膳夫经手录》即有记载：“福州茶区产福州正黄茶，不知在彼，味峭口下下，及至岭北，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清道光九年（1829），《罗源县志》载：“《崇祯旧志》云：‘茶，诸山皆有。’”茶之发现在中国，在中华大地宜茶区逐渐推广发展，成为一个大产业。农业社会农民以种茶制茶为生计，这是普遍的现象，可以说茶叶生

产救活了许多人，也富裕了不少人。自古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俗语：“千杉万松，一生不空；千茶万桐，一世不穷。”罗源也有过这样的茶谚：“吃粮凭薯禾，用钱靠茶林。”“吃了清明茶，眼睛才会亮。”“家有一坪茶，不愁没钱使。”可见罗源县有茶之古老。茶叶生产在农村范围之广泛，这本是我所知晓的，但我孤陋寡闻，不了解罗源有值得称道的地产好茶，由此引起探究的兴趣。

我访问了罗源县农业局副局长肖鹏、罗源县茶技站站长江月平和福建七境茶业有限公司黄月



萍。特别是县茶技站提供一些材料，让我得到了有关七境茶的一些认知。

为什么取名“七境茶”？对所谓的“境”，《辞海》有一解释：“地域；处所。陶潜《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七境茶最早产于罗源县中部偏西的西兰乡一带“七境”，旧地名为程洋境、长弯境、施灞境、西竹（西兰）境、廷洋境、寿桥境、洪洋境，覆盖 21 个自然村。我国有给佳茗命名的习俗和传统，取名五花八门。有以故事传说的，如大红袍、铁观音；有以品质特点的，如佛手、肉桂；有以貌状形象的，如绿雪芽、白芽奇兰；有以地方标志的，如龙井、普洱，等等。七境茶取名，正是罗源七个境堂生产的茶叶，因此也称“七境堂绿茶”，又由于品质优良，别号“罗源尖子”。

古时七境茶的成名，当然需要靠茶农的辛劳养护，但它似乎没有如近现代出现的名茶，是由茶叶专家或茶农精心选育培植出来的。它独特的品质，更多靠的是自然环境和条件的优越所使然。

中国茶界专家依照气候、土壤、地形、地貌、植被、水文条件等生态环境，把适宜茶正常生长发育，并能基本满足茶树生理活动要求的区域，划分为“最适宜区”“适宜区”“次适宜区”和“不适宜区”四个等级区。根据分析，罗源地理位置特殊，坐落在福建省东部沿海，境内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位处中亚热带农业气候区，气候温和。昼夜温差大，对茶叶内含物质的积累非常有利，所产茶叶香高味醇；就土壤而言，罗源宜茶山地均为透水性好的红、黄土质，土层深厚，肥力较高，非常适合茶树生长；地形地貌奇



云雾缭绕的鹫峰山脉



异多样，境内山峦起伏，溪谷纵横，地形复杂。地貌主要为流水地貌类中的火山岩低丘、花岗岩低丘、火山岩高丘、花岗岩高丘、火山岩中山、花岗岩中山、山间盆谷等类型。由于地貌构成异常多样，原生植被种类繁多，森林茂密，云雾缭绕。加上全县六大河流 13 条支流交错分布，一年四季雨量充足，显然为植茶的理想地方。如此不可多得的优良自然生态环境，罗源无疑最适宜种茶，它也是造就“七境茶”独特品质的重要基础。

追本溯源，七境茶的问世，应该提到一位古人，他姓宋名滨。宋滨，南宋末期人，官至太尉，人称宋太尉。宋王朝灭亡后，他逃迁罗源西兰乡隐居，以种茶为生，其祖屋地名如今仍叫“宋厝垄”。宋滨种茶收获颇丰，认为这是一处适宜广植茶叶的地方，便力劝周边七境的农民种植茶叶，并把茶叶生产技术传授给他们。此后，茶叶生产在七境一带逐步发展，所产茶叶销往外

县，得到顾客的喜爱。于是，种茶制茶卖茶成为七境村村户的主要产业，生活依靠的来源。其实，古人也是有品牌意识的，因为自己地方生产的茶叶品质优良，有别于其他一般的茶叶，可以卖出更好的价钱，七境一带群众便约定俗成，把本地生产的茶叶，称为“七境茶”而叫响。宋滨为七境茶的诞生和扬名，功不可没！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七境茶还被作为名茶为我国茶叶学家们所注

目，选入典籍给予介绍。《中国名优茶选集》对七境茶有记载，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茶叶大辞典》也有“七境茶”的条目，写道：“七境堂绿茶，产于福建罗源西部七个村的条形炒青绿茶，每个村为一‘境’，每个境包括一些小村落，七个境共建有泰山庙称‘七境堂’，故名。采摘一芽一叶，经摊放、杀青、揉捻、烘干制成。条索油绿稍灰，香高味醇，具有自然花香，主销国内各城市。”进入名茶行列的七境茶，值得人们珍爱。

经历 700 多年延续的七境茶不断完善，宋代之后更加重视制茶工艺，茶叶制技日趋臻佳，品质逐步提升。这是七境茶直至今日，依然不失风采的重要原因。明朝时期，七境茶区一直沿用炒青制法。明代茶人罗廩（1537—1620）所著《茶解》“制”篇中，曾对炒茶做法做了介绍：“铛宜热，焙，铛宜温。凡炒止可一握，候铛微炙手，置茶铛中札札有声，急手炒匀。出之箕上，薄摊



用扇扇冷，略加揉捻。再略炒，入文火铛焙干，色如翡翠。若出铛不扇，不免变色。”（见《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明末清初，七境茶经过制作实践探索，以一般炒青工序为基础，略有改进。在初炒下锅摊凉后，复炒前期高温爆炒，使干茶产生爆点，后降低锅温炒至足干，从而形成独特的加工工艺。

1969—1973年，七境茶区大部分改制烘青绿茶；1974年后，又恢复炒青制法；1981年，由原来的纯手工制作，改用新工艺机制。新工艺机制的七境茶，不仅产量成倍增长，而且保留了原来历史名茶特色，品质又有了较大提升，受到茶叶专家赞赏和消费者青睐，在全国和省内多次茶叶品评会上，荣获名茶优秀奖或一等奖。七境茶原种于2011年6月，被列入福建省原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对象。2012年3月，荣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登记；2014年7月，通过农业部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据统计，2016年底罗源县共有茶园面积达4.35万亩，其中七境茶园3.2万亩。七境茶园占据罗源茶园大半壁江山，

是农村经济的重要产业，造福于广大农民。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借用晋陶渊明诗句）知恩图报，这是一种传统美德。正因为南宋末期宋太尉宋滨的发端，才有了以后饮誉茶界的七境茶，“七境”群众永远缅怀他。为纪念宋滨，明永乐十五年（1417），在西兰境首建宋太尉宫，随后又在其余六境建了六个宋太尉宫。到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七个境地的村民集资筹建了“泰山庙”，坐落于七境七个古色古香的太尉宫正中，群众俗称为“七境堂”。每年清明节当天，“七境”和邻近乡村的善男信女，都会到七境堂点香跪拜，祈求宋太尉在天之灵保佑茶叶丰收，让茶能卖出个好价钱。这一罗源茶区特有的民间茶俗，年复一年传承至今。

近年来，罗源县把大力扶持茶产业，作为农村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继续发挥七境茶的品牌带动作用外，又培育出已通过福建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榕春早”地方茶树新品种。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将使罗源县茶叶生产，展现出一个更加开阔的前景！

追忆丝绸华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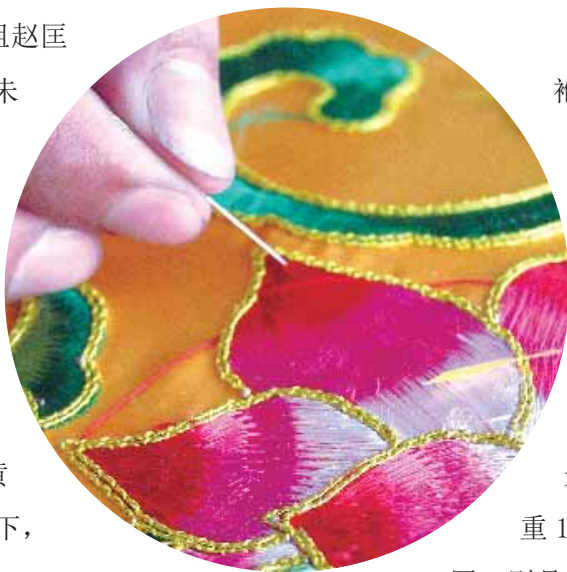
曾筱霞

1242年，16岁的黄昇想必是当时福州城内最美丽最幸福的待嫁新娘。作为黄家最小的女儿，黄昇深得担任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父亲黄朴的疼爱。黄朴为自己的掌上明珠悉心安排了这门亲事：对方是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一世孙赵与骏。女儿未来的公公、宋室南外宗正司事早早就送来了大量的绫罗绸缎和华衣美服给未过门的孙媳妇。主管泉州海外贸易的黄朴自然也为女儿筹备了丰富的嫁妆。

处于碧玉年华的少女黄昇在祖母和诸多仆人的帮助下，正在整理自己出嫁的衣裳：

这件绛黄罗镶金广袖袍合领对襟是祖母特意为她选择的出席重要场合的正式礼服，身长过膝，领、襟、袖沿及下摆都缝有花边，纹饰有彩绘鸾凤及印金蔷薇花等，布料采用轻薄透气的

罗。最大的特点是宽大的两袖。在宋代地位低下的女性不允许穿大袖的衣服。黄色是天子皇族的御用颜色。这套礼服很符合黄昇即将成为皇家媳妇的尊贵身份。



这件紫灰色绉纱镶花边窄袖袍则适合日常穿着，上面有彩绘的百菊和印金的芙蓉和菊花。虽然整件衣服的用色颇为素雅，但印金与彩绘技术的结合，使得这件袍子在阳光下显得绚丽多彩。

而这件一件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不到半两（仅重16.7克），薄如蝉翼，轻若烟罗，则是福州当地最为出色的能工巧匠

特意为这场婚礼精制而成。

这件褐色罗印花褶裥裙，下摆呈弧形如扇状，上接横腰，两端系带。整体裙身上窄下宽，能够很好地凸显纤细的腰身，而且长度未及地，

便于展示小巧的三寸金莲。裙子由麻制成，透明轻薄的质地，展现了罗裙“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纚纚云轻”的飘逸灵动，再加上采用当时福州特有的印金工艺，在疏密有致的褶子上印有金色圆点小团花，走起路来，裙摆弱柳扶风，印金小花随之灵动闪耀，给人以轻盈娇俏之美……

黄昇最爱各式各样的鲜花，她对衣物的选择足以体现她对花卉的喜爱：绝大部分的衣物都以生动活泼的花卉纹为主：以复瓣的牡丹、芙蓉为主体的大朵花卉，点缀上梅花、海棠、四季花一类的小巧花蕾，大花小花缠枝怒放，丰满而典雅；或者在叶瓣中填以各种碎花，以达到花中有叶、叶中有花、花叶相套的奇特效果。这些花卉的表现往往采用精妙的刺绣工艺与复杂的印金、彩绘相结合，在素色的纱罗布料上更显高贵典雅。

抚摩着这些精妙绝伦的衣裳，感受它们的细腻柔滑，黄昇体会到来自父亲和夫家的爱意，将

要嫁为人妇的憧憬与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待充盈着整个少女心房。

令人意想不到的，属于这位妙龄少女的幸福时光却是如此的短暂。

嫁到夫家还不到一年，年仅 17 年的黄昇因病匆匆告别人世。她那悲痛的父亲和显贵的夫家，选择将她盛装入葬：给她梳好高耸的发髻，用 3 支镏金银钗和 4 枚角篦来装饰如云的青丝。为她画好清丽娇俏的妆容，再层层叠叠地为她穿上了生前最喜爱的衣物：抹胸、围兜、无袖牡丹花罗背心、窄袖背子、宽袖对襟袍、百褶裙、黄褐色绢袜、开裆裤、开裆夹裤、合裆裤、开片裙褐色提花罗平底翘首鞋。更为黄昇披上了凸显其身份的素罗地单面绣花霞帔，上面绣有由 18 种鲜花萦绕组合的两行花纹，帔的下端系扁圆形浮雕双凤金饰坠。最后在颈部挂上由上好木料制成的念珠 2 串，胸前系好心形的镏金镂空银香薰，佩



黄昇墓出土的一年景花卉绶带及双凤纹金佩



黄昇墓出土的褶子：可以当做常服（公服）以及次于大礼服的常礼服

绣花绶带，最后覆盖上面巾……庄严华美得犹如出席一场隆重的盛宴。

为了让这位早逝的佳人更好地适应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他们为她精心周到地准备了当时女性所需的诸多服饰，小到香包、香囊、荷包、卫生带、裹脚带，大到各式各样、不同季节的上衣下裳。在她的右手边还放了一柄精美的团扇。除黄昇身上裹殓的之外，还准备了非常多未裁剪的绫罗绸缎，以备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裁衣制裳之需。

1243年，这些华美的衣物带着亲人的爱与祝福，陪伴着这位来不及盛放就早早凋谢的17岁少妇，一同尘封于黑暗的墓穴中。

1975年，福州市北郊新店镇浮仓山考古挖掘现场，这里原计划为福州七中的建筑工地，在挖掘过程中，工人们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打开棺盖，爆满得几乎要炸裂的各类织物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经过清点，棺木内女主人服饰及丝织品有354件之多，其中服饰201件，高级织物与面料153件，衣物种类之多，质量之高，世所罕见！根据墓室中的墓志铭记载，这口棺木中埋葬的正是近千年前那位早亡的贵妇黄昇。

这位近千年前的少妇用她的惊艳，用她华美精巧的衣服，将世人带回那个流光溢彩的丝绸华年。

福州先民自古便是精于纺织的族群。

早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闽江入海口的福州昙石山先民就有了发展出相当水平的纺织技术。在昙石山出土了各式各样的陶纺轮、骨锥、骨

针、贝针……各种纺织工具一应俱全。其中仅陶纺轮一项就有菱形、算珠形、圆饼形……大大小小、形制不一，不同的形状适应纺制各种不同规格品种的需要。《尚书·禹贡》中提到：“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意思是东南沿海的人们穿着植物纤维制成的衣服，用筐装着“贝锦”，用包抱着橘子柚子，沿着江海到淮河泗水一带进贡。这里的“贝锦”可能指的是木棉织物。闽人将木棉称为“吉贝”，是闽人重要的纺织原材料。元初在福州设立的“江南木棉提举司”，可见这一区域在木棉纺织业上的重要地位。

从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包括福建在内的东南“岛夷”就拿着“木棉”纺织品进贡给中原朝廷，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中记载闽越王以精美的纺织品作为赠送内地诸侯王的特产，可见古闽人非凡的纺织技艺。

除了木棉之外，麻在福州也广泛种植，县县出产，连江、福清、永福“出麻布尤盛”。昙石山先民就已经有了用麻布树皮制成的“卉服”，黄昇墓出土的纺织品中三分之二是麻纺织品。麻透气轻薄，非常适合福州炎热的夏季。

闽越国被汉武帝所灭后，不甘被迁徙流放的闽人一部分逃亡于江海，他们自称为“泉郎”或“白水郎”，后人则称他们为“疍民”或“曲蹄”。除了从事渔业、水上运输业之外，疍民女性还纺织出一种洁白柔滑的纺织品与陆地汉人们

进行交易。充满浪漫想象的文人们将这种纺织品称为“蛟绡”。“蛟绡”一词后来成为中国古典诗词中重要的唯美意象。

晋朝时入闽汉人带来了蚕桑和不同于闽地的纺织技术。

这是泉州开元寺最引以为傲的千年古桑树。这棵已有 1300 多年历史的古桑树只是福建纺织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因福建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所赐，当时当地一年可以收获八次的蚕茧丝绸产量已位居全国第二位。当时福州已大规模地养蚕缫丝。据《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载：南朝时，福州西门外洪山桥上游的甘蔗、竹岐、上街等乡，居民以种桑为业者不下数千家，种桑养蚕，每月出丝 5800 市斤，所产之丝输出各地。闽江两岸有桑田 1 万多亩，年产茧 400 多吨，是福州地区蚕桑主要产地，为福州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朝时福州已有缫丝纺织业了，那时福州所产的绵（即丝），质量比东南诸郡所产的丝都要好。

自宋以来，宋、元、明三朝都在福州设立专门管理丝织业生产外销的专门机构——文绣局。到南宋时，掌管皇族内务与外贸的中央机

关——“西外宗正司”更是直接迁到了福州，同时也在福建各地设立官营纺织作坊，进一步提升福建的纺织业技术水平。

在中国纺织史上，估计没有一个地区像福建这样各类织品层出不穷地引领不同时期的世界时尚风潮。

自南宋起，福建与蜀地、江浙齐名成为全国三大丝绸纺织中心之一。福州则是福建纺织业的重镇。

黄昇墓随葬的这批丝织品广泛运用泥金、印金、贴金、彩绘、刺绣等装饰技法，这些技法与国内其他地方已出土的宋代丝织品有所不同，说明福州的织造技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1986 年 8 月，福州市郊茶园村发掘的“端平二年”南宋墓，再次出土了 200 多件极为珍贵的

丝织品。最为珍贵的是在这批随葬品中出现了失传多年的四经绞罗技术。这是中国古代织罗技术的最高峰。该技术在福州重现人间绝非偶然。唯有在当时被誉为“丝城”的福州才最有可能掌握这一技术。

在历史上，福州的刺绣工艺也曾声名



1915 年曾明的榕绣《马》，获得美国旧金山世博会金奖

远播。

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一幅刺绣作品惊艳全球。这是一匹栩栩如生的“马”，特别是光亮细腻的光泽令人不禁想要上前抚摸。创作者卓越的技艺打动了苛刻的评委，于是刺绣作品《马》脱颖而出，成为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的金奖获得者。

这幅目前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传世珍品，其创作者便是当年福建省女子职业学校的女教师曾明。她在福州传统刺绣技艺——榕绣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发明一种“仿真彩绒绣法”。她用比头发丝还细的数种彩色丝线，一针多线往返穿梭于画面上，让刺绣上的骏马“活”了起来。

榕绣在1915年世博会上大放异彩绝非偶然。

榕绣，其特点是针法多样，色彩华丽，技艺精湛，富有艺术感。其中“金绣”是榕绣的代表工艺，对手艺最为考究。清代康熙年间，榕绣传至台湾，至今在台南仍有榕绣绣坊。台南的应用科技大学，设有全球刺绣中心，榕绣仍是研究主题之一。

榕绣的卓越不凡，除了依托福州千年刺绣纺织工艺，更是吸收各种海外技艺兼容并蓄的成果。

福州人崇拜的刺绣女神是一位来自琉球的女子——蔡红姑。相传她为闽人三十六姓之后，在琉球当地学习福州、琉球和日本三地的刺绣技艺，结合其所长，自成一家。她所绣龙袍得到了明朝万历皇帝的赞赏，万历皇帝特下诏赐见琉球国绣龙袍的少女。蔡红姑来华途中，船行至闽江

口外，台风突至，紧急避入长乐梅花港。此后便在此地传授针法，将日本和琉球的刺绣技艺传入福州。由此，福州的刺绣技艺得以更上一层楼。

除了纺织、刺绣技艺超群之外，福州的颜料印花技术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成语“青出于蓝”中的“蓝”指的是可以用来做染料的蓝草，蓝草是福建重要的经济作物。自南宋起“福州而南，蓝甲天下”。元代，朝廷还在福州和泉州二府设立织染局，管理丝绸印染业。除了蓝草，闽江上游也盛产黄色的染料——姜黄。优质的染料为福州的纺织工艺独步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唐代起，福州便已经出现了以鼓楼—安泰河为中心的纺织作坊集群。到了宋元时期，福州纺织作坊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以至官营的纺织作坊都落户福州。朝廷在福州设文绣局，管理纺纱、织布手工业工场，相传文绣局下属的作坊有匠人五千，负责“织编供御”。今天鼓楼区的织缎巷、锦巷、横锦巷及花巷，皆因织户密布而得名，当时正是“文绣局”之所在。三坊七巷光禄坊这条“机房里”的小巷，便是明代织造遗址。这些地方都曾是福州织造作坊的集中地。这些地名无声见证着福州纺织业曾经的辉煌。

王世懋《闽部疏》记载：“凡福之细丝，漳之纱帽，泉之蓝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

这种“衣被天下”的豪情，唯有同时作为纺织业制造基地以及外贸港口的福、泉、漳方能做

到。郑和下西洋，自福州长乐五虎门扬帆，福州纺织品更是随着郑和船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昙石山出土的陶纺轮绝大部分出现在女性的墓葬中，说明从那时起福州当地从事纺织业的主要为女性。随着福州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及海丝沿线各国对福州纺织品的高度需求，改变了以往“男耕女织”的传统产业格局。据明朝首辅叶向高的《家谱列传》记载，当时从事丝织的，除家庭妇女外，还有男子参加，人们皆“以机丝致富”。大量男性能工巧匠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福州本地纺织业的专业化水平。明朝弘治年间，福州一位名叫林洪的民间织造工人首创“改机”，将原来5层的织机改为4层。这种纺织机器最大的特点就是能织双面有花的锦缎，不仅色彩丰富，图案富于变化，且质地轻薄。这一工艺的革新对中国纺织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福州作为“丝城”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宋端平二年墓、黄昇墓、明代马森第二夫人陈妙祯墓出土的各类丝织品共700多种，品种有丝、纱、罗、绢、绫、绸、麻等，工艺有贴金、描金、印金、刺绣等。福州以丰富精美的丝织品文物向世人再现了那段流光溢彩的丝绸华年，诠释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无上荣光。

遗憾的是，福州纺织业的辉煌终结于清代海禁时代。清廷镇压郑成功反清，福建累遭“海禁”“迁界”等严酷的经济封锁，与福州丝绸业息息相关的海外交通路线被人为切断，极大地影

响了福州纺织业的发展，曾经名扬天下的福州“丝城”辉煌不再。

福建官民为“丝城”复兴继续努力。清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在福州耿王庄（今南公园）设立“桑棉局”，1885年左宗棠卒，后人在南公园门口建“左公祠”纪念他。光绪年间（1875—1908），一些有识之士再次想振兴恢复福州丝织业，“奖励工艺”，设立“桑棉局”“农桑总局”“蚕桑公学”等，但无奈时不我与，福州城那段流光溢彩的丝绸华年已经一去不复返，成为海丝发展史上一大遗憾，空留后人无限的追思。



长乐梅花镇蔡夫人庙

历史织就的丝城

凌波

走在福州鼓楼区的大街小巷，就会发现许多小街小巷与纺织有关。如锦巷、横锦巷、织缎巷、花巷、机房里等街巷的地名牌。翻开史书一查，原来这些街巷都与福州城一段辉煌的丝绸纺织历史密切相关。

西晋永嘉二年（308），中原纷乱，豪门林、黄、陈、郑、詹、邱、何、胡等八姓家族入闽避乱，史称“衣冠南渡”，其中不少定居今福州市鼓

楼区。蚕丝业也随之传入，甚至已可以生产彩缎。

西晋中原蚕丝入闽

据《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载：南朝时，福州西门外洪山桥上游的甘蔗、竹岐、上街等乡里，居民种桑为业者不下数千家，种桑养蚕，每月出丝 5800 市斤，所产之丝输出津（天津）、申（上海）各地。闽江两岸有桑田 1 万多亩，年产茧 400 多吨，是福州地区蚕桑主要产地，为福州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致南朝时福州已有缫丝纺织业了，那时福州所产的绵（即丝），其质量比东南诸郡所产的丝都要好。

隋唐时期，福州纺织业进入发展时期，并达到一定水平。一方面由于唐代福州港开通海外航线增多，丝绸成为对外贸易重要商品；一方面是因唐代实行租庸调制，百姓愿以布帛纳赋，纺织业成为不可



织缎巷

缺少的家庭手工业，个别地区还出现一些规模可观的丝织业作坊，集中于今鼓楼安泰楼一带。唐代《唐六典》中将当时全国产绢分为八等，福州所产的绢品每年均作为进贡朝廷的地方特产。《元和郡县志》载，开元年间（713-740）“建州贡金花练，福州赋绵绢”。五代时，福州缣丝纺织技术又有很大的发展与提高，当时闽王王延钧所用的“九龙帐”，就是以极高的丝纺技术织成的。

宋朝，特别是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之后，对福州手工业品有较大需求，促使福州丝绸业较快发展。当时福州有了“丝城”之称。伴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南宋时代福州的颜料印花技术已达相当高水平。据《闽部疏》明万历十五年（1587）序所记，南宋时中国染料的生产已形成地域性，“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蓝则以福州、泉州等地最著，“福州而南，蓝甲天下。”

元代，朝廷在福州设文绣局，管理纺纱、织布手工业工场，“织编供御”，有较大的生产规模，传说文绣局有匠人五千。文绣局就设在今天鼓楼区的织缎巷，锦巷、横锦巷及花巷皆因织户密布而得名。宋、元时期，福州的植棉和手工业棉纺织业也进入鼎盛时期。木棉种植区域不断扩大，产量倍增，自纺自织的家庭纺织业相当普遍，蕉布、葛布等纺织品产量大增。元初设立“江南木棉提举司”，植棉业大为普及。元代，朝廷还在福州和泉州二府设立织染局，负责管理丝绸印染业。

宋元时期，福州纺织业发展水平甚高。《资

治通鉴》胡三省注：“绵（即丝）布福州较江南丽密。”1977年从福州晋安区新店镇浮村发掘的南宋黄昇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就达354件之多。福州南宋墓出土的大量古代服饰普遍镶有绚烂夺目的花边，其狮子戏彩球纹样是应用镂空型版印花及彩绘等工艺，属多种颜料印花制品。这类花边面积虽然不大，但在印刷技术上充分吸收汉唐以来的工艺特点，在纹样设计上又摆脱汉唐时代的图案风格。

福州丝织远销海外

宋元时期，福州丝织品远销海外，朝廷设“万户海船府”管理海上贸易。到了明代，福州成为全国三大丝织中心，福州府有专设的织染局以及后来分设的织造局，真丝交织品在明代福州已有生产，当时福州生产的茧丝交织的缣丝布，甚受欢迎。郑和七次下西洋，又把“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推向高潮，每次下西洋均带大量福州纺织手工产品与亚非各国进行交换，从而带动福州与海外各国丝绸交易区域与交易量增加，也促进了福州纺织业发展。明成化七年（1474），市舶司自泉州迁往福州，福州与海外丝绸贸易更加活跃。弘治年间（1488-1505），福州民间织工林洪改革原五层织机为四层，名为“改机”，能织闪色阴花等类绸缎，以及飞禽走兽、福、禄、寿、喜等字、画图案，福州“丝城”之名更盛。王世懋《闽部疏》记载：“凡福之细丝，漳之纱帽，

泉之蓝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

清初，福州纺织业仍有发展，产品除销往外国和提供福州本地市场消费外，还有部分转运到宁波、乍浦、天津、益平以及台湾、香港一带，这也是时至今日福州“榕绣”依然活跃于台南一带的原因。

清代，清廷镇压郑成功反清事件，福建累遭“海禁”“迁界”等严酷的经济封锁，与福州丝绸业息息相关的“海上丝绸之路”被切断，至此，福州纺织业在全国地位明显下降，曾经名扬天下的福州丝城成了历史。

但福建官民还在为丝城复兴继续努力。清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在福州耿王庄（即今之南公园）设立“桑棉局”，目的在于促进福州地区种桑养蚕事业的恢复与发展。1885年左宗棠卒，后人在南公园门口建“左公祠”纪念。人们还在园内荔枝亭上撰楹联：“亭馆问谁家数里莺环排绿树；蚕桑兴美利沿村衣被胜黄绵”，寄托对左宗棠提倡养蚕种桑，热心恢复和发展福州纺织业的兴国之举的怀念。光绪年间（1875-1908），一些有识之士力图振兴恢复福州丝织业，制定“奖励工艺”等举措，设立“桑棉局”“农桑总局”“蚕桑公学”等，但卒无成效。



福州南公园，闽浙总督左宗棠曾在园内设桑棉局

尤恒盛家族盛衰史

郑芳

这是福州商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庞大家族，其一处老宅就曾经占据着三坊七巷里文儒坊至衣锦坊的大片位置，人称“尤半街”。这个家族富足近百年，鼎盛时期的尤恒盛丝线店、百龄行百货商店等十几家企业一度处于福州城同行业的翘楚位置，经营者精明大胆而又不失谋略，专人掌控着货源、零售、批发、染布等延伸业务的完整业务链，而钱庄、汇兑行等金融机构又为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即使是现在，这缜密的经营思路也不得不让人瞠目。这个家族近百年跌宕起伏的生意，在组成自身繁杂冗长的家族史的同时，也被编进福州的商业发展史，同时嵌入几代老福州关于丝线、关于百货的记忆。

这也是一个逐渐消隐于人们视线的家族。寻访三坊七巷里的老住户、福州市百货公司的老员工，没有几个还记得这曾经的工商豪门。

2004年，重回尤家老宅，79岁的尤琪琛老太太——曾经掌控着这个家族后期重点企业百龄百货商店的尤德龙之女，也已经很难再找回往日的痕迹，记忆中的宅院早已面目全非，多次分隔后各自建起的或高或低的新村里，住着无数外姓

人。“连个旧邻居都找不到了。”能勾起尤老太太一点回忆的，仅剩藏在新村中几座保留着雕花木床、旧房梁的老房子，和一棵曾经种在一进花庭的茂盛白玉兰。



摄于2016年5月，福州衣锦坊。左边红灯笼处是改造后对外开放的“尤氏民居”

“过去的都过去了，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再问，就算是都记得，也没有兴趣了。”尤老太太的先生洪老说，他的儿子从没问过家史，再往后，也许更不会有后代对已经成过眼云烟的家族史感兴趣了。

十年后，2015年11月，再寻访尤老太太曾经居住的位于福州广达支路的一套单元房，已物是人非。小区里认得尤老太太的邻居说，老人和她先生在养老院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两年时光，几年前已相继去世。夫妇俩曾经居住的房子也已出租。

尤恒盛的资本积累

尤家并非地道福州人。尤家原籍浙江省吴兴县，其祖先开始将家族迁到了福建省罗源县的鉴江，后来迁到了福州洪塘乡。明末清初，尤家又从洪塘迁到福州城内兰蒨里。

尤孟彪是尤氏家族庞大产业的创始人。这个在家中三个兄弟中排行第三的男子出生于清朝嘉庆年间。能知道的只是，尤家的家境并不富足，尤孟彪的父亲很早去世，之后的尤家生活陷入困境。不久，尤孟彪辍学去了福州春育亭缫丝铺子学艺。因为勤奋钻研，学到了一套好手艺。没过几年，这个年轻人就在南街安民巷口摆了个丝线摊子谋生。

据说，尤孟彪制售的丝线质量优良，人又和蔼可亲，生意也做得一帆风顺。在积累了一些钱

后，便开了一家尤恒盛丝线店。这家店最早是设在文兴里，后来因为业务发展，又迁移到了安民巷口。据尤家后代回忆，这家店开业约是在清朝嘉庆年代后期。

尤恒盛丝线店刚开始只是做零售业务，不久便业务繁盛，每天还没开店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农民和刺绣制花的手工业者在门前等待，这种盛况一直传到尤家第四代才逐渐减少。

好生意让尤恒盛的资金积累很快。当时，尤孟彪曾和一个名叫刘文灿的在南街合开过一家鼎盛布店，还和一个叫许长康的合开了一家盈丰钱庄，后来因为兼顾不过来，把店让给了许刘两家，以集中精力经营丝线生意。

这样，尤恒盛的生意很快从零售发展到了大宗批发，批发地区一直扩展到闽中、闽东、闽南各县。而营业的兴旺，更加速了尤恒盛资金的积累。

二代房东的人事变化

1817年，30岁的尤孟彪结婚。这个晚婚的父亲陆续有了五个儿子：贤赞、贤良、贤坡、贤建、贤模。

只是，贤模出生不久，尤孟彪去世。之后，尤恒盛业务由长子贤赞接替；二儿子尤贤良中举后开始热衷于功名，不问业务，尤家的公共商业便由他的儿子庆钊参加；三儿子贤坡、四儿子贤建也都参与店里的经营管理；但最终将父业发扬



摄于2005年3月，站在旧时的白玉兰树下，尤老太太已找不到尤家老宅的旧迹

光大，把尤家商业推向黄金时代的是五儿子尤贤模。

尤贤模从小就在店里跟着大哥勤学苦练，学到了一整套的丝线加工技艺，而且熟悉到只要用鼻子一嗅、手指一捏，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判别出丝的产地、品种以及质量的好坏。

关于这个尤家五公子，之后做了尤家的女婿，并多年管理尤家百货业务的陈承椿曾经在回忆录中记载：“自奉简朴，工作吃苦耐劳，事事躬亲，参加各道加工工序，经常往各县推销业务，

又能同职工同甘共苦，数十年如一日。”如此性格与行事风格对尤恒盛企业不断发展起了直接的作用。

尤贤模兄弟为谋求尤恒盛业务的扩展，首先运用丝线染色加工的基础及资金增长的能力，扩展了代客染布、承揽殡殓用的刺绣寿衣、批发本行之外的棉纱、棉布、药材、南北货等业务。针对逐渐多起来的业务，尤贤模兄弟重新进行了分工：老大贤赞总管全面，店后批发业务由老三贤坡管理，丝线业务由老五贤模管理。不久，贤赞双目失明，贤坡、贤建又相继去世，尤恒盛的人事又由贤赞主持重新进行了分工：店后批发业务由贤模管理，丝线业务由贤良之子庆钊管理。

频繁的人事变动多少让尤恒盛的发展受到影响，据说，尤家家业在这段时期无明显长进。

临危掌舵的尤家五房

几年后，全面掌管尤恒盛的尤家长房贤赞去世。尤家第二代只剩下二房贤良、五房贤模，三代基本已经长大成人。自此，尤家家业进行了再次的分工。

此时，尤恒盛丝线店是尤家家业中利润最多的，店里的事务由二房贤良的儿子庆钊主持管理，庆钊死后转给其子德建。尤德建，这个尤家第三代中最早担当重任的男子，却并未承袭尤家前辈开拓务实、深入产区收购的经营之道，他的经营作风是坐等丝贩上门。不久，尤恒盛丝线店

的货源日渐稀少，门庭若市的场景风光不再，甚至一度连正常业务都不能维持，经营出现欠负。

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尤家最担忧的是五房尤贤模，他认为这是尤家的祖业，而且丝线生意大有可为，出现此现状是经营不当的结果。不久，贤模便接过了已经负债累累的永恒盛丝线店。

尤贤模这尤家第二代，葆有父辈诚信经营基因，他做生意讲究货真价实，永恒盛丝线店很快就又获得了顾客的信任，扭转亏损局面，并逐渐拓展到了其他的业务上。这段时间，贤模加强了后进尤祥记批发业务，除经营棉纱、绸布、颜料之外，另外开设了染料加工场；看到百货业有利可图，又利用余资在老店附近开起了一家五云楼百货店，并兼营丝线、绸布批发业务；不久后，又在黄巷口开了一家五都百货店。

除此之外，尤贤模在尤家事业发展史上的另一重要作用是——他将四个儿子培养成为尤家事业的能干继承人。尤家的事业在贤模的四个儿子庆潮、庆桐、庆棧、庆樨手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长子庆潮本来是读书人，早年中过副榜举人，三子庆棧也进过学堂，但都因为永恒盛的营业日益扩大，人手紧缺，遂从父亲意愿放弃求学之路，回来经商。据史料记载，在贤模退居二线时，尤家的五都百货店就开始由四子庆樨管理，三子庆棧则坐镇永恒盛老店。而这两家企业，在当时的福州，都是家喻户晓的名牌商店。

五房系制造的全盛期

尤家家业在尤贤模派下得到了极速增长——业务扩大，利润猛增。

在善于经营的尤贤模指导下，清朝末年，尤家又在上杭街开设了一家尤信记商行，由他的四个儿子合伙经营，庆桐负责管理。这家店经营百货、药材、南北土特产的批发业务，生意兴旺。根据史料记载，该行仅在1911年就赚得利润10万元。20世纪20年代初，庆潮四兄弟又在上杭街开设泉裕钱庄，发行“台伏票”，不久在潭尾街及南街开设泉裕分庄。这泉裕钱庄由尤庆桐的大儿子尤德权掌管，当年钱庄发行的台伏票票额，一般都达到30万元，利息按1.65分计算，一年仅利息收入就有4万多元。同时，发行纸币也在无形中为尤家提供了一笔可观的流动资金。

当然，这也为五房尤贤模派下业务的第一次分家做了铺垫。实际上，尤庆桐的私房钱还用于经营一家有和丰钱庄。后来，庆桐看到经营钱庄会积累更多资金，就只愿意和几个兄弟合伙经营泉裕钱庄，退出了合伙经营的永恒盛丝线店和五云楼百货店等业务，将这些业务的股份转给了其他兄弟。

此时，虽然庆桐派下只经营钱庄业务，但其他三房仍然将尤家家业扩展到了更多新业务上。不久，在南街锦巷口又开起了一家五福百货店，由庆樨之子德黼管理；在城内南街开设的祥益钱

庄，则专营贷款业务，不出票，并在南台二保开设祥益钱庄分店，由庆潮派下的德钐负责管理；在南街尤恒盛店后面还开了一家益记苏广栈，办理百货批发业务，用以满足尤家所开的三家以“五”字冠名的百货店货源。据说，尤贤模派下开设的三家百货店店名都以“五”字开头，寓意就是要突出第五房。

这时被看成是尤家的全盛时期——尤家各企业资金雄厚，经营有道，而且社会信誉颇高。传说当年尤贤模派下四兄弟的全部财产有 200 多万元，堪称福州商场巨子。

尤家后代的享乐主义生活

尤家传到第三代，家业已经相当庞大，丰厚的资产让尤家子孙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一个巨商家族，后辈享受已有的物质生活并无过错，但享乐与玩物丧志之间似乎并无明显界限。

虽然尤家后代中不乏勤奋精明的接班人，但纨绔子弟的出现也在所难免。他们吃喝玩乐，挥金如土，纵情享受庞大家族带来的精彩物质生活，不愿意再延续祖辈艰苦创业的家风，更没兴趣辛苦守业。

尤贤模二子尤庆桐，人称尤十五（排行第 15 位），是继其父在尤家发家过程中的典型人物。尤庆桐掌管尤家家业期间，一边为公房积累资金，一边也为自己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私房财富。当时，尤贤模派下四房公房财产的分配规定是，

每年一个企业所得纯利均分为五份，四房各取一份，剩下一份分给管理这个企业的当事人作为酬劳，也就是说管理企业的这一房，在企业年终分红时，可以得到全年应得份额的 40%。由于尤庆桐管理的企业多，所得也就多，加上私房生意，个人财产十分丰厚。赚钱多了，花钱自然也快。尤庆桐长子尤德权只有甚之而无不及。据陈承椿回忆，尤德权曾经为拉拢官吏，一夜豪赌输掉 37.5 万元，一度引发尤家泉裕钱庄发生“挤兑”风潮。父亲庆桐则是一边掏私囊将儿子亏用公款赔还公房，一边怕儿子再出事，登报和德权脱离了父子关系，并把私有财产划出 30 万元，平分给四个儿子，每人 75000 元，尤德权则分文不给。据说，这脱离父子关系的一招的确有未雨绸缪的意味，摆脱了后来尤德权在福州二次沦陷时期当汉奸的牵连。

之后，庆桐的小儿子尤德成出来为这个僵局打了个圆场，他从自己分内划出 5000 元送给尤德权，让他去日本念书。此外，德成见各房弟侄参加企业管理的多是浑水摸鱼或者挥霍无度，对公房经营的泉裕钱庄没有再干下去的兴趣，便征得各房的同意，终结了业务。

逐渐衰弱的尤家生意

按早年传下来的尤家家规，参加公房企业管理的子弟是不能另外经营自己的私房生意的，以保证经营者能够尽心尽力，维持尤家家业的发

展。这一家规在一代、二代都得以严格执行，但到尤家第三代，已经缺乏约束力。

尤家第三代中各房子弟多数都在私底下经营自己的事业。陈承椿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一家信昌钱庄，这家钱庄就是由尤家内部人出资，然后用亲信人名义出面经营的。而这也酿成尤家再次分家、尤家公房事业走向衰弱的征兆。

此时的尤家虽然还共同经营一些产业，但各房早已是同床异梦。不久，以尤庆桐不愿合营为导火索，尤家各房先后同意分别把企业拆股自营或者改组合营。五云楼由长房尤庆潮派下三房承接后继续营业，更名为五云楼锦记，以示与之前的公房事业有别；二房尤庆桐退出后又自己开了恒孚、和孚两家钱庄，但不久就歇业了，手头上已经积累了大笔资金的他也从此靠放高利贷获



1949年，尤德龙的女儿尤琪琛结婚，尤家那年唯一的喜事

利；四房尤庆樾则自从其子尤德黼在上海挥霍出去数十万元后，资力大减，业务很快就收盘了，他和尤庆棧派下接办的尤恒盛丝线总店，也因为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业务发生困难，以及招牌名望大引出的各项税收摊派重，于1941年收盘；庆棧则以非常有限的资金在原恒盛店隔壁开设了一家万宜百货店。

一年半后，庆棧之子尤德龙从上海回到福州。尤德龙主张从万宜划出一部分资金投入百龄商店。这个困境中的决定给尤家带来日后的再次辉煌，但万宜商店则因为业务不振于1943年结束经营。

此时，尤庆樾派下先后在东街口开设的锦盛绸缎店与锦新绸布店，也只剩下锦新布店一家。因为这段时间尤家不少企业相继歇业，福州城内曾一度疯传尤恒盛倒盘。实际上，倒盘的并不是尤恒盛本店，而是尤家二代三房尤贤坡派下的自营企业，当年，贤坡一房没有分到祖传家业，只分到一些钱财，于是就另起炉灶，在尤恒盛老店背后开起批发绸缎的业务。之后受战争影响，宣告倒盘。

实际上，尤家的颓势已经在劫难逃。

终结于第四代的尤恒盛

对于庞大的尤氏家族而言，虽然人心日益分散、家业在几次分家后逐渐衰弱，但仍旧保留着工商世家的特性。在尤家的发展史上，每代都能

找出几个关键性人物，他们或思维开放或精明保守，却都为尤氏家族生意的延续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尤家第四代德字辈中，家族关键人物是尤庆潮的两个儿子德铃、德锜兄弟，以及庆棧之子德龙。

20世纪30年代初，德铃、德锜接办了尤家后期的重点企业百龄商店，并在福州台江开设良友百货店、在上杭路开设信诚棉纱栈、在上海开设信源采办庄和汇兑庄、在香港开设裕丰庄。这些新企业为尤家事业打开了新局面，但这个好的开始并未延续下去。不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尤家企业受战争影响逐渐走下坡路，尤家的年轻一代中不少为避征壮丁纷纷弃商从政或避居异地。此时的老东家庆棧、庆樨等思想保守陈旧，竟然主张将所有金银首饰兑换成钞票存放在店里，就连企业营业收入，除去用于进货的部分也都被换成了现钞，结果抗日战争时期，物价猛涨，法币贬值，尤家换存的那些钱币很快就消耗一空。虽然此时的德铃仍然对振兴尤氏家业大有信心，但事实证明，颓势难挽。据说，当时，德铃曾试图在福州横街开信昌进出口商行，与香港交流物资，但因为受币制不断贬值的影响，企业每况愈下，又发生运往香港的白砂糖不幸丢失，这让尤家损失惨重，衰弱局面进一步恶化。

抗日战争胜利后，德铃、德锜从上海回到福州，本想配合德龙重整百龄商店，扩展营业场所，但赶上内战期间货币恶性膨胀，这家尤家后期的重点企业也因此一再亏本，到后来连维持都感到困难。战火南移时，福州局势也开始紧张，德铃、德锜兄弟在卖掉家中的红木家具后又逃往上海避难，百龄百货则交给了德龙和尤家女婿陈承椿负责维持。

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经经营着十多家企业、拥有资产200多万元的尤家，只剩下百龄一家，而且，这唯一的企业也已摇摇欲坠。曾经显赫一时的尤家五房子弟，在衰败后有的甚至穷困到了极点。

1956年，百龄百货商店被列入福州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名单，尤德铃被任命为福州市百货公司副经理。



20世纪90年代，中亭街改造前的百龄百货



海洋世界，不仅仅是童话

章 武

在中国东部沿海罗源湾之畔，有一个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海洋世界”。占地 172 亩的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是具有海洋科普教育、休闲观光、体验互动、海上游乐等多种功能的大型滨海休闲游乐度假区，目前已获评国家 4A 级景区、福建省科普教育基地和水生野生动物救护站。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眼前这个海洋世界，它总面积近 3 万平方米，内设 2 个海洋剧场、3 条海底隧道、8 个模拟浅海、深海和海底生态的景区，拥有 300 多种海洋生物，开馆两年多来，每年接待游客 100 万人。在这蓝色而透明的水晶宫里，在与 300 多种海洋生物的短暂对视中，我深切领悟到，保护海洋，是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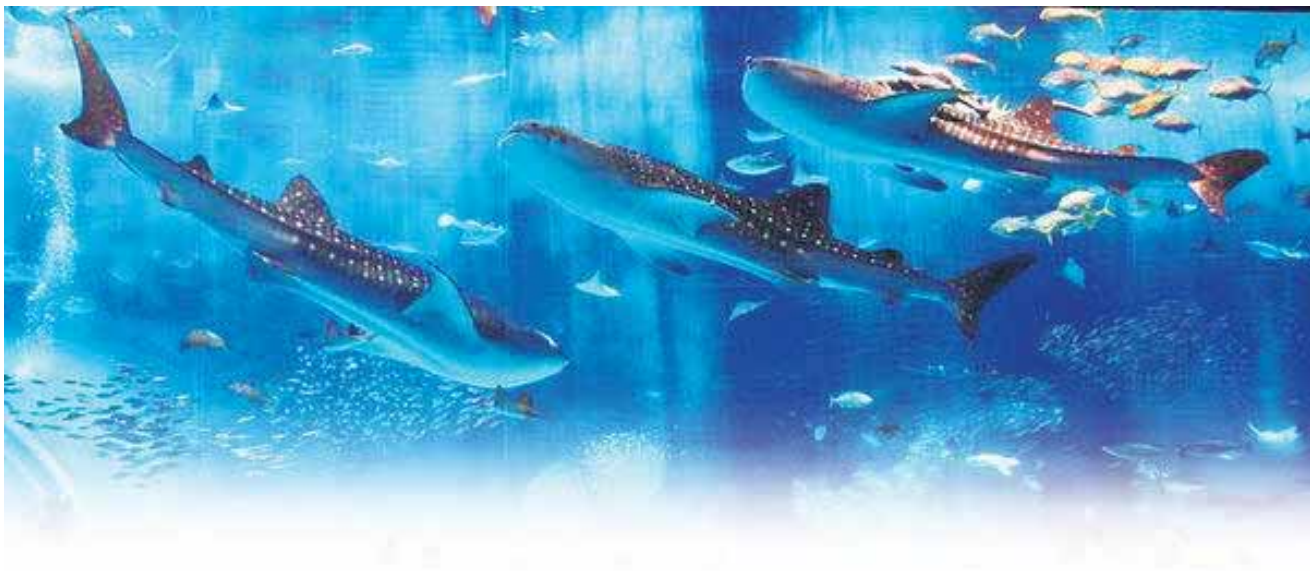
鲨：最忠于爱情的蓝血动物

灯塔旁边，是一处浅海滩上的触摸池。你

可以伸出手来，零距离碰触各种海星、海胆和海螺，充分感受它们的温度、硬度和灵敏度。突然间，我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惊喜地叫了出来，因为我发现一种名叫鲨的神奇海生物。它让我回到童年时代的福清海边渔村，那位满脸络腮胡子的船老大阿铜，他拎着一对鲨——紧紧抱在一起的公鲨和母鲨，正从海滩上笑眯眯地朝我走来。

围观他如何解剖鲨体，是童年最难忘的记忆。只见鲨血是蓝色的，从六对鲨脚硬壳里取出的鲨肉无比鲜美，母鲨肚子里成千上万颗比珍珠还小的鱼卵更是天然补品，而剥下来的鲨壳，正好可制作水瓢。

那时，大家都不知道鲨字该怎么写，怎么读，于是，有位南下干部，就当场编出一段顺口溜：“上面一个壳，下面六双足。走起路来，圪圪坨坨。吃得太多，呃嘿呃嘿！”所谓“呃嘿呃嘿”，指的是咳嗽声。



据陪同参观的工作人员朱丽颖介绍，鲨的祖先出现在古生代泥盆纪，距今4亿多年，比恐龙还早，故有“活化石”之称。它的血为什么是蓝的？因为含有铜离子等物质，从中提取的“鲨试剂”，可迅速、准确地检测人体血液内是否有细菌感染，在药品、食品工业中必不可少。此外，鲨还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即公鲨和母鲨一旦结为夫妻，就不离不弃，终生相守。每逢夏季，人们在海滩上邂逅它们时，总是身宽体胖的母鲨，背驮体型瘦小的公鲨。于是，发现一只，拎起来就是一双。因此，它又有“海上鸳鸯”之美誉。

但其实，称鸳鸯是陆地上的模范夫妻，是一场误会。据专家考证，鸳鸯中也有不少朝三暮四者。真正忠于爱情的，是天鹅，是美丽、高贵而又优雅的天鹅。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诗歌、绘画及歌舞作品，都赞颂天鹅，但我们的鲨，同样忠于爱情的蓝色海生物，却至今默默无闻，鲜为

人知。太不公平了！

玳瑁：最长寿的海龟

前方，是海龟池。我发现我那些年老的团友一个个变成老顽童，正兴高采烈地为海龟喂食、与海龟逗趣。人多，我乘坐轮椅挤不进去，于是，先去观看另一边墙上的海龟标本。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坚固的外甲壳，皆呈半透明的墨绿色，仿佛镀上一层釉，打上一层蜡，显得油光可鉴，让所有华丽典雅的斑纹全都闪闪发亮。朱丽颖说，这种海龟与众不同，它身上共有13片背甲，故称“十三鳞龟”，又因为它是海龟中最长寿者，故又称“千年龟”，它的学名：“玳瑁”。

我一听“玳瑁”二字，立即背出一句古诗：“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这是汉代乐府诗

《孔雀东南飞》中的名句，用以描写女主人公华贵的装饰。我还听说，唐代女皇武则天也是玳瑁的粉丝，她的梳子、发夹、戒指、手镯、扇子、琴板乃至刮痧板等等，全都是用玳瑁壳精制成的工艺品。也许，在她心目中，只有神龟玳瑁，才是万年不朽的祥瑞之物，才是帝王万寿无疆的象征吧！

据说，玳瑁肉有毒，不宜食用，但却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其清热解毒之功效堪比犀角。有趣的是，它以海绵为主食，而海绵的成分与玻璃相同，都是二氧化硅，因此，它也是海生物中唯一能吃玻璃者。难怪它的背甲，就像玻璃一样透明，一样亮闪闪。

也许，正因为玳瑁如此珍贵，它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别看它本应那么长寿，但非正常死亡率却很高，因此，它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而且，其等级还标明为“极危”。



砗磲

面对既长寿又“极危”的玳瑁，我百感交集。我忽然想起曹操 1800 年前的预言：“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人啊，在神龟面前，敬请刀下留情！

砗磲：物以稀为贵

看完玳瑁，我又去看另一边展柜中的标本：砗磲。

砗磲这两个字相当古怪生僻，但它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名扬四海了。据古籍《尚书大传》记载：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他的大臣散宜生，是用一种名叫砗磲的大海贝敬献纣王，这才把周文王赎回来的。由此可见，砗磲这种宝物，不但价值连城，还可与一位国王进行等价交换呢！到了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它又与玉髓、水晶、珊瑚、琥珀、珍珠、麝香等，成为佛家七宝之一，而且是七宝之首。砗磲是海洋中最大的双壳贝类，被称为“贝王”。最大的砗磲，单体就可以充当婴儿的澡盆呢！

慕名已久，难得初识。我戴起老花眼镜，久久凝睇眼前这无价之宝。只见它外观略呈三角形，内外双壳大小相当，其外壳壳质厚重，但相当粗糙，灰白色的表面上，有数条凹槽，状如被车轮碾压过的沟渠，也许，这就是得名的来由吧！其内壳却玲珑剔透，晶莹洁白，且富有光泽。据说，当它的活体在海水中张开时，体内与其共生的虫黄藻，能放射出种种绚丽的色彩：孔

雀蓝、翡翠绿、玛瑙红、柠檬黄……由于砗磲内壳的纯白度在有机玉石中名列第一，中外佛教徒都视其为纯洁、高洁、圣洁之至宝。《金刚经》还说，凡手持砗磲磨制成的佛珠者，神清气定，念一遍佛经就可收到念两遍的奇妙效果。

鲁迅先生尝言：“物以稀为贵。”稀者，稀少，稀缺也。正因为砗磲须在海水中吸天地之精华，历千百年之孕育，其生长不易，采之亦难，因此，它就越来越显得珍贵。据说，前些年海南岛市面上用砗磲制作的手工艺品，在人为抢购中，其价格一下子暴涨5倍以上，当地政府不得不紧急发布禁售令。好在如今，砗磲已成为国家一级保护的海洋生物，并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世界上，尚存砗磲的产地所剩无几，其中，就有我国的南沙群岛。因此，保护砗磲，就像保卫南沙群岛一样，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

穿越海底隧道，我变成一条鱼

《旧约·出埃及记》载：摩西把手中的拐杖一挥，海水就往两边退去，于是，闪出一条旱道，让他带领族人，浩浩荡荡从非洲大陆走向阿拉伯半岛。

今天，我的拐杖就勾在脖子上，但我不是摩西，没有他那种神力。好在海洋世界的设计者，早已为我们提供三条海中隧道。其中，最短最矮的一条，长7米，是专为儿童设立的探险隧道，让幼儿园的小朋友可爬行穿越，首次体验一下人鱼共处、有惊无险的难忘经历。第二条为淡水隧道，长30米。第三条最长也最壮观，为海底观光隧道，长35米。这三条隧道的玻璃幕墙，全用一种名叫亚克力的进口玻璃制成，全透明，且无任何对接的缝隙。穿行其中，你可以全方位、全立



海底隧道



体、多角度、多侧面地与海生物互相观望，互相交流。

当我的轮椅驶入海底观光隧道时，我忽然觉得自己浮了上来，漂了起来，哈，不会游泳的我居然变成水上健儿。我已经变成一条鱼，正与头顶上、身体两边的各种鱼，各种大鱼小鱼，公鱼母鱼、圆鱼扁鱼、胖鱼瘦鱼、美鱼丑鱼、快鱼慢鱼……一同戏水，并肩前进。

我忽发奇想：我到底是一条什么鱼呢？我不知道。还是让我摇头摆尾，鼓腮奋鳍，继续往前游吧！

水母：浪尖上的舞蹈家

于是，我游进了梦幻水母宫，于是，我见到海洋世界中最美丽的生物，最美妙的舞蹈。

仿佛一大批彩色的降落伞从天而降；仿佛一大片蘑菇从雨后的草地上探头；仿佛一页页风帆融入天幕；仿佛一只只白羊躲进云层；仿佛一片片雪花、一片片鹅毛迎风飘舞；仿佛一朵朵昙

花、一朵朵雪莲瞬间开放；仿佛一大群身披婚纱的新娘在赛跑；仿佛芭蕾舞团的演员们正踮着脚跟浪尖上飞翔；仿佛，仿佛……

我不好意思再“仿佛”下去了。本来，凡写作者活到60岁之后，是不该多用形容词和排比句的，以免被年轻的评论家认为“装嫩”，认为滥情与矫情。但今天破格，因为我太投入太入迷了，不妨学习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也放纵一回吧！

水母，为什么能有如此轻盈、灵动、飘逸、曼妙的舞姿？朱丽颖一语道破：因为它是水之母，是水生环境中的浮游生物，其体内98%是水，并可利用体内喷水反射前进。难怪，它的伞状体薄如蝉翼，柔若无骨，能在风中、浪中、海流的暗涌中，随时伸缩变形，幻化出千姿百态，摇曳出万种风情！

可惜，世间美丽的东西，往往都很脆弱，都很短暂。比如这水母，它的寿命大多只有几星期、数月，有些深海里的水母可活得更长些，但也只有一年左右。祖籍闽江口琅岐岛的书法家陈

奋武曾对我说：小时候，他家门口的海面上，到处都是俗称海蜇的水母在浮游，但如今，优质的野生海蜇却只能偶然见到了。

当然，他所说的还只是海洋里的水母。至于陆地上的水母，例如长江流域往昔经常出现的“桃花水母”，因其状如春天里飘落水中的瓣瓣桃花，被古代诗人美称为“桃花鱼”，由于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更是难觅踪影，于是，每当它偶然出现，便成为当地一大新闻。

鲨鱼的牙齿与鳄鱼的眼泪

当然，海洋中的生物并非都那么美丽、善良和温顺，它们当中，也有丑陋、邪恶与残暴。

比如大白鲨。它的牙齿，可以像尖刀切断电缆；可以像锯齿锯断桅杆；也可以像石臼那样，压扁、磨碎包括人体在内的所有猎物。因此，人鲨之战，始终是世界文学的一大主题，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如彼得·本奇利的《大白鲨》，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曾据此拍出同名的好莱坞巨片。

再如鳄鱼。这种冷血的爬行动物，身披坚硬的盔甲，外貌丑陋而笨拙，但其视觉、听觉却很敏锐，必要时动作疾如闪电。西方有句古老的谚语，叫“鳄鱼的眼泪”，说鳄鱼将猎物捕获到手、准备吞食之前，总会假惺惺地流泪不止，以此伪装同情与悲悯，因此，它成为阴险狡诈之徒的代名词。

还有毒蛇。据说，海蛇比陆蛇更毒，有一种

青环海蛇，其毒液是眼镜蛇王的20倍，一次排出量在24小时内就能毒死25万只小白鼠。我一向怕蛇，年轻时做噩梦多半与蛇有关，于是，善解人意的朱丽颖，有意让我避开那些不堪入目的区域。但我还是听说这里有一种来自缅甸的海蛇，其又长又圆又滑的身躯，可在海底岩洞中连续穿透十几个孔穴。虽未亲眼所见，但听起来也就头皮发麻、毛骨悚然了。

其实，人类对以上动物的看法，有许多是出于误解，是把人类的审美标准和道德评判强加于它们身上。鲨鱼的牙齿，完全是它生存与自卫的需要，一条鲨鱼，在10年内要换掉2万余只牙齿，够辛苦的了。而鳄鱼的眼泪，只是为了排除体内多余的盐分，与假慈悲无关。至于毒蛇，总是遵守“人不犯蛇，蛇不犯人”的底线，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主动向人发动进攻的。

何况，它们还无私地向人类提供种种好处：鲨鱼身上的鱼翅和鱼肝油，是人类最好的食品和补品；鳄鱼血中的蛋白质，是艾滋病的克星，其皮革，又可制成各种华贵的奢侈品。而海蛇的蛇毒更是名贵，在药用、食疗及工业上具有广泛的用途。

其实，比起它们，最贪婪、最残暴、最凶猛的，还是人类自己。由于人类的唯利是图、狂捕滥杀，每年全球有100万条鲨鱼死于非命，近50年来，鲨鱼的总数已下降了80%。而大多数鳄鱼品种，已被《华盛顿公约》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附录I名单，禁止国际贸易。另据美国《国家

地理》报道：海蛇是世界上被捕获量最多的海栖爬行动物。在泰国湾，每年有超过 80 吨的海蛇被捕捉，科学家们认定：这足以敲响拯救保护的警钟。

对此，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不能不深感愧疚与不安。

美人鱼与海豚：演不尽的水上悲喜剧

前方，传来了掌声、笑声和欢呼声。我猜想，此行的高潮——海底剧场到了。果然，有三位女潜水员打扮成三条美人鱼正在表演。她们身着人身鱼尾的裙装，所缀满的鱼鳞片闪闪发光。她们似人非人，似鱼非鱼，在上下浮沉、左右旋转、挥臂甩发、扭胯摇尾间，尽情展现人间佳丽与水族美女的双重之美。

在我的印象中，最早的美人鱼，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水妖吧？每当月明之夜，她们总会浮出

海面，湿漉漉的秀发，赤裸裸的酥胸，再加上充满诱惑力的迷人歌声，总能让水手们如痴如醉，最后，一个个晕乎乎地翻船落水，葬身鱼腹。后来，在波兰，美人鱼又变成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她一手持宝剑，一手举盾牌，是保家卫国的女英雄，人称华沙美人鱼。再后来，丹麦的安徒生，写出了不朽的名著《海的女儿》，于是，全世界儿童，都知道她爱上了她所不该爱的人间王子，为此，她舍弃了舌头成为哑女，忍受剧痛把鱼尾劈成两条人腿，当她强颜欢笑在地上跳舞时，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不能与王子成婚，只能满怀忧伤地在海浪中化为泡沫……

与悲剧命运的美人鱼相比，憨态可掬、萌态可乐的海豚，更多带有喜剧色彩。它们在另一个规模更大的海洋剧场上，与驯兽师共同进行杂技表演：人鱼亲吻、高空顶球、水中呼啦圈等等，一个个貌似笨拙、实则灵巧的高难度动作，把





198个观众席上的游客全都逗乐了。

朱丽颖告诉我：海豚是智商最高的水生动物，它的大脑十分发达。据专家测算，猩猩的脑均重不足0.25公斤，人的脑均重约为1.5公斤，而成年海豚的脑均重为1.6公斤。而且，它的大脑左右两半球还可以轮流工作和休息，也就是说，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不睡觉，一辈子都不睡觉……

对此，我只能表示敬佩，但绝不羡慕。就连上帝星期天都要休息，何况人乎！

感谢朱丽颖把我推出海洋世界，让我又见到了蓝天、白云和明亮的阳光。我仿佛从美梦中醒来，又由鱼变成人，回到了人间。

蓝海洋，不仅仅是童话

浩瀚的海洋，深邃的海洋，美丽、神奇而又富饶的海洋，是生命的源泉，人类的母亲！

回想在海洋世界的奇妙经历，我仿佛返老还

童，重新接受一次有关海洋与人类血缘关系的启蒙教育。我终于明白，蓝色的海洋绝不仅仅只是童话。当我们尽情享受母亲哺育之恩的同时，也要想到她已不再年轻。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首届海洋大会上所言：“污染、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这三大顽疾，“正在严重破坏海洋的健康”。为了母亲的健康，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拯救海洋，保卫母亲！

保护海洋，人人有责。其前提是人人都能知我海洋，爱我海洋。而这一切，都必须从儿童做起。像罗源湾这样的海洋世界，就是对子孙后代进行科普教育的最好课堂。想到这里，我掏出手机，往我二女儿家挂电话。接电话的，是上小学二年级的外孙女。她告诉我：“外公，我和爸妈早就去海洋世界玩过啦，海里的鱼儿好多好多好可爱啊，我太喜欢了！”

听到她稚嫩的兴高采烈的声音，我很开心。我对海洋与人类命运的前途，又充满了信心。

闽安纪事

柏荣

清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郑成功进占闽安，准备攻打福州。福州之战，刚开始颇顺利，郑军三战三捷，守军望风披靡。郑军已经进城，但立足未稳，城外清军伏兵四起，情势骤变。郑成功不得不收拾队伍从福州退兵，大军趁着退潮，顺闽江舳舻而下。船到闽安时，郑成功下令，全军舍舟登岸，在这里驻扎了下来。郑成功以一位军事家的眼光对这个闽江口的小镇产生了浓厚兴趣。这里是千里闽江的锁钥，东出大海，西拊省垣，北窥浙南，南控泉厦。在这里屯兵，就如同在清廷的胸脯插上一把利刃。于是，闽安，一个地处东南一隅的蕞尔小镇，一时成了闽浙官员们奏折中出现最多的地名。

其实，闽安古镇自古以来就是扼闽江入海口的咽喉要地。闽安所在的闽江河段，是一处长6公里多的天然峡谷，人称“闽安门”。这里东距海口20公里，西距福州城区30公里，成为进出省垣的重要门户。邢港河自西北从山中流出，纵贯闽安全境，绕棋盘山南麓向东注入闽江。由于邢港河水阔流深，是闽江近海口的一处避风良港，经闽江进出海的船舶多选择在此停泊和转运物资。

据文献记载：唐太宗时闽安即为闽州重要

港口；文宗时，南海各国商船均由闽安镇放洋出海。王审知为发展海上贸易、巩固海防，在此建造通海大石桥——迴龙桥，成为海外贸易的必经之地。

公元893年，唐代在闽安设立税课司衙门，向外国贡船和开往东南亚的货船收税，缉查走私，打击海盗。税课机关一直延续到清代。海外所有的船进出福州，先要停泊邢港候检。琉球进贡的船也要在此检查封舱后，再用小船运到台江河口。

宋代还在闽安设立巡检司，负责稽查并向出入境船舶收税。闽安巡检司旧址就位于闽安城里街的石头城边上。门前有《重修闽安镇协署碑记》，照壁上浮雕为麒麟，整座由照壁、仪门厅、正厅和后厅等组成。院内有4棵清初龙眼树，还有宋代饮马石槽以及清道光年间立的“英军犯顺厦门报警”碑。

清初巡检司改为协台衙门，兼管闽安武口海关。当时福州80%的进口税由闽安海关征收。清同治到光绪年间，闽安海关以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开办马尾船政。从唐到宋，闽安税课司和巡检司的官员和管理人员从60人增加到180人，可见当年海外贸易规模很大。



清代的“重修闽安镇协署碑记”

不仅仅是郑成功，在他之前看到闽安军事地位重要的还有戚继光。1560年，戚继光经浙江进入福建抗倭，在闽安构筑起四座寨城。戚军屯兵于此，很快便肃清流窜于连江、罗源和长乐的海寇。此时的闽安，由于明朝政府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但禁止民间的海上运输、海上贸易，就连下海捕鱼也成了违法。一时间，闽安港口萧条、市场衰败，百姓生活艰难。戚家军的进驻，给闽安带来一线生机。但随着战事向南推移，戚军拔寨走后，闽安又重归冷清。

将近100年后，一天，闽安百姓忽然发现，大批操着闽南方言的军人正潮水般地通过迥龙桥进入镇区。而且这支军队在14年间三进三出闽安镇。大批军队的进驻，带来的不仅仅是战争的阴云和硝烟，同时也带来商贸的繁荣。四邻八乡的物资开始向闽安集中，已经沉寂多时的邢港，大小船只穿梭如织，重又焕发生机。郑成功的船队撤离闽安后，清军接踵而来，接管了郑军留下的营房、炮台、码头、仓库、军械厂、造船厂。闽

安的军事地位，从此不再动摇。

在郑氏攻取并据守台湾期间，清廷益发觉得闽安门的重要，于是在这里建立全国第一支福建水师旗营。大批旗兵开进闽安。闽安水师统辖福建沿海以及台湾、澎湖，歼灭海盗、平息叛乱，1683年，闽安水师将士参加了施琅收复台湾的军事行动，之后，根据清廷的安排，由闽安水师派将士轮流戍守台澎，前后达13万多人。

在闽安居住的原有110个姓，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大多为中原汉族，是历代军人和商人的后裔。还有一些是满人，来自关外东北。闽安就像一块大海绵，最多的时候，这里竟聚集了10万人口，此后，水分被渐渐挤干。而今，镇区里还排列着9条古街道、9条古铺巷和200多处古商店商行。此外还有38座寺庙宫观，向人们述说着过往的历史。

闽安依江而建，因海而兴。潮水裹着岁月，也曾将惊涛裂岸的壮阔，书写在这片土地。

时间真是无情。由于马尾港的局限和式微，闽安，也从曾经的福建四大名镇，一下跌回到一个普通的村庄，默默地守着一方平静，一方孤寂。那“百货随潮船入市”的热闹光景，那“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生动场面，已成为上一辈人的记忆。

一条清澈而又急湍的江流，一个曾经辉煌的村庄，一段被载入史册的岁月，一些远离家山的游子，他们共同组成闽安的故事，那故事里有一份慷慨、一份激昂、一份悲壮、一份凄凉……

凭将一掬丹心在

何 康

1950年6月10日，吴石将军在台湾遇害，同时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杀害的还有女共产党员朱枫、吴石的好友陈宝仓中将、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此案震动台岛，欧美媒体多有报道。

难得的军事人才

张执一（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在《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一文中写到我的父亲何遂时称：“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

吴石，字虞熏，1894年农历

八月十五日出生于福建闽侯县螺洲乡一个“累世寒儒”的家庭；少年就读于富有维新色彩的福州开智学堂、榕城格致书院时，接触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孙中山反清起义的壮举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7岁的吴石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1913年春转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1915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张治中等是同期同学。吴石记忆力极强，又十分刻苦，1916年末，他在同届800名学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由于陆军



螺洲吴厝村1号，吴石将军的祖屋

部按省籍分配，当时福建省没有地方部队，并遭受皖系军阀李厚基的残暴统治，吴石不愿为军阀效力，在家闲居数月，十分苦恼。适逢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吴石乃投身福建以方声涛、张贞为领导的地方民军“驱李”斗争。1918年回国后，他被广州护法军政府任命为“靖闽军司令”。所谓“靖闽军”实无军队，主要依靠地方民军及反李势力。吴石与父亲在这一斗争中熟识。由于暗杀活动失败，吴石与父亲被迫离开福建，经武汉北上。吴石因喉疾在北平休养，1922年至1924年，他拜闽籍大儒何振岱为师，学习诗词国学。从此，古典格律诗词的创作成为吴石一生的嗜好。父亲则于1920年经孙岳引荐进入直系，参与了1924年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成为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父亲请吴石出任该师军械处处长并统领炮兵，兼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但国民军仅一年多便在直奉两军夹击下瓦解了。这时，蒋介石正在南方誓师北伐，朱绍良任总部参谋长，委吴石为作战科长。

1927年，方声涛回福建主持政务，吴石又回福建任军事所参谋处处长，致力于整训本省民军。1929年，吴石做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决心到日本陆军大学去继续求学，成为一个深入了解日本军队的军事家，报效国家和民族。吴石的决心得到方声涛的支持，由福建省政府出资，保送东渡留学。吴石先入日本炮兵学校，继而考入日本陆军大学。他在日本6年，一家人过着清贫淡

泊的生活，把节省的钱全部用来购置各种军事著作和有关资料。吴石是个才子，精通日语，英语也很好，他埋头苦读，193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5年吴石回国，在南京参谋本部任职，兼任陆军大学教官，同时开始军事理论著述，陆续出版了《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罗则维兹兵法研究》等著作。这时期，他和父亲来往十分频密，已成莫逆之交。

抗日战争中的高参

1937年五六月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父亲与代表团成员多有接触。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初步形成，叶剑英希望父亲多介绍一些朋友给他们，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父亲便把吴石、张维翰、缪秋杰（张时任立法委员，后曾为台湾“监察院”院长；缪时任两淮盐运使，后为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此二人均为吴石好友）等介绍给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人。吴石对日军入侵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提出的“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十分赞同。当时蒋介石组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吴石作为军界公认的“日本通”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他在参谋部时即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研究心得，编撰了有关日本军队的《作战之判断》《海空军总动员》《兵力番号编制》及主要

将领的《蓝皮书》，此时再充实翻印，弥补了国民党对日军事情报储备的不足。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事实证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组合、攻击指向，大多如《蓝皮书》所判断。

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本营移武汉，第二组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吴石任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每周都召见他，咨询日军动态。1938年8月，第二厅在珞珈山举办了“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并特地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讲课。我的长兄何世庸当时就以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了这个训练班，亲聆了周恩来作的形势报告和叶剑英讲的游击战争大课。

1939年11月末至12月初，日寇攻占南宁和地扼桂越交通线的要隘昆仑关，揭开了长达一年的桂南会战。在这次战役的紧张阶段，吴石白天不离地图，夜晚不离电话，连续几昼夜未曾合眼。昆仑关大捷吴石是有贡献的。随后由于日寇增兵，昆仑关再度失守。从1940年2月起，桂南作战改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吴石仍然肩负参谋重责。经过艰苦作战，1940年10月末，中国军队终于收复南宁，取得了桂南会战的胜利。吴石敏锐地判断了日军撤退的动向，及时组织追击，日寇仓皇逃遁出海，使南宁及沿途地方未遭破坏，且缴获了日军大批辎重。南宁作战后，吴石升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吴石担任第四战区参谋长长达5年。这期间，他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埋头苦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和战

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他得力的助手，也博得同僚广泛的赞誉与拥戴。

在抗日战争时期，吴石也非常重视发动民众协力抗日。他在桂林时，首倡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把大批日俘组织起来，为抗日服务。在国民党一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挑起反共摩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特务密布的12个战区中，第四战区始终保持着国共团结抗日的局面，这和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长吴石、中将军参谋长陈宝仓等一批爱国高级将领坚持正义立场密切相关。

桂林失陷前，大哥接到董必武“向桂东转移”的指示，特地去向吴石咨询，吴石向他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态势，指出桂东三角地带，日军兵力暂难顾及，是相对安全稳定的地区。这个分析帮助了新任桂东盐务办事处处长的大哥利用控制的5万多担存盐（战乱中每担盐市价1两黄金），放手支持桂东自卫抗战，保护民主力量。后来事实证明，吴石的判断是准确的。

情报工作建奇功

抗战胜利后，吴石回到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在抗日期间就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不满。桂柳战役失利，身处第一线的吴石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局面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偏爱嫡系，重用刘峙之流无能败将，也让他深为不平。他受过系统的高等军事教

育，却始终无缘军队的实权，这是吴石难解的心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五子登科”式的“劫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特别是蒋介石违背广大民众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多次发出“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喟叹。我父亲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与吴石十分一致。他和吴石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隐晦，这种鲜明的态度对吴石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吴石也表示，希望通过父亲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建立直接接触。

1938年，我在抗日烽火中于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敌宣传队，次年5月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我和两个哥哥（大哥何世庸是延安抗大第五期的，二哥何世平是抗大第四期的）的组织关系都转至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叶剑英直接领导。叶剑英调回延安后，由董必武直接领导，直到1946年末才一起转到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是刘长胜，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领导是张执一。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瑞明公司公开业务是做西药、货运等生意，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一个核心的经济机构。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并宴

请了吴石，父亲和我在座。这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此后，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我家寓所，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落的三层西式小楼，我父母与我家住在一起。父亲当时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素以交游广泛知名，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上海解放前，主要以此为联络点，由张执一和我与吴石联系。1948年底，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组织上派谢筱迺赴闽配合他工作。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有时则包扎好，写明由我父亲收，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让我吃惊的是，



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

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一级。我掂量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交给了张执一。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曾两次向我提及。一次是在上海解放不久军地干部集会见面时，高兴地对我说：“渡江战役前，我们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况，这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另一次是我担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之后见面时，他再次讲了类似的话，并提到准确的情报对确定渡江的主攻方位是有参考作用的。

1949年4月下旬，吴石和我父亲、妹妹何嘉（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时为复旦大学社会系二年级学生），同机从上海飞往广州。临行前夜，我与爱人缪希霞（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瑞明企业公司财务主任）等在霞飞路“卡弗卡斯”咖啡馆为吴石饯别。那个店有一个不大的舞池，留声机不停地播放《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歌舞曲。吴石告诉我们，他接到了催他赴榕莅职的电报，他到广州短暂停留（国民党政府已迁至广州）后，即赶赴福州。当时解放大军已从安徽胜利渡江，我们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他知道我将留待上海解放，今后我们很难再直接联系，不胜依惜。吴石是豪爽侠义之人，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他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出那首古老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吴石的永别。

吴石在广州短暂停留即赴福州莅职，临行前

将一包重要情报留给父亲，父亲让何世庸与何嘉送出。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何世庸借口送其妻回娘家分娩，与何嘉等夹带着这组相当数量的情报安全到达香港。

吴石于5月初返回福州，6月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有汤恩伯、朱绍良、李以勋等出席的福州军事会议。蒋介石企图固守福州，以屏蔽台湾。吴石违反蒋的意愿，极力阻止修建福州半永久性城防工事，使大批市民免遭劳役和战俘之苦。他通过谢筱迺送出许多重要情报。谢筱迺曾深情地回忆：“吴石将军为人忠厚，亲切热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当年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吴家一次，有时还在那儿吃饭。吴夫人也很和气。办完事，吴将军每次都亲自送我到巷口，还一再关照，万一出事要及时设法通知，好营救。在周密安排下，福州没打什么仗就解放了。吴石将军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往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不仅如此，吴石还极富远见地冒险将一批原定直运台湾的绝密军事档案留给了新的人民政权。这批档案原由国防部史政局保存，共500多箱。

一片丹心存青史

吴石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往台北，就任国防

部参谋次长。这时，我的父亲和妹妹，按照组织安排也在台北执行任务，他们原本打算留在台湾工作。我二哥何世平则已经在台湾台南、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三年多了，母亲与他们一家人同住。这段时间，吴石与父亲在台北接触密切，他们还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当时大陆的战局已经明朗，蒋介石集团企图凭借台湾海峡固守台湾，而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军要跨海作战，来自内部的准确情报就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环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无论吴石还是我的父亲和兄妹，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这样，吴石确实面临了人生重大的抉择。海峡阻隔，基本上和共产党断了联系，他可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安稳地在台湾做他的高官。如果选择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那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吴石恰恰做出了甘冒斧钺的选择，吴石的抉择是他一贯爱国思想的延续，也和我父亲的影响分不开。

此时，蒋介石的残余力量已基本集中于台湾，这个突然拥挤的岛屿变得十分敏感而危险。吴石关心朋友的安危胜于自己，他一再催促父亲赶紧离开虎口。他们经过商量，安排我的母亲、二哥一家和妹妹于8月末9月初由基隆乘船到广州，然后转往香港。

吴石回台后，曾三次派人送情报到香港，其中两次是由他的亲信聂曦送来，一次是托我姑父的弟弟送来，都由他亲自封好，写明由我父亲亲

启。1949年12月，我父母和妹妹由香港回到上海。仅仅隔了几个月，便传来吴石在台湾遇害的消息。我父亲闻此噩耗，痛不欲生，致心脏病发作。父亲生前多次说：“吴石是为人民解放和祖国的统一牺牲的。”

1973年，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干预下，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吴石的夫人王碧奎女士当年也牵连入狱，吴石牺牲后，经故旧多方营救才被释放，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国洛杉矶。翌年冬，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亲，分离近40年后骨肉终获团聚。韶成兄妹带回其父在狱中秘密书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这是吴石留下的最后笔墨。他概述了生平抱负，表达了对妻子的歉意和深深的眷恋，亦表示不忘故人对己的恩惠。想到自己的两儿两女，他写道：“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末尾，留下一首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吴石，人如其名，他像一块巨石，坚硬、厚重、洁净，朴实无华，任湍流激荡，不改凛然身姿。

吴石丹心永照！吴石忠魂不朽！

忆父亲吴石最后的日子

吴韶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国14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举国上下无不欢声雷动。当人们正期待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时，内战阴影却逐渐笼罩中华大地。我们全家陆续回到久别的南京，租住于湖北路翠琅村1号，与父亲的挚友胡雄（时任江宁要塞司令）为邻。国民政府国防部改组，父亲任史料局局长，负责修战史，拟脱离内战干系。父亲在其《自传》中曾自我检讨说：“会性忠厚，待人以诚，一生成败皆系于此。以能尽力为人助，故能得生死患难之交。以待人诚笃，故或见款于小人，颇受其累！”回到南京以后，家中依然亲朋不断，父亲在客厅边通廊围一小客房，甚是简陋，但路过的南京同乡同窗，宁可不住旅店，也要在我家小住几天。如王冷斋伯伯（七七事变时的宛平县县长、福建闽侯人）、陈长捷伯伯（同里同窗、傅作义旧部，天津战役被俘，后特赦）、李黎洲伯伯（福州名士）、施秦祯伯伯（同乡同学，上海巨商）、吴仲禧伯伯（同乡同学），等等。仲禧伯伯因被诬告遭扣押，父亲愤而去找监察局局长讲理，并亲自派车接到家里住下。父亲不仅对友以诚，对晚

辈也十分关爱。我的高中同学好友罗伯鹏是个孤儿，毕业后无家可归，深得我父母的帮助，和我一道从贵州回到南京家中，和我同吃、同住、同游、同考大学，直到他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当了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农学院贝时璋教授的助手陈柏林，也是我在湄潭浙大附中读书时的好友，被诬中共地下党嫌疑，扣押于贵阳监狱。父亲不顾一切连电贵州省主席杨森，请求保



吴石（中）与家人在台北的最后合影

释，方免于难。父亲自诩，此生救人危难之事不知凡几。

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接收官员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泛滥成灾；滥发金圆券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父亲以爱国爱民赤子之心，极感焦虑，在家与挚友交谈，不断喟叹：“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他对蒋政权似已彻底绝望。李以勳（原国民党将领）在回忆文章中有关于蒋介石通过与亲信个别谈话调查下属的片段表达：

蒋问：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来，据报有厌战言论，曾多次向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话吗？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你在陆大肄业，听过他的课吗？你可谈谈他的情况？

李答：我1940年考陆大时，吴已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没有听过他的课。1942年陆大毕业回九战区见过几次面，他是从战略上来谈战乱问题，长期打下去会把我们拖败……今年5月底他来福州，邀我到温泉路家中吃饭，说福州易攻难守，福建是山岳地，便于打游击，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之国民党无可战之将，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饭桶。当今之计，从政略、战略、战术、战斗的诸方面看，一线之望可以持久者是守岛屿，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战。

虽长期在外，父亲仍关怀桑梓，始终情系家

乡父老。1948年6月，福州地区遭遇大洪灾，10万灾民无家可归。父亲邀在南京供职的闽籍友人商讨急救之策。除请求中央拨粮外，还发动捐资赈灾，他自捐一月薪资，并派专人赴沪找挚友施泰祯捐1万元，购置粮食衣被等，用轮船运至福州济灾。1948年底，父亲奉调回福州供职，他十分高兴，觉得可以为家乡做点事了。当时福州已处在战争前沿，为了保护市民，他设法尽力阻止在福州周围建半永久性工事。他私下曾对部属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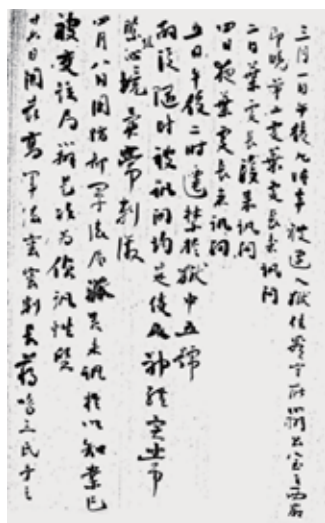
吴石将军在福州曾经居住过的“绛雪山房”，现在成了“聚春园驿馆”

信吴思敏说：“福州千年古城如遭破坏，将无颜面对家乡父老！”另外，父亲在离开福州前夕交代部属，妥存史料局保管的军事绝密档案 298 箱，其中有价值连城的“末次资料”，计 775 辑。

1949 年 2 月，父亲初到福州，当时正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和中共和谈。一天，父亲突然接到李宗仁电召他回南京并拟调任总统府参军长之职。正好学校即将开学，我跟父亲一道坐飞机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报到，父亲则住在太平路安乐酒店。4 月 1 日，南京学生举行大游行，警备司令张跃明下令开枪，发生惨案。第二天，我和几位老同学去酒店看望父亲时谈起此事。父亲对同学深表同情，说：“日子不会太久了。”同时还告诉我：“李宗仁下不了决心，他不接受中共八项条件，我在南京没什么事好做了，明天就回上海。”他给我留下身上仅有的 20 元美钞。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4 月 20 日，父亲从上海来长途电话，一再要我回上海暂避，他怕“子弹不认人”。我说：“几千个同学都留校应变，请父亲放心。”他说我来上海，可以转香港，也可以转北平念书。我仍坚持以不变应万变，迎接解放。我大哥美成于 1946 年夏从武汉大学放假乘船（东亚轮）沿长江东下回南京，不幸轮船失事沉没，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因此，父亲对我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4 月 22 日下午，解放军开始攻城，父亲又让江宁要塞司令胡雄在撤退时开吉普车拐到学校找我，要我立即随车撤离。我一再感谢胡伯伯在如此紧急关头还关

心我，但还是婉拒了他。从此我们一家骨肉分离各奔东西，一晃就整整一个甲子。第二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南京全城！4 月 24 日，也就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我去位于中山北路的原国民党海军部拜访了林遵伯伯（他在南京解放前夕率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林伯伯是父亲的挚友旧交，常来我家与父亲闭门谈事。当时，由于形势还比较紧张，我在林伯伯那吃了午饭就匆匆告辞了。

福州解放前夕，父亲受命与母亲、小妹学成、小弟健成飞台后，两岸隔绝，再无音信。1965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走访在北京白塔寺寓所的何遂伯伯。老人谈起 1949 年底逃离台北情景时声泪俱下。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情况很不好，父亲一再催促他赶快离开虎口，以防不测。父亲对他说：“我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块牌子掩护，你快走！”就这样，父亲替他买



吴石遗书（部分）

了去香港的飞机票，第二天亲自开车把他送到飞机场，直至上了飞机才离开。老人说：“你父亲和我40年之交，情同骨肉，非同一般。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不料从此竟成永别！”

1950年6月10日，父亲在台北牺牲两个月后，母亲被释放。她和16岁的小妹学成遵从父亲嘱托，含辛茹苦抚养年仅6岁的小弟健成。健成从幼稚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最后考取赴美研究生，依靠自己的奋斗，取得化学硕士。直到1980年5月，他才有条件把母亲接到美国洛杉矶定居。

我和留在大陆的大妹妹兰成，大学毕业后接受统一分配，一个到东北、一个到边疆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于1972年向中央申诉。幸得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直接干预，有关部门特派专人来河南说明情况。1973年11月15日，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函件形式“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并发给抚恤金650元人



1991年12月10日罗青长等接见吴石烈士子女的合影，右起依次为何康、吴兰成、罗青长、吴韶成、谢筱迺等

民币。我以党费名义全部上交。

1982年，我和兰成得以赴美探望老母亲，学成也从台北同时赶到。全家历经32年磨难，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母亲取出父亲在狱中写在画册背面的遗书。遗书概述生平抱负，对亲人的眷恋，对友人的感恩，交代对遗作存书的处置等，最后犹不忘记对儿女谆谆告诫，曰：“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勤俭家风则吾意足矣！”结尾赋诗曰：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吴石丹心永存，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家乡父老，无愧于列祖列宗！

1991年12月10日，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



安放吴石夫妇骨灰仪式后的合影



北京福田公墓吴石夫妇墓碑

罗青长同志，在北京西郊燕山饭店亲切接见我和兰成，在座的还有何康和谢筱迺。他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在“文革”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事，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的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做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1992年，小妹学成偕妹夫夏金辰来郑州，捧回了父亲的遗骸，在我家中供奉近三年，每年父亲生日都焚香拜祭。1994年4月22日，小弟健成从美国捧回母亲遗骸，我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父母合葬仪式。来自海内外亲属

好友百余人参加。何康在仪式上回忆往事，唏嘘不已。他说：“吴伯伯爱国爱民，渴望中国有一个光明前途。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化，蔑视降日将领，曾表示绝不直接参与内战指挥，不为蒋介石出一谋一策。他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和祖国统一大业，功垂千秋。他博学多才、廉洁奉公、忠厚待人、爱憎分明、两袖清风，在那个时代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是我们亲自看到和亲自受到教育的。”

公墓墓碑上刻着“吴石将军 王碧奎夫人之墓”，碑文经罗青长同志审定，由父亲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碑文全文如下：

吴石，字虞熏，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州。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后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军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三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忆昔抚今，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不禁潸然泪下。亲爱的父亲、母亲，安息吧！

被乔治国王授勋的福州水手

张兆浩

欧家唐是罗源县松山镇小荻新村下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养不起，从小就过继给欧姓同宗做儿子。他只在私塾里念了《三字经》《幼学琼林》便辍学。到18岁父母双亡，他无依无靠，谋生也日益艰难，这就产生了出去闯一闯的念头。

胶园囚笼

机会很快来了，一个名叫义德的人介绍他到福州打工，那年他22岁。他在工厂里很卖力，一个月后向老板领工资，说是已被义德领取；他找义德，但人已经不知所终。恰好这时听人说，到南洋做工很赚钱。于是被人“卖猪仔”，三易其手到了香港。一个风雨如晦的日子，他们一批人被装进底舱。三桅的木帆船在大海上不知颠簸了多久，最终到了新加坡。

第二天，他们就被押到森林的边缘。押送

人将他们交给当地的卷头发高鼻梁的主人。很快他们又被带到森林的深处，这里有一座座“阿答屋”，里面是一排排通铺，中国劳工们就是住在这里。接着还发给他们一把刀和一个灯笼，然后就带他们去参观森林。树木高大挺拔，郁郁葱葱，许多工人在那里用刀切开道口，很快，树的伤口处流出了白色的乳汁。原来这就是橡胶园，他们干的就是割胶的活。他们对外统一称“契约华工”，实际上被贱称为“猪仔”，所订的契约期长短不等，短则5年，长则10年、15年。

第五天，欧家唐这批劳工就正式上班了。他来的时候正是1月，春寒料峭。子夜1点，哨子就吹响了。劳工们立刻点亮灯笼，翻身起床，工头催他们赶快去吃早饭。接着就一长溜如一条火龙，向橡胶园蜿蜒而去。他们也学着开道口，让胶汁顺着三角形的道口流到挂在树身上的竹筒里去。

弓着腰割胶比插秧还要累，只割几棵，人就

腰酸背疼。但工头扬着皮鞭，一直催促，不让人有喘气的工夫。橡胶林深处除了猫头鹰发出阴森森的怪叫外，就是有的劳工因为割伤了树身而被抽打的“哎哟，哎哟”的痛苦哀叫。

虽然如此，只3个月的时间欧家唐就成为熟练工人了，他一个工作时段能割500多棵的橡胶树，所以工钱就比其他的人赚得多。但是工头有的是让劳工们工钱缩水的办法，因为按照规定，劳工不能离开橡胶园到外边去购物。工头在劳工们住的阿答屋旁开着杂货店，所有的日常用品，连同工作服都要到那里买，价钱比市价高3倍。就这样劳工们赚的血汗钱相当部分又被工头盘剥了。当然赚大头的还是碧眼卷发的作为殖民者的英国橡胶园园主。

到杂货店，欧家唐除了买生活必需品外，其

余一个铜板都不肯乱花。而有的劳工就买香烟甚至鸦片，也难怪，只有它们能解除工作的劳累，还可以让他们幻觉出天堂和美女。每当他们点燃长长的烟枪的时候，就有片刻的神仙腾云驾雾的感觉。

劳工们的工余生活很多消磨在赌博当中，纸牌、骰子、火柴都是最好的赌具。每逢输赢，都有欢呼声和哀叹声在阿答屋中萦绕。而当他们沉浸在狂热的赌博当中的时候，欧家唐就独自躲在一隅，用买来的簿子，甚至是别人遗弃的香烟盒，认真地记下英语字母，接着是英语单词，后来是简单的英语句子。不是没有思乡的情绪，每当皓月当空，他总在想，我的家乡是什么时刻了？乡亲们是不是又挤在灶门口烘火？他幻想着将来契约期满了，可以回家去娶一个家乡的姑娘，成一个家。

有没有想逃跑呢？当然有。这样的念头产生在他一次偶然看到橡胶园园主的桌上摊开的一本劳工花名册的时候，正巧看见自己的名字，下面赫然写着契约期“十年”。他的心像被鞭子猛抽了一下，十年，十年，现在才只干了两年啊，前面还有多么漫长的日子哟。

有一次，有人竟然逃跑了，可是很快就被五花大绑地



19世纪，新加坡橡胶园的华工

抓回来，吊在房子外的横杆上，剥光了衣服，两脚悬空，被工头的皮鞭狠狠地抽打。每下一鞭，就是一道血痕。他痛得嗷嗷叫。

春天对于劳工们来说并不是种植希望的日子，因为经常不是阵雨就是雨水连绵。每逢骤雨暴至，就会把胶冲走，那么意味着一天的活白干了。每逢淫雨，劳工们就只能望天兴叹，因为没有办法割胶了。没钱赚，但饭还是要吃的，那么啃啮的是积攒起来的辛苦钱啊。

夏天的橡胶园并不是乐园，夏天的雨，让橡胶园里多出了令人无法躲避的花脚蚊子和蠓虫，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整个兵团在以逸待劳，一闻到血肉之躯，就无孔不入地叮咬。所以劳工们都将衣服扣得密不透风。如果被疟蚊叮咬了，就易打摆子，这时要向工头买奎宁药，那是奇贵的。

囚笼里只有白天黑夜，只有春夏秋冬，根本没有阳历或阴历的纪年和纪日。欧家唐在簿子里用“正”字做记号，记下日子，用双手和肩膀丈量时光，终于熬过了十年的胶园囚笼生涯，获得了自由。这时阳光明媚，连阿答屋外的衣裳组成的万国旗也显得特别飘逸有致。

起锚远航

1916年，刚从“胶园囚笼”里“释放”的欧家唐倒觉得无所适从了，因为没有技术，很难找到工作，住了几天旅馆，身上所剩无几，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问了几家富人想给他们看门，

或做花园修剪工，但都被一一拒绝。一天他在街上闲逛，经过一家华人的律师事务所。里边竟然飘出一句地道的罗源话，他惊喜莫名，一问这人名张阿九，是罗源洪洋乡大厝坪人。异国遇老乡，又恰逢他目前这个境遇，确实让他热泪盈眶了。张律师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十分同情，劝他莫急，并热情留其先在他家住下。这时适遇英国好望角号货轮一个叫王阿有的船员病故，张律师找到英国船长希斯，船长见欧家唐长得高大英俊、身强体壮，就答应他用王阿有（Wong Ah YOU）的名字顶替上船服务，但要求他到新加坡船务学校接受3个月的培训。刚好好望角号在船坞里年修，要待3个多月时间。

欧家唐大喜过望，张律师也很高兴，两人结拜为兄弟。经过救生、防火、灭火、急救等12项训练，王阿有（欧家唐）取得《商船人员手册》，跟英国驻新加坡船务局签订了《船员定期雇佣契约》，为期一年。

5月里的一天，起锚机“咔嚓、咔嚓”地响，好望角号起锚出海了。和煦的阳光照着甲板，海鸥在飞翔，前面是无边无际的大海，王阿有的心随着船首犁开的浪花，澎湃欢畅，他想，新生活终于开始了。

但是事情远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快他就知道自己还只是个最下等的劳工，在他的上头还有乙级船员、甲级船员。

自然他干的都是粗活、脏活、累活，跟同样级别的外籍船员相比，他的薪资只有他们的一

半。这些底层的船员只能8个人住在一起，连吃饭也不能跟中高层的人同桌。虽如此，他干活还是很卖力。他见什么都新鲜，都好奇，都想学；特别是英语，跟英籍船员的交流让他的口语变得流利了。在这艘商船上干了一年后，拿到了“红簿”（合格船员的证书）。

1917年他跳槽了。他签了新约，也是一艘英国货轮，排水量达7000吨，要比好望角号大一倍。用他的话说，前甲板唱戏后甲板根本听不见，这艘商船名叫飞利浦号。

全船共有35人，底层的船员可以4人住一间。薪资也达到银圆50元，是以前的两倍。

他还是一名普通的水手，但已是熟练的船员了。他掌握了许多船上的规矩和业务知识。

每天早上7点起床，7点半早餐，8点船上的钟声一响，二车来要分配工作了，他们道一声

“Good morning”。水手们就在水手长的带领下上班。用铁锤给甲板除锈，为机车去污上油，换直流发电机碳精，洗整流器，查吊货机的水汀管子，清洗甲板，这些活他都干得十分老到。中午11点45分收工，下午1点下班，4点45分收工。

他不会赌钱，觉得那既劳神，也伤人情。当别人推牌九正热烈的时候，他就在船舱里看机械、航海气象等相关的书。

他渐渐变得富有幽默感了。有一次趁船长吹着口哨，牵着宠物狗在甲板上溜达的时候，他凑上去问船长好，还说，您要不要用我们本地的话称呼您的爱犬呢？船长高兴地点点头。他说，应该叫“依公”。于是船长就每天“依公”“依公”地呼唤着那狗，惹得所有的华工都笑得前俯后仰，大家似乎都舒了一口闷气。

远航是寂寞而单调的，海平线有如调皮的男孩，总是跟你保持着若即若离的间距。所以船员们总是盼着入港靠岸。这时候他们可以拿旧的衬衫、肥皂、香烟去跟当地的居民交换土特产，比如在印尼的圣诞岛，他们就以十分低廉的物品换了燕窝、鱼翅。

他们还去当地的海员俱乐部潇洒，跟貌美的姑娘跳舞。刚开始，他的舞步是那么的笨拙，嘴里喊着“一二三四”的拍子，但总把舞伴的肩膀捏得紧紧的，还不时踩了对方的脚。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已经灵动得像舞池里的



欧家唐获得的船员证书



乔治六世

白天鹅。

一个夏日的傍晚，大家晚饭后在甲板上欣赏落日。西天绚烂，海面熔金。忽然像有千万只的金色大鱼在水上活蹦乱跳，他知道这叫“鲤鱼跳水”，是要出现大暴雨的征兆。他立刻报告了船长，建议船长赶快用沙袋垒高底舱的门洞，船长倒是听进去了。第二天，果然阴风怒吼，大雨瓢泼，雨水要进舱，但被沙包挡住了。为此保住了5000包的面粉。

不久他晋升为水手长，享有单独的小住间，那是多么舒坦而惬意的事情啊。可以不再闻别人的汗臭和脚臭了，行动更加自由，也方便带货了。欧家唐几个来回就摸熟了交易的规则，比科班出身的贸易家更得心应手。他把印尼的燕窝、锡兰的宝石带到香港、上海出售，获得不菲的外快。这些钱，他到香港的时候将其中大部分托海员俱乐部汇到罗源一个同宗的侄儿那里，嘱咐多

少接济穷亲戚，多少接济穷乡亲，还留下一部分准备以后在家乡盖小学。

他头脑活络，升迁、赚钱已经让人妒忌眼红了，虽然他的人缘好，但谁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无懈可击。

有一次，海关人员上船检查，他正在船面工作，不知道。他的宿舍被撬开了，竟然从墙角搜出好大一包的鸦片。这是在利物浦。缉私和缉毒机构联合逮捕了他，不容申辩，将他强行扭走。他被正式起诉时，没有请律师，全凭自我辩护。他问，法官大人，为什么我人在船上，你们不通知我，而擅自打开我的房门？这是什么行为？再说，在我不在的时候你能不能保证没有人将毒品扔进我的房间？这是典型的栽赃诬陷！法官被驳得理屈词穷，只好当庭宣布无罪，释放了他。

从此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在船员中他的威望更高了，大家都尊称他为“老大”。

碧海丹心

“二战”爆发了，乔治号被编入商船舰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英国舰队运军事物资和给养。

1941年9月18日，包括乔治号在内的商船编队在太平洋上行驶，晴空万里，海天一色。当货轮走到东经153度、北纬10度海域时，突然船上警报声大作，在整个海域持续尖厉地回荡着。这时欧家唐正指挥水手们在甲板上除锈，铁锤砸得“哐当、哐当”地响。他举目北望，一架

日本轰炸机正朝乔治号冲来。他大声喊：“卧倒，敌机！”说时迟，那时快，已经能够看到飞机机身上的血红的太阳了。他见船长威利呆立着，立刻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猛地将威利扑倒，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压住船长。只听得“哒哒哒”的机枪声和船警“啪啪啪”的步枪的射击声，紧接着“轰轰轰”三声巨响。船体剧烈地晃动。这时他才看到自己的手已经鲜血淋漓。船长说，王，你受伤了。欧家唐说，没关系。立即脱掉水手服和衬衫，用口咬着，将衬衫前襟撕下一绺，船长帮他包扎伤口。

甲板上的人跃起，看见船头一处、船尾两处都燃起了熊熊大火。船长喊，赶快灭火。欧家唐也指挥水手，六个去船尾，四个留船头。他自己打开水阀门，用水枪朝大火激射，幸好敌人用的不是燃烧弹，大火在十几分钟内即被扑灭。大家松了一口气。今天太险了，船舱里运送的是500吨的柴油，如果引燃，后果将不堪设想。

事后，威利船长竖起大拇指说：王，好样的；王，好样的！

完成任务后乔治号停靠在新加坡码头。1942年2月上旬，威利船长很高兴地扬着右手把一个信封交给欧家唐。

欧家唐很认真地逐词逐句阅读信里的信件——

(西南1) 圣雅各宫爵士(骑士)
职位命令中央大法官
1942年2月11日

(亲启) 密件

先生：

国王将于1942年2月24日(星期二)在白金汉宫举行授爵典礼，请你出席参加。

必须在上午10点15分之前到宫。

应着公务服、早服或民防制服。

因不另发入场卡，进宫时应出示此信。

可向本府申请两张供亲、友参观作证受封典礼之参观券，并应在随函附表中提出申请。

请填写附表并立即送至伦敦西南1区(S. W. 1)圣雅各宫大法官爵士(骑士)职位命令秘书处。

函致 商船舰队
英国勋章水手长王阿有先生

秘书签字



授勋之后在白金汉宫合影



水手勋章

船长对欧家唐说：“王，现在是非常时期，看来新加坡很快就要陷落了。你只能坐皇家的军用飞机走，后天就要走。我们的商船舰队，可能也要撤到印度孟买去，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到达孟买了。王，你打算邀请哪两位亲友参加典礼呢？”

欧家唐很快找张阿九商量，让他看了邀请函和附表，张阿九很高兴能跟欧家唐飞往伦敦，见

证朋友的授勋，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第三天欧家唐和张阿九登上了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往西北方向飞去。他们都是第一次坐飞机，飞临千米高空，穿越云层，中间还在孟买、巴格达、的黎波里三地停留，绕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伦敦，足足用了50个小时。超长途的飞行使他们非常疲惫。

1942年2月24日，欧家唐和张阿九早上7点起床，按规定穿着整齐，8点坐专车出发。

他们来到白金汉宫，时间才上午9点。于是就被带领着先在大门外的铁栅栏前稍作停留。进栅栏后向右走过西北角，观看北翼宫殿。墙壁上悬挂的油画让他们大开眼界。离此不远的同一层楼的西翼，有十分豪华的白色客厅，吊灯高悬，四壁生辉。10点30分，一名仆役开动机关，白色客厅的20名被授勋的贵宾和其他客人惊奇地发现，整个一面墙霎时隐没于墙内护壁板中，国王和王室成员瞬时出现于人们面前。

乔治六世全身红色戎装，长方脸，神采奕奕。随着军乐队奏乐，被授勋的人已经整齐排列。欧家唐位列第十五，当国王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整个人自然挺胸，血脉贲张，心跳加速，这是任何时候从未经历过的。国王给他别上勋章，并跟他握手，他激动得手泽津津。

回到旅馆，两个患难与共的朋友，共同欣赏了勋章。这面金光闪闪的勋章正面铸着乔治五世的坐像和“为上帝和帝国值得嘉奖的服务”的英文短语，背面铸着“乔治五世设立”的字样。

戍台名将黄英

郑秀杰

黄英（1653-1728），字挺通，号颖公，系罗源县松山镇岐后村黄天禄之后。少有大志。历官左都督、台湾总兵，诰封“荣禄大夫”。在台湾治理期间，他能绥靖地方，立威行惠，刚柔相济，从而得到当地军民拥戴，立祠祀之。致仕归里，优游林泉7年。

黄英的祖上要追溯到黄膺一脉。据史料记载，黄耘，字公材，闽省罗源县人，为黄膺第十三世孙，黄执躬次子，登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梁克家榜进士，于孝宗淳熙三年至五年（1176-1178）任浙江平阳县令。其任期内，清正廉明，致力兴学，关爱百姓，政声卓越，留恋雁山鳌水，卸任后，经地方士绅及百姓极力挽留，择居毗邻于雁荡、蒲峰之平阳北港水头，并定居于“八角井”，后人称为“黄家庄”。黄耘后裔因宋末战乱，滞留平阳，过元朝，历经七代。至黄耘第七代孙黄亚方，因元末明初战乱，从戎有功，官职指挥，赐回籍闽地。于永乐二年（1404），载木主，携二男：长聪、次明，定居闽省古田县三十八都“站店前”；后裔又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迁居罗源“岐后”，成一

支望族，人称“岐后黄”，自黄英始，历康、雍、乾、嘉、道五朝，皆任武职显官。有“德显一门，父子兄弟三显爵；恩荣五代，高曾祖考十荣封”之谓。

黄英自小聪慧，经书史略无不精通。但天不遂人愿，黄英正值踌躇满志少年时，父亲黄绍伯早早就撒手人寰，留下母亲陈氏，带着黄英几个兄弟姐妹艰难度日。出身名门望族的陈氏，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苛，孩子们也听话，特别是黄英，虽说年纪不大却处处能“事母孝，事兄悌”。

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反清复明号召，在福建福州宣布举兵，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并向浙江、江西、广东三地发展反清右翼力量。随后，其势力迅速膨胀，并将上述三地大部分地区纳入势力范围，并联系台湾的郑经结成相互援助之同盟。

康熙帝见耿精忠势力骤涨，十分着急，立即扩充军队，并命康亲王杰书与浙江总督李之芳率兵出击。当时，亲戚劝说黄英等过了战事再投军，但他“应急国家所急”，故毅然翻山越岭，投身军营。

入伍后的黄英，凭借着机智勇敢，奋力杀敌而积功获迁。康熙十五年（1676）八月，耿精忠见大势已去，宣布投降。之后，尚之信也随即向清廷投降。至此，清政府才算基本把控了乱局。

康熙期间，东南沿海一带依然时常发生骚乱事件，特别是福建滨海，郑经依然盘踞澎湖列岛，他们厉兵造船，高举反清复明旗帜，随时有举兵反扑大陆迹象。这让清廷如鲠在喉，每愈拔之。随后，朝廷便着手组建水军，选拔精干将士日夜操练，借以时日，以平定滨海、收复台湾。这使得“谙习水性”的黄英，在从军期间发挥特长，如鱼得水。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已任福建水师守备的黄英，随施琅所部，带领着浩荡的舟师由铜山出发。十五日，部队抵达澎湖外围，次日便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在激烈的海战中，双方死伤惨重。二十二日，黄英率部在澎湖水域向明郑部队发起了最后总攻，经过一番鏖战，清军大捷，并乘胜追击收复了金门、厦门及澎湖36岛。紧接着，清军便长驱直捣台湾，其时已是强弩之末的明郑部队哪受得了此番凌厉的攻势？稍后便全线溃败，宣告明郑政权灭亡。

清廷收复台湾一统大业。举国欢庆之，便论功行

赏。因海战表现突出，清廷便拔擢黄英为左都督，通知即刻进京授衔。在别人日夜兼程地赶往北京时，唯黄英安排军中事务后，首先想到多年征战未见老母，在北上之前，就先行拐回罗源探望母亲。

由于母亲已风烛残年，黄英不忍遽别，等赶到北京时，已行期延误。“及陛见，圣祖仁皇帝（康熙）询来迟故”。黄英以实应答，天颜大喜。随即任命黄英为左都督管江南漕标游击事，并“御书唐句赐之”。

在江南漕标游击任上，黄英恪尽职守，不断累功获升迁。康熙五十三年（1714），黄英升金门镇总兵。《罗源县志》载：“任职期间，对兵、民关怀备至，兵民感德，为其立生祠，置田产，四时祭祀。”黄英在金门期间，甚得康熙看重，据史料记载，其前后上奏皆合帝心，“恩宠甚渥”。



罗源黄氏宗祠

康熙六十年（1721），兵部已奏准移台湾总兵驻澎湖，台湾陆路改设副将。命令已到，时任金门总兵的黄英深知此举不利保卫台湾，遂不顾个人安危，奏疏反对移台镇于澎湖。此疏条理明晰，加上福建水师提督姚堂也为之陈情，康熙帝最终推翻了兵部决定，台湾总兵仍照旧制驻扎。

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以朱一贵为首的一伙人借台湾知府王珍横征暴敛、民不堪重负之理由，遂组织武装力量于二十日在台湾各地起事，其来势汹汹，形势危急。

因台湾海峡浪高船少等条件制约，朱一贵发动哗变的消息直到五月六日才传到福建省城，清廷立马派出以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挂帅的援兵跨海赴台，并檄诏金门镇总兵黄英统领海坛游击李殿臣、罗源游击王良翰、福州城守营都司李经世等各路兵马防守澎湖，为后路协力策应、平叛。

黄英受命后，一方面加强布防，保证大陆—澎湖—台湾水道安全，以使供给线畅通；另一方面积极筹划后勤保障工作，安顿好集合在澎湖的大军后，又组织舰船向台湾运送粮草、弹药及伤员救助设备等，奠定了台湾平乱胜利的基础。

六月朔日，蓝廷珍在厦门誓师出港，于农历初八那天军至澎湖，与施世骠会议进兵。十三日，清军 12000 多人、船 600 余艘、舵手 6000 人，从澎湖兵分三路挺进台湾！之后，大军顺流直入，大破朱部，且连战皆捷，遂收复府治，擒拿朱一贵及其党羽王玉全等，槛送京师法办。至此，台湾之乱遂平。

在这次平乱台湾统一祖国的战斗中，黄英功勋卓著，而被调任台湾总兵。据《康熙罗源县志》记载：“此时兵革方靖，台民嗷嗷哀鸣，他绥辑地方，立威行惠，刚柔相济。”感恩戴德的“台地军民也立祠祀之”。

黄英的政绩屡受嘉奖，曾诰封三代。

黄英生有三子：正元、正清、正纲，分别历官处（州）金（华）总镇，大理寺右寺正，江南、浙江、广东三省提督。

颐中子在志书中这样评价黄英一家曰：“国家文武并重，马上之势未可少之也。罗之以从戎征讨，躬冒锋刃，或作长城万里，或作砥柱中流，绩标幕府，功绘台云，荣褒三代，庆衍云仍，庶几追踪韩范仲矣！岂白虎头猿臂，邑小而稀觐哉！”

黄英的故居，现位于罗源县凤山镇东门兜（原名黄府里）。坐北朝南，二层土木结构，进深三间，面宽四间，皆硬山式屋顶。有前大门、门庭、天井、书院、大厅及前廊。厅堂正中原挂有乾隆御赐“福”字匾（毁于“十年动乱”时期）。左右侧有一对木联曰：“一代硕儒登谏省，四朝元老镇岩疆。”

雍正元年（1722），年届七十的黄英告老休致，在罗源家乡过了 7 年悠闲的日子后，于雍正七年（1728）去世。其墓葬位于罗源县起步镇下梅岭西侧 180 米处的山腰处，坐南朝北，于清雍正六年（1728）建造。该墓三合土构筑，占地 200 平方米，主体已毁，今仅余左下侧墓手。

百岁青年一红楼

——记台江基督教青年会

汪 兰

早些年，带着神秘感，无数次路过“大桥头”那幢庞大而又古旧的红砖大楼，只听说，它是历史悠久的“青年会”旧址，却不知内里究竟藏着哪些故事。

2008年，台江区规划建设滨江旅游区，并对“青年会”进行修复开发。2011年10月10日，修复工程全面竣工。从此，这幢红楼的神秘面纱，终于在世人面前揭开，展露出它曾经无与伦比的一代风华。

追溯历史，青年会的全称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它创建于1844年的英国伦敦，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服务团体，全球有14000个地方青年会，分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的122个国家和地区，会员逾4500万人，它的服务宗旨是促进会员德、智、体、群全面发展。

1905年，美国基督教青年

会协会传教士马拉林、裨益知在福州创办基督教青年会。1910年，中国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亲密战友、祖籍闽清的爱国侨领、62岁高龄的黄乃裳先生接任福州基督教青年会会长。为方便联络各界会员人士，他于民国元年（1912）决定在苍霞洲筹建新会所，并带头捐款45000银圆，购置地皮。接着，他又以会长名义向各界募集5万银圆。当时，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英国基督教圣公



百年后的青年会变成集餐饮、娱乐、休闲、商业为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中心



1914年福州基督教青年会会堂奠基



青年会一楼奠基时，奠基石安装在墙角

会等也共同筹集资金，支持福州基督教青年会兴建会所。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美国第32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为其捐款12万美金。据说，在此之前的1906年，罗斯福因成功调停日俄战争获诺贝尔和平奖，这笔款正是所获得的全部奖金。由此看来，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的建成，也是当年中美之间十分罕见的一次文化交流。

青年会会址选在台江苍霞洲的闽江北岸，地处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大桥头”西侧，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8156.4平方米。其建筑外观为英国哥特式，周以石砌墙基，红砖墙面，内为砖木结构。其平面为长方形，采用中西合璧布局，前楼三层，后楼四层，中间以大天井相隔，天井两侧设有回廊，又把似断实连的前后楼连在一起。后楼中为戏台，戏台两侧设有会场和灯光球场。全楼地板均用上等楠木铺设，显得

雍容华贵。登斯楼也，人们还可在观景台上凭栏远眺，闽江、万寿桥、中洲岛及南台岛水陆风光尽收眼底，江风徐来，帆樯远去，车水马龙，何其快哉！

此楼1912年动工，历时4年，于1916年竣工。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的这位“百岁青年”，不仅健在，且风采不减当年，不能不让人倍感珍惜。

遥想百年前，它刚建成时，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道，规模宏大，建筑精美，气势不凡，立即成为福州市万众瞩目的标志性建筑。它既是福州近代史上最早、最大的综合性大楼，也是福州当年最时尚、最豪华的文化娱乐场所。

其内部设施，大体具备三大功能：一是为青年会本身提供必需的办公、开会场所。二是为青年会所属学校提供校舍——该校初名青年会书院，1927年改名私立青年会中学，1933年又改名为福州私立青年会商业职业学校，这是一所福

建最早具有商科性质的学校，培养出大批现代财经人才，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郑作新、唐仲璋、陈良惠等著名专家学者。三是向社会提供一系列时尚、新潮的文化娱乐设施，包括向青年会会员及社会公众开放的图书馆、电影院、健身房、游泳池、淋浴房、歌舞厅、西餐厅、咖啡馆及专供男宾客住宿的高级旅社等，与此同时，还设有当年福州唯一的室内灯光球场，可供篮球、排球双用。

青年会众多的功能配置，让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当时，许多知名人士、社会贤达纷纷

慕名来此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其中，也有来自国外的专家学者。如1921年春，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杜威，就曾6次受邀来青年会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极力倡导科学与民主精神，时值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因此，他的演讲深受福州进步青年的欢迎。

当年，青年会里呈台阶式的电影院，是福州第一家电影院，福州历史上第一部无声电影就在此放映。1925年，与冰心、林徽因并称新文化运动“福州三才女”的著名女作家庐隐，在回乡执教期间，就曾涉足青年会，她在1926年《小说月



如今的福州基督教青年会

报》第17卷第11号上，发表散文《灵海潮汐致梅秭》，其中，特意描写了她来青年会看电影的情景：“有一次我和玉秭到青年会看电影，那天的片子是《月宫宝盒》，其中极多优美的风景，使我麻木的感想，顿受新鲜的持久刺激，那轻松的快感仿佛置身另一世界……”这段描写虽然不长，但却为我们留下早期青年会电影的历史记忆，弥足珍贵。

与青年会关系最密切、有关著述最多的，当数著名作家、抗日革命烈士郁达夫先生。1926年12月初，郁达夫初到福州，并短暂停留，他在日记中记述南台的景象是“帆樯密集、商务殷繁，比福州城内更繁华美丽”，“12点，在酒楼食蚝，饮福建自制黄酒，痛快之至”。字里行间表达了对福州的良好印象。时隔10年之后的1936年2月4日，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他第二次来福州，就下榻于青年会4层楼上的一间客房。2月15日，郁达夫在青年会发表公开演讲《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指出：“今后新文学的趋向，将以中国民族解放为中心，而写作的方法，仍旧继承着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所提出的新写实主义。”在演讲中，他还谴责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提出应该继承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千余听众“挤得讲堂水泄不通”。

在此期间，郁达夫还在青年会接待了大批来访者，并应邀题写了大量诗词条幅，据他日记所记，仅3月31日晚就“写了百幅内外”。

在演讲频繁、造访者又多的情况下，郁达夫

仍然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有从2月4日至4月20日的《闽游日记》《浓春日记》计3万多字，又有总题为《闽游滴沥》的福州游记多达6篇。这6篇作品，学识渊博，文情并茂，堪称现代福州全景式的文学记录，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游记精品。特别是他在青年会4楼，凭窗眺望闽江及万寿桥后，写下了如下赞语，至今读来，犹让人双眼一亮，心潮难平：“水色的清，水流的急，以及湾处江面的宽，总之江上的景色，一切都可以作为一种江水的秀逸的代表；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没有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国的莱茵，我想这譬喻只有过之，决不会得不及。”

然而，在经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华之后，青年会却一度陷入它最屈辱、最悲惨的不幸命运。1941年4月，日军占领福州；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惨遭日军占领的青年会，被改名为所谓“东亚乐园”，赌场、妓院、鸦片、窝赃……沦为日寇和汉奸们横行霸道、藏污纳垢、发泄兽性的虎狼窝、销金窟和淫乐园。

对此，富有革命传统、不甘当亡国奴的台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与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福州沦陷之前的1938年至1939年，青年会就组织了“福州青年会民众歌咏团”，参加者有店员、学徒、教师、学生、工人、士兵、公务员和家庭妇女等，他们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排演《放下你的鞭子》，并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

传。在抗战期间，福州青年会充分发挥其沟通海外广大侨胞与国际友人的特殊作用，积极宣传联合抗日。与此同时，福州青年会还及时把会所的地契、房产证等全部交给美国驻福州领事馆保管，这才使会所以得保全，并在光复之后重现生机。

此后，在解放战争中，青年会是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下的重要情报据点和地下交通站。在福州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代表谢晓玖在福州青年会工作整整半年之久，为福建省福州市的解放提供了有力的支援，是福州市获得解放的历史见证者。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青年会几经折腾，渐渐归于沉寂。此后，它长期被一所中学所借用，直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2008年，它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成为台江滨江旅游区的一大节点，进行大规模的修复和开发。如今，青年会主楼已被政府认定为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夏，笔者随省作家采风团来此参观，有幸重睹芳华。但见其前楼、后楼的楼上楼下，大天井及其两侧的回廊上，布满各式餐厅、饭庄、茶楼、酒吧、咖啡厅以及新式电影院，络绎不绝的宾客尽可来此品尝福州美食，观赏闽江美景，或观看最新上映的院线电影。然而，笔者也略感美中不

足，即作为台江区乃至福州市的一处文物单位，一幢具有百年历史的著名建筑，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其珍贵的历史记忆，却尚未得到应有的充分展示。

我想，有关青年会创始人、民主革命家和爱国侨领黄乃裳的光辉生平，有关著名作家、抗日革命烈士郁达夫在此所写的诗文及书法作品，有关我党领导台江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和迎接福州解放战争的史迹，有关这座百年红楼兴建及重建的历史，都是对今人和后人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珍贵教材，理应在此加以宣传和展示。听说，黄乃裳生前亲笔题词的“自强之基”石碑，至今仍保留在仓库里，那么，何不把它抬出来，重新矗立起来，以昭示后人，发扬光大？！

毕竟，全台江全福州，只有这么一座“百岁青年一红楼”。



青年会一楼原本有电影院，福州第一部无声电影就是在这里放映

“苍霞精舍”的前世今生

李景端

清末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曾有诗：“译才并世数严林。”这里的“严”“林”，分别指福州两位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后者更是绝无仅有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

林纾，字琴南，1852年11月8日生于今福州市。1882年他在台江苍霞洲，建房5间居住。1897年春，迁往新居下杭街之前，他会同奔丧回闽的邮传部尚书陈璧、农工商部员外郎力钧、奉天河北道孙葆缙等人，在他的苍霞洲旧居创办“苍霞精舍”，这是绅办新式学堂。林纾任汉文总教习，给学生讲授《毛诗》《史记》等。“学生晨受英文及算学，日中温经，逾午治通鉴，迨夜燃烛复治算学”。1898年戊戌变法后，学校增设学科，教习英文，但因校舍狭窄，不敷应用，迁址到了道山路乌石山蒙泉山馆，改名绅立中西学堂。此后校名校址几经变迁，演变成现今的福建工程学院。

林纾携母及妻女，曾在“苍霞精舍”旧宅居住15年。这期间，他与王寿昌等友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等180余种外国文学



林纾53岁时和妻子、女儿合影

作品。“苍霞精舍”，一度作为林纾的故居，又是福建工程学院的前身，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历史积淀，具有珍贵的价值。

“苍霞精舍”旧址，1927年被先父李仲青三兄弟共同买下，一直供作民宅居住。其中先父拥有的前进部分，几年前因拓宽道路被拆除，但其兄弟拥有的后进部分尚保存至今。2015年福州旧城改造中，这仅存的部分“苍霞精舍”旧址，又面临着被拆除的厄运。

鉴于这座“苍霞精舍”老屋既是林纾住了15年的故居，又是百余年前我国早期新式学堂的旧址，虽然前进已拆，但后进基本保存，仍具有传承文化的历史价值，2014年10月，我在福州“林纾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上发言时，吁请政府有关部门务必保留这处文化古迹。恰好时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书磊同志也与会，听了我的发言后对此非常重视，嘱我赶快将此事的相关材料送给他来处理。福建工程学院的领导，当天下午也派车同我一起去古屋现场寻旧。

星移斗转，苍霞洲已大变样。当我们走进正在拆除中的“苍霞精舍”古屋，只见屋顶瓦片大半被掀，部分窗户也已拆卸，但房屋梁柱结构尚

未动，再加修整，可以整旧如旧。工程学院的来人，当即现场拍照，连同我写的材料，次日就赶送宣传部领导。过了一天，我接到电话，要求我提供这座古屋的房契复印件，我迅速照办了。看着事情抓得这么紧，挽救这座古屋的希望，顿时增加了许多。

2015年伊始，果然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喜讯：福州台江区政府决定停拆“苍霞精舍”遗址，立即派人对已拆部分紧急加固，下一步将把这所林纾故居及“苍霞精舍”遗址，复原建成一处历史文化景点。

得知这座历史古建筑被留下的消息，我在欣喜之余，不禁联想起在这所“苍霞精舍”中，曾发生过的其他历史故事。

其一，1933年，国民党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州成立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时，时任福州商会会长的先父李仲青，曾与这个政府的委员章伯钧、欧阳予倩等有过交往，并积极支持配合他们的工



苍霞公园

作。政府秘书长彭泽湘，还一度住在先父家。“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撤离时，先父拿100块银圆资助彭泽湘做旅费，彭则回赠先父一把手枪，并委托先父安置他未带走的勤务兵。国民党重新掌控福州后，先父不得不花了几千银圆疏通，才躲避了蒋政权的秋后追究。

2006年，我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欧阳予倩不为人知的一段经历》，文中回顾了上述这段历史，讲到1952年我在北京铁狮子胡同1号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时，曾前往邻近学校的欧阳予倩家看望，并打听彭泽湘的去向。不久，《文汇报》转来了住在上海的彭泽湘孙子的来信。从此，我与他，以及在岳阳的彭泽湘女婿，连续上了上一辈人的友情。后来得知，新中国成立前夕，彭泽湘作为党外名士，曾为我军和平解放北平出过力，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出版社担任俄文翻译。

其二，从“苍霞精舍”曾经走出多位不同时期有过影响的人物。主要有：

李景森，我的二哥。2016年12月8日，在北京海军举行的我国收复西南沙岛70周年纪念大会上，95岁高龄的李景森，与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合影，并在会上发言。因为他是当年驾着美国援华的军舰，前往收复南海群岛的“永兴舰”副舰长，是我国恢复西沙南沙群岛主权这个历史事实，当时唯一尚健在的见证人。

除李景森外，我的叔父李志浩，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顾祝同等均是同学，民国初期参加过北伐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了台湾经商。我的堂兄李景禧，留日的法律学者，曾任民国高等法院推事，新中国成立后任厦门大学法学教授、民革厦门市副主委、全国人大代表。另一位堂兄李景星，是澳大利亚植物环保专家。这些



20世纪90年代苍霞洲扩建为江滨大道前，“苍霞精舍”旧址的沿街门面



“苍霞精舍”遗址

从“苍霞精舍”走出去的人物，均在一定程度上为这座历史古建筑，增添了人文色彩。

其三，“苍霞精舍”所在的苍霞洲一条街，位处福州台江闽江北岸，因泥沙淤积日久成洲。原名“仓下洲”，后因此处可以看到对岸“仓前山”倒映在闽江水中的晚霞，明时有文人雅士将“仓下”改为“苍霞”，寓意“盐仓前的晚霞”。

明清以来，苍霞洲不仅有“苍霞夕照”，这一南台名胜，也是闽江航运重要码头。清末福州辟为“五口通商”之后，闽西闽北土特产大量在此集散交易，街市日趋繁荣。旅社、饭馆、茶楼、戏场等各行业，应运而生。鼎盛时期，仅茶行就多达60多家。1907年英商在苍霞洲设立美打洋行，卖鸦片毒害国人，使得繁华的苍霞洲也难免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翻译《天演论》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1854年1月8日出生在苍霞洲一户中医之家。当今苍霞公园（亦称天演公园）内的佛肚竹中，还耸立着由严复孙女严倬云题词的严复塑像。林纾在苍霞洲住过15年。他写有著名随笔《苍霞精舍后轩记》，其中有“余家洲之北，湫隘苦水，乃谋适爽垲，即今所请苍霞精舍者。屋五楹，前轩种竹数十竿，微颺略振，秋气满于窗户”，“斜阳满窗，帘幔四垂，鸟雀下集，庭墀阒无人声”之句，从中可体会苍霞洲当年的人文气息。

民国以后，随着福州台江、中亭商业街的兴起，苍霞洲的商业功能有所式微。但在这条街

上，仍然保留着许多耀眼的景象。其中有：

一、1912年由闽籍爱国侨领黄乃裳倡导，从海外募捐经费，在苍霞洲建成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基督教青年会。设有西餐厅、理发厅、淋浴室、电影院、游泳池、健身房、图书馆、阅览室、会议室等，是福州近代最早最大的一座综合大厦。新中国成立后几度改组，变成如今的市民休闲之所。

二、英国圣公会1927年建成的福建教区主教座堂，可容纳千人做礼拜。基督教苍霞堂，在全国教会中颇有影响。1950年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签名活动，就是从苍霞堂开始的。

三、19世纪三四十年代，狭小的苍霞洲，除拥有青年会中学和萃文小学之外，还坐落着两所当时很有名的私人医院。一所是王灼祖医师诊所。王灼祖是留学归国的医生，施行西医治病，帮助百姓卫生防疫，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另一所是复人医院，洋房洋设备，是当年苍霞洲地标性的建筑，可惜后来毁于火灾。

四、苍霞洲救火会。早年福州多是木屋，火灾频发，以至催生出一支民间自助的救火队伍，由乡绅出钱，乡里出力，随传随到。由先父资助、并以“苍霞精舍”为联络点的苍霞洲救火会，是当时组织健全、设备充足、管理严密的高效救火队。除救火外，还承担地方年节庆游、龙舟竞赛、抗旱祈福、打更巡防等公共事务，显示出公众支持公益的参与意识。

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杨国桢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太平洋与印度洋沿线国家海上交往的大通道，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记录，是汉武帝时代从徐闻、合浦港出发到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迄今 2000 多年。福州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的中端，从闽越国的都城到汉代的沿海港口城市，促使了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和发展。



壳丘头遗址出土的贝壳

汉至隋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

福州很早就有原始人群的海洋活动，滨海地区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的有平潭岛“壳丘头文化”遗址以及闽侯县石山文化遗址。这两处发现，见证了福州沿海先民开发沿海滩涂及海岛，进行大规模的贝类采捕的历史。战国时期，福州濒海人群已经从散落的聚落发展出了早期地域性的国家组织——闽越国。闽越国独立存在近百年，始皇二十五年（前 222），被秦始皇废除，以其地设

置闽中郡，然而不久便“弃弗属”，没有直接派官管辖。秦二世而亡，汉高祖五年（前 202）刘邦以闽越“从诸侯灭秦”，封无诸为闽越王，复立闽越国为汉诸侯国，以东冶为都城，即今福州。闽越国在汉代存续 92 年。闽越人“便于用舟”，与海外贸易往来。“习于水斗”，经常向邻国用兵，不服汉朝统治。元封元年（前 110），汉武帝兴师进攻闽越，海上一路从浙江直接攻击闽越国的国都，闽越王余善被刺杀。闽越国覆灭，改设冶

县，县治在今福州，后更名东部侯官，隶属会稽郡，福建被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体系。沿海闽越人接受汉朝的统治，与内地迁移而来的汉人杂处一起，把造船航海技术流传下来，使昔日的闽越国都城逐渐转型为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

西汉时，东冶（今福州）与中原的海上交通不断，又是南海贡品北上的航路必经之地，“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但由于海路航行风波艰阻，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海难，东汉章帝时，开辟了经湖南至广东而后出海的陆上交通，于是改走陆路，海路遂衰。东汉末年，福建仍然仅有一个冶县，作为会稽到岭南的航海补给站，管辖范围很小，汉人极少。那时候，中原战祸频仍，许多士民避乱东南，乃至逃往海外，他们当中就有借道福州，而后乘船往南的记录。

《三国志》中记载了名士许靖等人从会稽逃往交趾的路线，“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

三国时代的孙吴政权（222-280）是中国第一个南方王朝，割据东南大片土地，重视海洋发展。是时，在侯官县（今福州）设立“典船都尉”，负责督造船只。都尉营的位置，据《八闽通志》记载在福州开元寺东直巷。之后又在今天的霞浦附近设置“温麻船屯”，建造海船。孙吴政权完成的两次航海壮举，离不开福州提供的海船与航海人才。

晋代以来，由于中原陷入长期战乱，引起大规模的南下移民潮，部分汉族移民涌入福州。

北方汉族移民与土著闽越人的融合，产生具有海洋性格的“汉化越人”和“越化汉人”的社会群体，走向海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生力军。

南朝梁（502-557）、陈（557-589）之际，原晋安郡南部、西南部地析出设置南安郡，新的晋安郡主体管辖现在的福州、宁德地区。此时福州港，北与海上丝绸之路东路航线的日本连接，因而《南史》有“扶桑与晋安通”之说；南与海上丝绸之路西路航线连通。西晋时，佛教传入福建沿海，至南朝时兴盛。1975年在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发现的南朝古墓，蕴藏着大量佛教元素，内壁砌砖模印纹饰繁多，以莲花、忍冬为主，间以青龙、白虎、宝相花、诵经僧人、供花僧人、侍者、宝瓶、宝相连珠等，这些纹饰多与佛教题材相关，陪葬品中有一件青釉博山香炉，也直接体现了墓主的佛教信仰。

隋朝灭陈。平定福建之后，隋朝统治者鉴于沿海豪强长于水战，依托山海洲岛，与朝廷对抗，遂下令“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剩下的只是小船在沿岸采捕，严重打击了福州民间海上交通。

唐五代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到了唐代，统治者奉行开放的对外政策，许多外国使者、商人、文化交流者纷纷来华，海上丝绸之路出现了一个小高峰，福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的重要节点。

唐初，当时主政福建的王义童积极恢复福建的海外贸易，一方面招徕商客，另一方面引导海上人群开展海洋活动。外国物品纷纷流入，文献有记福州“境接东瓯，地邻南越，言其实利，则玳瑁、珠玕”。

中唐以后，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阻隔，中外间的交流更需依赖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港与外部联系更为紧密。东洋航线与日本的交往得到进一步发展，日本使者、商人、僧人都曾乘船到福州，唐代后期更可见中国船只驶往日本。日本桓武朝派出的遣唐使船，一艘于延历二十三年（804）抵达福州长溪县（治所在今霞浦县）；唐末，日本废除遣唐使，中日间文化交流、贸易流通多通过中国船只搭载。公元853年，唐朝商人铁良晖的船只从日本回唐，在海上航行6天后抵达福州连江县，带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

南洋、西洋航线，福州的交往范围比以前更加广泛。东南亚海洋强国室利佛逝（三佛齐）是沟通东亚与西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与唐朝有良好的互动。该国时常派使节到唐朝朝贡并开展贸易活动，与福州当局开放港口、积极招徕外商有直接的关系。

四方人士的会聚，使福州成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贸易兴盛、文化多元。当时一些文人骚客留下了许多诗赋，来描写福州的社会文化。唐末周朴《福州神光寺塔》诗云：“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方戴福州城。”给人们展现了福州与日本海上航行的图景。当时在福州任节度推官的闽人黄滔，写诗描绘了大船从福州出海谋利，不畏风涛的景象：“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凿上路，何如少经过！”福州海外贸易欣欣向荣，贾客云集，可称得上是东南一大都会，其交通地位也直追扬州、广州。

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在福州港这个节点留下了一些文物，它们向世人直观展现了这段历史。1958年在福州出土唐代元和八年（813）的《球场山亭记》残碑，碑文中描绘了当时的福州“迺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说明当时的外国人不仅到福州贸易，有的还留住下来，异邦风俗交杂，当地也深受熏染。为了管理侨居的海外人士，朝廷还设置了“都番长”一职，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闽安村邢港古渡，码头东侧连接迥龙桥。迥龙桥曾是海外贸易的必经之地

《唐会要》记载了都番长蒲诃粟（Abu Hasan）的事迹，天祐元年（904）六月，“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船只进出福州通常要在闽安镇经停，以便检查、课税、候风，至今该处还有邢港古航道，以及保留着一座横跨航道，始建于唐末的五孔古桥——迥龙桥。怀安窑所产瓷器，深受喜爱，远销国外，现出土多件精美的怀安窑瓷器。

五代时期（907-979），福建出现地方性的海洋王国——闽国。其开创者王审知，在唐末动乱中于福建割据一方，至公元907年被封为闽王。王审知治闽时期十分重视海上贸易，唐末开辟了甘棠港，其地理位置存在争议，一说在连江，一说在福安，但连江、福安当时所属的连江县、长溪县，皆在福州管辖之下。该港在五代时期，与福州、泉州一道成为闽国向海洋用力的三大重要

港口。王审知开甘棠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船只北上进贡或贸易，以及外国商船来闽遭风涛所阻，有沉溺危险。随着船只的不断到来，甘棠港日渐兴盛。

福州是闽国的都城，海外交流十分繁盛，依旧是福建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宋代梁克家的《三山志》说道：“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海船乘着潮水出入，闽江两岸停泊着大小各类船只，使福州成为海舶河舟的荟萃之区。东西

洋各国使者、商人纷纷来闽。据记载，福州金身罗汉寺，原有三尊铜佛像，“伪闽王时，高丽所献”。东南亚国家，如闽天德二年（944），“占城遣其国相金氏婆啰来，道里不时，遍体疮疥”，到福州龙德门外汤院，一洗即愈。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闽国在福州设立“榷货务”，专门负责船货的征榷事宜，永隆元年（939）改称“市舶司”，后移到泉州。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创设，标志着闽国海外贸易逐步走向成熟，通过发展海洋经济获取的税收，对维持闽国政权的运转起到有力支撑。

福州也发掘出土了在这个阶段数件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物。1965年2月，福建省博物馆在福州市北郊新店公社战坂大队莲花峰发掘了闽国第三主王延钧妻刘华墓。出土文物中，有来自波斯的孔雀绿釉陶瓶，头戴伊斯兰帽饰的男俑。

宋元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地位的下降

宋朝建立后，设市舶使专管海外贸易。市舶司港口城市是合法的海外贸易口岸，福州不是市舶之地，其海外贸易地位受到削弱。虽然如此，宋前期福州已然发展为福建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沿江、沿海商品的重要集散地，与海外仍保持交往。

福州的商人曾前往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据记载，天圣年间（1023-1032）福州商人陈文祐两度赴日经商，周文裔到日本进献“方物多种”。远赴高丽的福州商客也多有记载，如“宋福州人虞瑄等百余人来献香药”，“宋福州人陈象中等来献土物”。

外番商船也多有抵达福州贸易。在东南亚至福州的这条传统航线上，“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有父子同载至福州”。仁宗天圣三年（1025），审刑院大理寺言“监察御史朱谏上言，福州递年常有舶船三两只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珍珠、犀象、香药等，致公人百姓接便博买，违禁宝货不少”。

但是，由于元祐二年（1087）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垄断了福建海外贸易，宋元泉州之繁盛将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带上顶峰，福州也因此而不再耀眼，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段的主导港口让位泉州。此后福州港多转为国内沿岸贸易，海



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瓷器堆

外贸易的船只不多，一些是以偷越走私的方式进行。元代，朝廷为削弱蒲寿庚家族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曾在福州设立海船“万户府”，有过短暂开放。

丝绸、漆器、瓷器是福州对外输出的重要物品，目前已考古出土了一些宋代精美丝绸、漆器。1987年，广东阳江市海域发现了一艘南宋晚期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船上搭载有福州义窑的瓷器。此外，在福州海域也发现了多艘宋元沉船，如连江定海“白礁一号”南宋沉船遗址，平潭草屿海域的南宋沉船、大练岛一号元代沉船遗址。福州还有一些元代阿拉伯人留下的遗存，如市西北郊的圣山墓亭，即为阿拉伯人之墓。八一七北路清真寺也存有元代阿拉伯人的墓碑。

明清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

明清两代，朝廷奉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福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主要体现在官方的

海洋活动。

一是，明初郑和下西洋，福州是重要的航海基地。船队福船在福州建造。福州还是郑和船队出洋的重要起航点，史载：

永乐三年（1405）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

永乐七年（1409）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泊，十二月福建五虎门开洋”。太平港，旧名“马江”，“永乐七年内寺郑和使西洋海舟皆于此，因改今名为太平港”。

永乐十年（1412）郑和第四次下西洋，驻泊长乐时，曾“登云门山，重建云门寺”，“驻军十洋街，人物辏集如市”。

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在太平港驻泊后开洋。

宣德六年（1431）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在太平港驻泊10个月，在南山修建了三峰塔寺、三峰寺塔、天妃行宫和三清宝殿等建筑，建立“天妃灵应之记碑”。但今仅存三峰寺塔和“天妃灵应之记碑”，余均塌毁了。

长乐保留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史迹颇多，最有



柔远驿

名的便是郑和在长乐南山修建的“天妃灵应之记碑”，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详细记载郑和七下西洋的石碑，碑记全文 1177 字，记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和所历诸国及在长乐活动情况，现保存于福建长乐郑和史迹馆内。

明初郑和下西洋招徕海外国家进贡，也有以福建为出入港的。如永乐六年（1408），勃泥国王那惹加那一行来朝，就是先到福州然后去南京。永乐十八年（1420），古麻刺国“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子刺封王。归次福州病卒，赐谥康靖，敕葬闽县，有司岁祀”。

二是，明清通琉球的指定港口。明前期接待琉球使节和贡船的市舶司设在泉州，成化十年（1474），福建市舶司迁移到福州，设立“柔远驿”接待琉球客人，民间称之为琉球馆。清承明制，仍以福州作为琉球朝贡的唯一驻泊港口。目前较好地保存在福州市台江区琯后街的“柔远驿”旧址，见证了这段历史。

中琉双方使团的路线，从中国往琉球，自福州出发，从东涌（福州东引岛）或梅花（福州长乐）开洋，经我国小琉球头、彭家屿、花瓶屿、钓鱼屿、赤坎屿，进入琉球国的古巴山、那霸港（今冲绳之那霸市）。从琉球往中国，从那霸港出发，经古巴山、麻山、东路山、半堂山、乌麻山、官塘，到福州闽江口的定海千户所。

这条航线上不单有人员往来、文化交流，还有商品的流通。从琉球带来的有从东南亚转贩而来的香料、苏木、胡椒、锡、硫黄等物品，从

福州带去的有棉布、锦纱、丝布、瓷器、药材等物，再经琉球国转贩到东南亚，填补了明朝海禁退出的空白，造就了琉球的大航海时代。明初赐予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为琉球海外贸易成为“万国津梁”发挥了主导的作用。

万历年间（1573-1620），长乐赴菲律宾贸易商人陈振龙，将薯种和种植方法引进福建。万历二十三年（1595）发生饥荒时，其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建议推广种薯度荒，结果救活不少人，后人在福州乌山建有一座先薯亭，以纪念从吕宋引种、推广番薯的福建商人陈振龙和巡抚金学曾。日本长崎是 16 世纪以来东亚华商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有许多福州人来到此地。1629 年，福州籍高僧超然到来，在此修建了崇福寺。明永历八年（1654），福清僧人隐元抵日，1659 年在京都创建“黄檗山万福寺”，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鼻祖。

清廷消灭了海上抗清力量后，在福建设立闽海关。福州虽允许对外贸易，获得短暂发展，但在雍正五年（1727），朝廷指定厦门成为福建唯一的对外通商正口和商船出洋总口，福州港的海外贸易又趋于沉寂。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广州是清廷指定的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广东十三行独揽海路而来的中西贸易达 80 年。福州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1840-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福州被动开放通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和谐的秩序荡然无存。

钩沉历史话福州

赵麟斌 黄曦

清末，在福州居住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曾著有《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内容主要是描写150年前福州人的日常生活。书中开篇第一句话便是：“福州——有福之州，是福建省的首府。”自此以后，福州便以“有福之州”的形象为世界所熟知。

其实，早在古代，福州便被赋予了土地肥沃、百姓安居乐业的福地之意。

从福州的称名看其美好蕴意

“福州”的称名历史久远。乾隆《福州府志》载：“福郡，古闽中地。其称郡也自秦始，其领郡也自晋始，其称福州也，自唐开元始，其名福州，而因名福建也，亦自开元始。先福州，而后福建，盖福州之名近古矣。自唐后，大府俱治

福州。”

福州的称名曾历经多次变迁。

秦代，福州属于闽中郡，《史记》《汉书》中都有“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的记载。

西汉时期，福州曾作为闽越国的都城，称“冶”或“东冶”。据记载，汉高帝五年（前202）在福州建立闽越国的都城“冶”，又称“东冶”；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在福州设“冶县”。

东汉建安初（196），福州由“冶县”改为“侯官县”。

西晋太康三年（282），福州属晋安郡，同时析侯官县的东部地置原丰县为郡治；泰始四年（468）曾改为晋平郡。

南朝陈永定元年（557），设闽州，为福建单独建州之始，以侯官县和原丰县为州治。陈天嘉六年（565），撤闽州；陈光大二年（568），复设



原闽州为丰州，侯官和原丰仍为州治所。

隋开皇九年（589），因丰州境内有泉山，改名泉州；隋开皇十二年（592），原丰县改称闽县。隋大业二年（606），泉州改名闽州；大业三年（607），废闽州，改名建安郡，郡治在闽县。

唐武德元年（618），改建安郡为建州，州治在闽县。武德六年（623），建州析部分地置泉州（即今福州），州治在闽县。武德八年（625），改名丰州，置丰州都督府。贞观元年（627），丰州改称泉州，属岭南道。景云二年（711），改泉州（即今福州）为闽州都督府。开元十三年（725），闽州都督府因州西北有福山，改称福州都督府，属江南东道，福州之名自此始。天宝元年（742），改称长乐郡。乾元元年（758），复称福州都督府。乾宁四年（897），王潮没，其弟王审知奉表于朝廷，号威武军。

后梁贞明六年（920），升为大都督府。后唐长兴四年（933），闽国国王王延钧（王鏐）称帝，升福州为长乐府。后晋开运元年（944），闽王王延政以福州为东都。后汉乾祐元年（948），复为福州威武军。后周广顺元年（951），改彰武军。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纳土于宋，宋仍以福州为威武军。

南宋景炎元年（1276），宋端宗赵昷在福州即帝位，升福州为福安府，定为行都。

明洪武元年（1368），设福州府。南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朱聿键在福州即帝位，定都福州，称福京，福州府更名天兴府。

清顺治三年（1646），天兴府复称福州府。

综上，福州在历史上相继有东冶、侯官、晋安郡、晋平郡、闽州、丰州、泉州、建安郡、建州、福州、长乐郡、威武军、彰武军、福安府、天兴府等各种名称。这些称名，多承载着“福”的内涵：

1. 福州的称名中，有不少以平、安寓意命名的：如“晋安”“晋平”“建安”“福安”等。

“晋”有进长的含义。《易·晋》：“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孔颖达疏：“晋，进也者，以今释古。古之晋字，即以进长为义。”安与平分别代表着安适、安逸与平安、太平。《诗·小雅·常棣》：“丧乱既平，既安且宁”。

关于福州属内永安县名的由来，雍正《永安县志》载：“尚思置县命名之章，保其治于不废，则民得其安。民得其守，则官亦安，上下相安，然后可保其治于永久也。”《延平府志》：“初因沙、尤叛寇平，析两县地为县，取永久安定之意。”另据《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七：“县西南五十里有安沙，旧传聚沙成岸，水涨不崩，故曰安。或云，出九龙至此始安也，县名永安以此。”

而福州另一个县福安名称的由来，《八闽通志》载，福安“初议置邑，邑令范夔梦神人告曰：‘须福建安抚来，事乃成。’后朝廷赐名其县曰福安，盖符梦中福建安抚之言也”。宋代的郑黼著有一篇《福安县名记》，文中也记载了福安县因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御批“敷锡五福，以安一县”而得名的故事。在文章的末尾，郑黼劝

诚邑人“自求多福，修己以安，可以无负福安赐名之美意”。

由此推知，福州的称名中亦蕴含着对平安、安宁、多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2. 福州的称名中，亦有以丰收、安乐等寓意命名者：如“丰州”“长乐”“天兴”等。

《洪范》五福，其二曰富，孔颖达疏“家丰财货也”是则丰州之命名，亦与“五福”有关。

《国语·晋语一》：“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蔡邕《释海》：“天隆其祐，主丰其禄。”

“长乐”这个名称，最初可能寄托了“长安久乐”的寓意。“乐”字在文言文中有喜悦、愉快的意义。《广韵·铎韵》：“乐，喜乐。”《集韵·铎韵》：“乐，娱也。”《诗·小雅·常棣》：“宜而家室，乐尔妻孥。”又有安乐的意义。如《诗经·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又如《史记·乐书》：“啍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张守节《史记正义》：“乐，安也。”长乐的命名与长乐山也有关系。据乾隆《福州府志》载：“在易俗里，城东二里。闽越时，居民梦神人乘白马至此，因名白马山。后唐长兴中，闽王璘改闽县为长乐，易今名。有小兰亭，宋郡守上巳禊饮处。山之阴有温泉。”长乐的寓意，既有安，又有乐。

因此，福州的上述称名中有着天赐福祉、丰衣足食、长乐久安、兴旺昌盛等美好的蕴意。

3. “福州”这一称名中蕴含的美好含义。

《说文·示部》：“福，祐也。从示畀

声。”“福”字的本义为保佑、造福。福州的“福”，首先有着造福百姓的意味。《明史·太祖纪》：“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

前文提到，“福州”地名最早始于开元十三年（725），因福州的西北有福山而得名。福山又名董峰（奉）山，山高林密，空气清新，被誉为福州的“神农架”。相传三国时期的名医董奉曾居于福山下的董厝里村（今古槐镇青山村）。董奉医德高尚，为人治病分文不取，只要患者病愈后在山上植杏，轻者植杏一株，重者植杏五株，久而成俗。杏熟后，董奉在树下作草仓，以杏换谷，赈救贫穷，供给行旅。病人和穷人都非常感激他，赠予“杏林春暖”的匾额，并尊其为“杏林始祖”，祀为医仙。据传董峰山古时有神人居之，披发裸身，人少为见，见者即获福，因而得名“福山”。可见，福州的“福”由福山而来，而福山的名称，原本就有福的意味。

此外，古称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如《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孔颖达《五经正义》：“五福者，谓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寿，年得长也；二曰富，家丰财货也；三曰康宁，无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终命，成终长短之命不横夭也。”历史上曾经隶属于福州的宁德、福宁（即今之宁德市）、寿宁、福安等县市的名称中，也都包含五福的寓意。

“福”不仅是富贵寿考齐备，也是一种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尚书》之外，古籍对于



三山会馆匾

“福”还有着各种类似的定义，如《韩非子·解老》：“全寿富贵之谓福。”《礼记·祭统》：“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

由此，“福州”这一称名中蕴含的美好寓意不言而喻。

此外，福州还有三山、左海、榕城等别称：

三山：唐末五代，福州城范围进一步扩大，把屏山、乌山、于山圈入城内，故此以后福州便有“三山”之别称。曾巩《道山亭记》：“城中凡有三山，东曰九仙，西曰闽山，北曰越王，故郡有三山之名。闽山一名乌石山。”《寰宇通志》卷四十五：“九仙、乌石、越王三山俱在城中，故名（三山）。”宋龙昌期有《三山即事》诗：“苍烟巷陌青榕老，白露园林紫蔗甜。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如今，海外福州籍华侨聚集地行会组织仍称“三山会馆”。

左海：“左海”一词最早出自《礼记》“洗之在阼，其水在洗东，祖天地之左海也”。因为

我国古代地名以东西方位而定，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曾巩《道山亭记》描述福州地形是“长江在其南，大海在其东”，故后世亦称福州为“左海”。清末福州城曾耸立有一座石碑坊，上书“左海流芳”四个大字，以示福州人才辈出。

榕城：北宋治平年间，福州太守张伯玉号召福州居民遍植榕树，福州街头出现“绿荫满城，暑不张盖”的景观，从此，福州就有了“榕城”的雅号。李拔《榕亭记》：“古称榕树生至福州而止，故福州号为榕城。榕之重于福州，旧已。”

凤城：《迁城记》中对新城描述为“其城形状，如龙似凤”，是个福地祥域，于是福州被人视为凤城。如今福州许多地名还都带“凤”，如西门的凤凰池，东门的凤邱山。宋时东街有凤凰坊，朱熹在福州书有“凤邱鹤林”，清代三牧坊有“凤池书院”等。如今在闽江大桥南端耸立着一座三凤齐鸣的雕塑，象征福州的南大门。

这些称名，或蕴含着美好的祝愿和向往，或展示出福州山水之独特的特性，或象征福州的人文之盛。

福州的“有福”还表现在宜居山水方面

《迁州记》中给世人描绘了“有福之州”的景象：

晋，太守严高图越王山南形势，以咨郭璞。璞曰：“方山秀拔于前，三山环峙于后，八百年后大盛。”

郭璞《迁州记》：“桑田为海，人事更改。六旬甲子，当见其害。更重着衣，周四重载。郑国归朝，重关为待。鸟出木空，千载不昧。前有双眉，重施粉黛。溪涧水来，尽归于海。主揖其客，客往主在。稳首东日，高山镇寨。本自添金，因名右兑。但见蛇影，莫知坐亥。事过方知，知而未会。龙山高山，光照奕代。巧妇能裁，得令人爱。若解修心，得其终倍。市笼放火，聚众磊磊。有一老翁，手把竹筒。重添新宰，在言不在。铭曰：太康之载，迁插瓯基。四色牢城，层峦三径。洪许南流，瑞龙西应。其主螺女，现对花峰。千载不杂，世代兴隆。诸邦万古，繁盛仁风。其城形状，如龙似凤。势气盘拿，遇兵不掠，遇荒不掠，逢灾不染，六甲子满，废而复用。”

又有讖曰：“石间突兀创危亭，八百年前兆此名。天降元精如汉佐，岳陶灵气似周臣。中坻不见容舫路，古渡应无病涉人。好是褰裳待今日，晋浦坊中人挺生。”

文中将福州描绘成了一个“方山秀拔于前，三山环峙于后”“遇兵不掠，遇荒不掠，逢灾不染”的世外桃源。福州的土地平旷肥衍，人民安居乐业，可从一些资料中得到印证。据《长乐志》记载：“建剑溪湍而下泉蒲，潮涨而上适，至是而平，民生其间，故其性纾缓，其志强力，可以久安无忧，真乐土也。”韩愈在《欧阳生哀辞》中也称道“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福

州的“遇兵不掠，遇荒不掠，逢灾不染”在历史上也得到了印证。春秋战国时期、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板荡之时，福州往往能在乱世中得一份安宁，远离战争之苦。

福州民风为人称道，有诸多大儒名士

福州自古有“海滨邹鲁”之称，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名士、大儒。

据载，唐乾符六年（879），黄巢军围攻福州，当时的福建观察使韦岫弃城逃走。然而，军队到黄楼之下时，黄巢这位杀人如麻的大将军，因为敬重黄楼的主人——崇文馆校书郎黄璞，竟下达了“此儒也，灭炬弗焚”的命令，黄巷的黄楼因此声名显著。

有人评价福州“君子内文而外鲁”，《闽藩重修贡院记》称“吾闽素称海滨邹鲁，熏陶圣化，久而益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福州所属的永福县（今永泰县）出现了七年三状元的盛况，自乾道二年（1166）至乾道八年（1172）之间的三位状元：萧国梁、郑侨、黄定，他们所居之地相距不过百里，都出自福州的永福县。

近现代，福州的大儒更是不胜枚举。福州的三坊七巷，其中所出人才的数量之多、密度之大，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综上，福州自古以来便是拥有山水之美、人文之盛、宁静安康的“福地”，是名副其实的“有福之州”。

关于福州水户事件

【日本】中村孝志
陈鸿铨 译

所谓“水户事件”，是指1932年1月3日夜，发生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内的一起引起中日纠纷的凶杀事件：日本小学校（译者按：当时日本人在福州办有日本小学校和东瀛学校，前者在仓前山太古坪，后者在苍霞洲，两校教职员宿舍均在仓山对湖路）训导水户参雄和妻子光子夫妇，在宿舍内同时被残杀。日本方面就此暗杀案大做文章，谴责中国。但这样大的事，何以在台湾岛上和日本本土，却被禁止报道？其动机无非是为抹杀事实真相，掩盖世人耳目。笔者现在以

日本外务省及其所属机构的资料为依据，以其他关系人的记述、谈话等为旁证，撰写这篇文章，用以澄清事实，并告慰无辜惨死的水户夫妇于九泉之下。

—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东北柳条沟制造了“南满铁路爆破”事件，揭开了“满洲事变”的序幕。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翌年1月2日又占领了锦州。

在这样的形势下，华南方面对日情绪日益恶化。1932年1月2日，在福州的日本军舰“北上”号舰长草鹿往一大佐、炮术长杉野少佐和日本驻福州总领事田村贞治郎到西湖公园，看到全市的中等学校学生正在开反日大会，游行队伍举着戚继光戡平倭寇的图片牌子，高喊口号。草鹿等人认为这是对日本的莫大侮辱。学生还拣石块抛击他们，草鹿、杉野两人面部、颅骨等处受伤，在



日本明信片上的“福州东瀛学校”校景图

中国军警的保护下躲进公安局。数百群众围在公安局门口，不肯散去。直到午夜10时半，才由戒严司令部派一辆汽车，将田村总领事等人送到日本领事馆。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对舰长、总领事迟迟未归及中国群众的举动，反应强烈，要求停泊在万寿桥下的“北上”号军舰和“彦圆岛”号水雷艇派出陆战队到公安局去，形势一触即发。第二天（3日）下午3时，日本侨民300多人在日本居留民会召开大会，会议向中国提出惩办反日元凶、处罚治安负责人等8项要求，草成议决案，同日下午5时面交田村总领事。中国方面，群众也到处开会，作抗日演说。双方剑拔弩张。当日夜间7时半，住在日本领事馆警察官宿舍的田口巡查部长等4家和苍霞洲台湾公会发生纵火事件，幸被事务员大畑重雄发现，予以扑灭。在公会起火时，有人看见年仅14岁的李性源（李炉己的儿子）从学校地下室出来，步上石阶。1月4日，福州田村贞治郎总领事向外务省大臣犬养毅发出密码急电：“3日下午8时半，有中国暴徒2人，闯进日本小学校宿舍，台湾总督府派遣的水户三雄（本名参雄，电文作三雄）年28岁，和其妻水子（本名光子，电文作水子）年27岁，同时惨遭杀害。女性受锐短刀，当场毙命；男性头部被击重伤，急奔邻舍，半途倒下，送往医院急救，中途死亡。夜警戒中。”

事件发生后，日本居留民会书记高桥仙吉，在8时将经过用电话向总领事馆报告。田村总领事接报后，立即向海军联络官杉野少佐告急。值

宿的桑田巡查赶到现场。警察署署长中山荣在警部住宅接到电话，也同时驰赴现场。中山警部与桑田巡查到现场查勘后，认为水户训导和其妻光子被害后，凶手向邻舍逃走。水户临死之际，还对中山警部有气无力地说：“进吉，2个中国人，袖里……”未说完，口中大量吐血，面色突变，送往城内博爱医院抢救不及死亡。中山警部认为，凶手是从石阶方向逃走，凶手与水户夫妇都相识，所以把夫人也害死以灭口。当时水户还躺在床上（水户患有心脏病，当日带全校学生到市郊远足，并出席日侨大会。傍晚回家后感到疲倦，很早就上床休息），被刺后惊慌奔往邻舍，未达即倒地。刚满3个月的陆子，躺在母亲身旁号泣。

田村总领事即用电话通知福建省政府委员林知渊前来。是夜11时许，林知渊带了翻译黄如璧来到小学校宿舍现场检验尸体。总领事要求迅速将凶手逮捕归案，措辞极为强硬。另一方面，水户训导夫妇的遗体，由中山警部和日本居留民会的职工彻夜看守。天亮时大家沿着血迹寻索，发现距离数米处的地面上有一条拭血的白手帕，现场附近还遗有包凶器用的印有广告的厚纸，栏杆等处有血迹，从而认定凶手中有一人受伤，随即将情况通报林知渊。省政府方面出了悬赏布告：报告凶手下落、从而捕获凶手的给奖金3000元；能捕获凶手归案的，给奖金1万元。

田村总领事按照日本外务省的训令，于6日9时要求省政府委员林知渊到领事馆，责难中国

对水户事件不重视，并以死者系教学公职人员、事件竟发生在日本小学校舍之内的严重性，提出下列各条：1. 省政府应代表海军陆战队队长、公安局局长等来馆正式道歉；2. 对凶手应处以极刑；3. 对负责治安的人员，应予惩办；4. 应给死者抚恤金5万元；5. 应付日本小学校1万元；6. 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应添设巡逻警察的驻所，并派出军队采取防护措施，在未经日方同意前，不能撤走。

中国方面，福建省政府召开了委员会议，对日方要求全部接受。

二

水户事件发生后，领事馆立即到现场检验和侦察，同时定了几条破案的方针。从水户临死之际“进吉……”之语联想到：有个叫进吉（名洪进玉）的“新时代”西装店职工，经常以兜揽西装生意为由，进出水户之家，和夫人也认识。领馆认为洪嫌疑点较多，有对他侦查的必要。福州东瀛学校训导陈戊壬谈到：李陈却英（李炉己之妻）曾介绍《闽报》馆事务员刘锦芳，同一个住

在日本居留民会附近的女子议婚，洪进玉居间插手，经常到李家。到西装店楼上勘察，发现洪进玉不在，外套和帽子还留在那里，推测当系逃亡时未来得及穿。又向天田洋行查询洪的近况，说是洪进玉将一辆汽车驶往厦门修理。因此，怀疑洪系畏罪潜逃。但因为这件事牵涉到台湾籍民作案，所以只咬定是



福州日本领事馆旧影

2个中国人作案，向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这时发现一个男子有疑点，即在由台湾总督府资助开展业务的福州《闽报》馆当记者，同时还办《榕城通讯》杂志的李炉己（1894-1943）。李籍贯台北，时年39岁，以《闽报》记者的身份活跃在福州社会，得到馆长镰田正威的重用。以后辞去《闽报》馆的职务，寄居在他的续弦李陈却英处，李陈却英是由台湾总督府派来福州东瀛学校担任训导的。领事馆曾收到情报：李炉己扬言自己负有日本军方重大使命。而一批混入厦门的台湾浪人，由李炉己带领，将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等等。

1月6日，田村总领事收到一封密告书。密告书称：“去年10月中旬，李炉己已在常盘（译者按：指‘常盘御料理’，设在福州泛船浦前街，内有日妓卖淫）数次集合（同伙）。参加的有从厦门来的沙鱼阿跷（浑名）、松山人尊贤（不知真名）、番薯皮（绰号）等。他们在常盘共饮血酒，立誓同心协力，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他们在台湾犯有前科，敢干无人道的事，和福州流氓勾结在一起。去年10月16日曾袭击总领事馆，接着企图对警察宿舍、居留民会放火，谋杀日本人山田、山下和台湾人陈天星、柯保罗、林汉等，以制造中日纠纷和治安混乱。

“水户夫人是被人用鲫鱼刀杀害的，曾见小洪、松山人尊贤、沙鱼经常携带此种刀（译者按：原文画有刀形）。刀是特别的（因为福州的店铺不卖这种刀），由水部度量衡器厂某台湾籍



水户事件发生后的福州街头

民替他们特制。要弄清这个案件，请多派警察人员到下道（译者按：今名达道路）振顺洋行，把行东许阿文和隐藏在那里的陈明东及松山人尊贤、沙鱼等予以逮捕，再会同中国政府包围度量衡器厂搜查。受伤的凶手得到李某的资助，准备今夜逃往兴化转道泉州，或者隐匿在义洲台湾人萧嫂楼上。……要弄清水户枉死的真相，就要对以上所列的流氓分别调查，如此必能水落石出。”

这封密告书使领事馆很为难。1月6日中国方面已付了巨额赔偿金，事件已告一段落。但若放任李某等不问，亦会有不安全的顾虑。于是于8日下午以李等是赌棍为由，予以拘留。

1月6日，田村巡查部长发现当天晚上有个中国人因受枪伤，由李炉己介绍到博爱医院住院。此人名黄依梯（以后查明，是台湾人黄天赐），年27岁，右颊受枪伤。本人供述于1月3日，在南门兜被中国人枪伤。可是，在水户事件发生的当晚，现场就发现凶手中有一人受伤，黄又是李炉己介绍住院的，更是嫌疑重大。1月8日夜，李炉己被捕后几小时，黄天赐和另一个名

叫王春祺的（21岁）也被捕了。

李炉已被逮捕时情绪很激动，用绝食来对抗。警察官先从劝导进食入手，果然达到目的。与此同时，警察官到李炉己家中搜查，发现了杀人的凶器——刀。但不是福州制的，而是厦门制的，用纸包着，刀上有血迹。厚纸和作案时丢在现场的一样。田村总领事亲自出马，于1月12日夜间独自和李炉己见面。最初李炉己说：“一身属于君国，无论责任何等重大都愿自身承担；对于关系到军方的，也归我自己负责。”在田村总领事多方劝谕下，李才说：“这件事在公判庭上，我也是不认账的。为着领事官对人温和，本人愿将过程向领事官自白。”李炉己当夜就把事件的动机和经过，详细地写了自白书交给总领事。

三

1931年10月5日，台湾情报系统军官浅井敢夫大尉突然来到福州，住在山口辰郎家里，由山口辰郎介绍李炉己和浅井大尉见面。浅井开门见山地对李炉己说，为了贯彻国策，要向福州进兵，必须找个借口，这就得制造事件，怂恿李炉己出来干。这时大阪商船公司有船只在福州，李炉己就在10月6日和浅井大尉同船到了台湾。9日开了碰头会议，订下了制造事件的计划。会议在军部举行。很显然，计划不是出自浅井敢夫个人的主意，当时在场的还有司令官真崎甚三郎、参谋长小杉武司等人。计划的内容是：可以把日

本在福州的侨民杀死三四个，对日本领事馆、日本人设立的机构可以放火，事件一发生，我们就有了出兵的借口。所花经费，可以事前申领，家属方面也可以得到照顾。李炉己于是匆匆回到福州，准备实施计划。1月2日，日本总领事和海军军官到西湖公园，被中国群众打伤，日侨强烈要求惩处。李炉己认为时机已到，行动刻不容缓，立刻向浅野大尉电告。他在居留民大会上，就总领事等人被击事件，作了沉痛的演说。他发现坐在前排的一个青年听演说时激动得流泪，就邀其到另一个房间里谈话。这个青年很坦率，表示愿和洪进玉一道去干，还说只要3个人就够了，李炉己不必参加。

李炉己当时对他们作了如下指示：今夜利用福州治安混乱的机会下手；杀死两三个日本人，对此后果国家有保障，如果到9时还找不到适当的人下手，就到我家来，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杀掉，责任由我自负。话说完后，李炉己又回到会场，被推举为实行委员之一。他一度到家里看看，见没有什么情况发生，半夜又出去，在中央银行门前（译者按：该行行址在现达道路福州缝纫机厂内），发现一个台湾籍民受伤，把他送到博爱医院。这时杀害水户夫妇案业已发生，街上临时戒严，不能通行，只好在医院过夜。熬到天亮回家，走进里屋时，看到杀人的凶器，用厚纸包着，纸上还沾着血迹。纸上写着潦草的字：“钱拿来，在黄山乡等候。”李跑进卧室取出纸币，兑换了40块银圆，乘公共汽车到黄山站下车。见洪

进玉样子很狼狈，便把钱交给他。李炉己在洪进玉出走一两日后，就被领事馆逮捕了。

被视为凶犯之一的洪进玉逃到厦门，1月22日在街上被日本厦门领事馆警察逮捕，予以监禁。日本福州总领事馆派警察署长中山荣会同领事馆管司法的副领事竹内静卫赴厦，审讯洪进玉。开始洪进玉百般抵赖，后来审讯者突然提到从李炉己家搜出凶器和包纸，纸上还沾着斑斑血迹，并告诉他，水户训导临危时说过“进吉干的”，洪进玉这才有了如下的口供：

1月3日在居留民会里开会那天，李炉己提出必须杀害两三个内地人，这样台湾军队方面一定会派遣军队将福州占领，要我们为国家卖力，事成必受重赏。当夜在李炉己家中密议，李介绍台湾籍民两人（此节和李炉己供词不一样），交给我们手枪两支、刺刀两把。如是各执凶器，我领先闯入小学宿舍，进门时喊着“水户先生”，装作送西装来的模样，水户夫人闻声，迎面而来，我的同伙突然冲出，向她刺了两三刀，她立即丧生。我向水户训导开枪，慌忙中流弹伤了一个同伙（绰号凹鼻）。水户训导向屋外奔逃，我们三人也在惊慌中从后门分道逃走。我逃到李炉己家里，不见李炉己，便顺手在刺刀包纸上写下“钱拿来”等几个字，放在李家，然后奔到市郊黄山汽车站，坐等到天亮。10时左右来了公共汽车，李炉己从车上跳下来，给了我40元，并吩咐别泄漏同伙的消息。我乘搭海轮来到厦门，在街上被抓了。

根据洪进玉的供词判定，在福州拘留的嫌疑犯黄天赐、王春祺是本案共犯。从供词互相印证，可以勾画出如下的轮廓：

在台湾军方浅井大尉的授意下，从1931年10月开始，李炉己发展洪进玉和台湾籍民黄天赐、王春祺（加入破坏组织），黄、王二人是由洪进玉介绍参加的。1932年1月3日，李炉己遵照浅井大尉的指示，向洪、黄、王三人作了布置：杀害的对象，可以是田村总领事、领事馆书记生，警官以及台湾总督府派的官吏（可杀两三人）或日本军舰上的水兵（可杀10个左右）。这样，日本的重要官吏受害，对于社会治安影响很大，从而就可以保护日本国家臣民生命财产为借口，由台湾的日军出兵福州。但李炉己、洪进玉这一班人，秘密协议避重就轻，向水户夫妇下手，因水户训导长期患有肺病，奄奄一息，生命无多，杀死他是为了君国，且事成后可以得到相当奖赏，但未料到水户夫妇系一对教育工作者，其被杀在社会上震动并不大。

也许因为策略的变更，或阴谋的暴露，进军福州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水户夫妇的惨死，完全是日本台湾军方一手策划的。而案件移到台湾审理，也看不到下文。

（《关于福州水户事件》一文系由日本学者中村孝志根据日本、中国台湾所存的档案、文献和历史研究者、知情人提供的资料编写而成，原载日本大理大学《南方文化》1982年11月第9辑。本刊编发时有删节。）

穿越闽都六十年

——老福州居民生活实录

林 山

这是 1956 年到 1958 年期间，福州城里一个家庭的每日收支流水账，它真实记录了 60 年前福州城里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

两本《日清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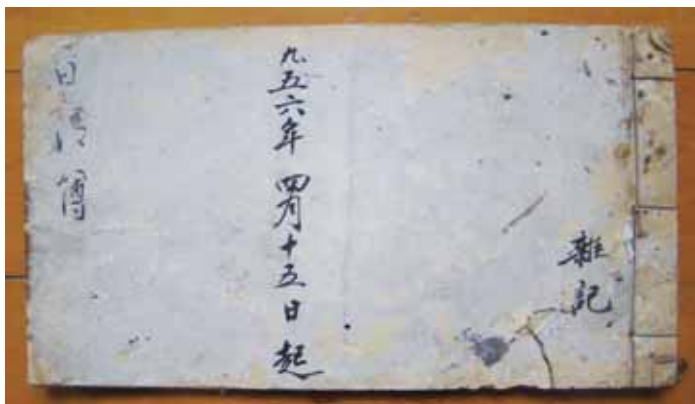
日清簿是过去商家使用的营业流水账。有的家庭也记收支流水账。每天一笔一笔的收入和支出，用毛笔认认真真书写记录。两本《日清簿》，一本封面写着：“1956 年 4 月 15 日起，杂记”，记录到同年的 9 月 30 日。另一本封面写的是紧接

着的“1956 年 10 月 1 日起”，记录到 1958 年 7 月 30 日，两年零三个半月，一天不落，记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具体开销情况。

翻阅《日清簿》，有许多很熟悉的词句跃入眼帘：“鱼肝油”“鸡蛋糕”“线面尾”“洗汤”……这些家常食品、日常活动，一直伴随着福州市民的生活。

当然，也有许多东西的名称不易看懂。比如，这里记账用的数字和计量符号。

先说说记账用的数字和计量符号。《日清簿》数目字用“丨 丨丨 川 × 卅 卅 卅 卅 卅”。据说



《日清簿》封面



《日清簿》数目字用“丨丨川又𠂇上土三文十”记录



《记工识字课本》

这是阿拉伯数字传入以前，我国传统的商业数字符号。这种符号，如果不认识，就像是天书，要“破解”才能明白。1956年“闽侯县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编的《记工识字课本》，第一课就是汉字数字从一到十，与阿拉伯数字、记账数字和大写汉字数字的对照表，一目了然。

谁家的流水账

《日清簿》没有署名，没有印章。很好奇：记账人是谁？干什么的？住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日子过得怎么样？

收支中记载有他经常收到“傅群、惠”（可能是儿子）的汇款，和“丙”等看病的记载。但是他姓甚名谁（可能是姓傅），不得而知。退而求其次，看看是干什么的吧。

《日清簿》记载1958年的“二月十日，即

农历12月22日，航运管理局开养老谈心会”。他应该是省航运管理局的退休人员。

《日清簿》1956年4月16日记录：“来四月份工资44.75元”，看来他原来是航运管理局的正式职员，每月15日领工资。根据当时颁布的工资标准，他的工资水平相当于七类地区、专业学校高中毕业转正后定的行政24级，接近部队排级干部的月薪46元。

《日清簿》1956年6月14日：“来养老金22元3毛7分。”就是说，他启用这本《日清簿》才两个月，就退休了。养老金，也就是退休金，恰好是工资的一半。

他住在哪里呢？《日清簿》1956年4月17日记：“付房租（三月份的）3元。”可见，他没有自己的房产，是租房子住。1958年6月1日：“厝租入银行摺，每月应交5元。”他是航运局的职工，房租是通过银行交付，很可能租的是公房。

根据他开支中有“出城车费”“往东门车票”“西门车票”“往台车票”“新店车票”“西湖车票”以及1956年11月13日的“本街设市”等等来判断，他应该是住城里，大概在南街。

量入为出过日子

《日清簿》的“夹墙”，也就是折页中间，时不时会夹着一张纸，不注意还发现不了，让人联想起孔府的“鲁墙”。这“纸夹墙”中有一张纸，写着：“1956年10月起至1957年10月底止，13个月。大来170元，去134.21元，留用35.39元。二来257元，去4元，留用265元。自338元。三合538.79元。”这是他的年度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大”可能是指他的大儿子，13个月，总共汇回170元，而花在大儿子及其孩子身上的，有134.21元，他能用的35元。“二”可能是他的二儿子，估计收入比老大高，而且负担也轻，所以共汇回257元，基本上都由他支配使用。他自己虽然退休了，退休金还是蛮高的。父子三人一年13个月收入，可供他支配使用的有538元多，在当时福州居民中，应该算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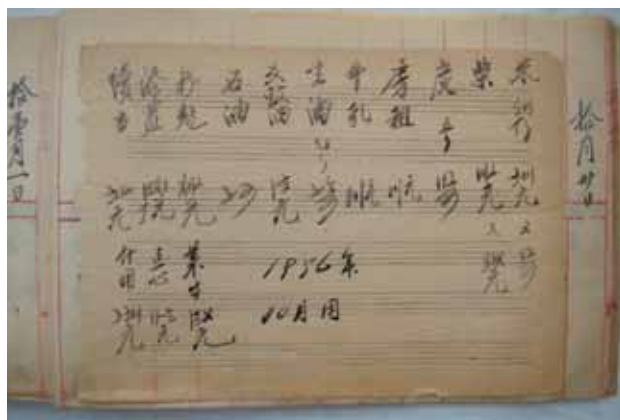
从看病来说，他本人可能享受公费医疗，因为没有他自己看病的开支。不过家里人生病，还是得自掏腰包，《日清簿》中有“药超出（丙用）2.8毛”“药超额4分”“惠卜（挂）号，医，3毛”“惠药，5.2毛”“萱孙挂号1毛、药2剂2.6

毛、车票2分”“幼波端病1元”等等记录。

跟医疗保健和卫生有关的开支还有：“消毒费3毛”“洗卫生酒2.4毛”“六六粉1.2毛”……六六粉是农药，是中等强度毒性的杀虫剂，那时候人们喜欢买来除虫消毒，用它消杀跳蚤与虱子什么的。现在，虱子很罕见了。

他还买公债，要么有投资意识，要么是分配买的。1956年4月17日记录：“公债（居委会首月）2元”，5月15日“公债1元”，10月3日“公债支回3.52元”。我国从1954年开始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属国债的一种。1959年全国性公债停止发行，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

有一张“夹纸”记着：“1956年10月用，米53斤，7.3元，又4.6毛；柴，3.6元，又4.64元；炭，5斤，2.6毛；房租3元；牛奶3元；生油1斤，6.8毛；虾豉油1.8元；石油6毛；粉面4.25元；添置13.91元；续当7.26元；什用6.73元；点心2.17元；菜等1.34元。”统计一下，总支出61元。而当月收入记载有：公债支回3.56元，



“夹纸”上的记录可看出收支平衡有余

傅群来 25 元，退休金 25 元，补 4 个月 14.5 元，合计收入 68 元。收支平衡有余。

民以食为天

食品是《日清簿》中最主要的开支记录。

福州居民当年买肉是凭条凭证的，所以《日清簿》有“肉半斤，居委会条，头次，3.3 毛”的记录和“猪肉 1 斤，6.6 毛”一笔。后来就改凭证买肉了，“换肉证 2 毛”，说明猪肉供应证比较重要，工本费要 2 角。

在主食方面，“夹纸”中有张纸记着：“1956 年 10 月，米 53 斤，7.3 元，又 4.6 毛。”一个月 53 斤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或者一个大人两个小孩的定量。加上面食和副食品，这可能是个三两口人的小家庭。

记录买面食有“切面，2 斤，4.8 毛；线面 1 斤，3.8 毛”“线面尾 4.2 毛”“兴化粉 1 斤 2.6 毛”“山东粉，2.3 毛”等等，还买“地瓜米 22

斤 2.5 毛”。现在福州人还常买这些东西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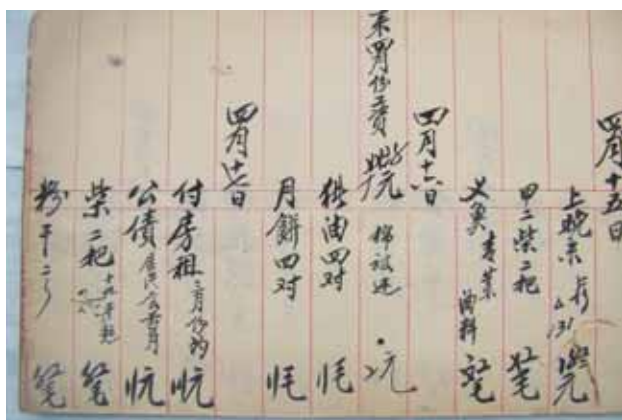
《日清簿》启用的第二天，食品开支是：“猪油四对 2 毛、月饼四对 2 毛。”“对”，是福州方言“块”的谐音。猪油，是猪油糕的省略记法。那时候，一块猪油糕或月饼，都是 5 分钱。现在一块猪油糕 1.5 元或 2 元。月饼的价格就说不清了，从几元到几十元都有。

过去福州“观我颐”的猪油糕油足味香，糯性强而不黏，入口易溶。可以当饼吃，也可以用开水冲调，香甜油润。《日清簿》还有买“福清饼 5 对 1 毛、正顺饼 3 对 9 分、光饼 6 对 1.2 毛”。正顺饼，是征东饼的谐音，比较大，一块 3 分钱。福清饼、光饼小一点，一块 2 分钱。

还有“葱包 2 块 1 毛”“鸡蛋糕 7 毛”“芋粿 5 分”“菜头粿 1.5 毛”“春饼 1 斤 2.6 毛”“肉丸 1 斤 3.2 毛”“粽 5 个 1 毛，碗糕 8 分”“杏仁酥 1 毛”……非常熟悉啊，几十年了，现在我们依然吃着这些富有闽都风味的糕点，只是价格当刮目相看了。

除了糕点，记买点心的有小吃“燕丸 2 毛”“元宵丸 1.2 毛”“点心，鱼丸二粒 1 毛”。鱼丸是福州著名的风味小吃。还有“扁食 1.5 毛”。

福州风味小吃是讲究品牌的，所以在 10 月 23 日有“点，衣春扁，1.5 毛；塔巷鱼丸，1.5 毛。合 3 毛”。9 月 30 日（国庆前夕）“点心，居会值班，1.5 毛”。估计是轮到居委会节日值班，点心吃的又是“衣春扁”。



《日清簿》中关于食品开支的记录

1956年5月6日记载：买肉、淡菜、花蛤、鲜带鱼、油条，共花1元7角5分。超过日工资收入，生活水平蛮不错的。

油条是福州居民早餐桌上的常客，1条3分钱，2条5分，在《日清簿》中频频露面。不过，有时候写成“油扎粿”，用的是方言俗称。

早餐和油条搭配的还有“鏊边蛎饼1.2毛”“蛎饼1块5分”“香干1块1分”“肉绒1毛”“豆腐八匡5分”等等。肉绒，现在多称肉松，是福州的特产。豆腐是家常菜，据说到外地怕水土不服，可以先来个豆腐吃就没事了。豆腐摊位，上面有正方形框格，买几框豆腐就划几格去。福州的早菜，叫“早配”。还有“菜埔4分”“大头菜9分”，高档一点的有“珠蚶4两1.1毛”。现在珠蚶好像见不到了。

水产海鲜日常吃

滨海临江的福州人很喜欢吃水产海鲜，从《日清簿》看，几乎天天都有买有吃。

水产中，闽江的蚬子，方言称螾仔，是福州居民的家常菜。过去有句话：“无钱人天天螾仔菜，有钱人日日鸡鱼肉。”当时蚬子1斤也就一两分钱。

海鲜好吃也不贵。如：鲜瓜1.2斤2.4角、炊鱼半斤1.8角、白力鱼2角、鳗鱼1.5角、马加鱼1.1角、丁香9分、蟹仔2个2.9角、义带（咸带鱼）1.6角、（鱼奇）3分、鲜带2.6角……



比较特别的是1956年7月16日的“买鲎”。鲎是福州特产，披甲戴盔、剑拔弩张的史前物种，现在是受保护的了的。

猪肉凭证供应，猪的其他部分可能好买些，如：“猪舌1个7毛”“猪血半斤1.1毛”。《日清簿》还有买“番鸭1.4斤1.2元”，以及鸭蛋1粒8分，鸡蛋1粒6分，皮蛋1粒9分。那个“破蛋3个1毛”的记录，体现了闽都人家勤俭持家的传统。

现在吃菜强调多吃青菜，是从保健养生考虑。过去吃青菜，主要是因为便宜。《日清簿》记载的蔬菜品种和价格有：油白菜6分、温菜（空心菜）4分、蚕豆1毛、旗菜5分、花菜6分、芥菜3分、浦林（菠）菜4分、鲜笋8分……

在佐料上，盐是开门七件事之一。《日清簿》记载“买盐1毛”“买盐8两半7分”，这个8两半，就半斤多一点。还有“番薯粉1斤1.5毛”“糖板14两，7.5毛”。

在营养品开支上，过去品种比较少。1956年5月17日买“牛奶，四月份，2.4元”，这是订一个月牛奶的钱，一天8分钱，一瓶。过去牛奶是凭证供应，分短期、半年和长期的。他应是长期

的。1958年5月20日记：“牛奶20天2元，移证3分。”只有长期的证，才有移证之说。还有就是1958年5月30日，记载“本日饮鱼干油”。

在水果方面。购买的水果和价格有：“龙眼半斤1.4毛”“龙眼2毛”。龙眼上市，他一次也就买个半斤一斤的，比较节俭。还有：无花果2.5角、柿子4粒1角、栗子1斤4角、鲜柑1角、柑1粒3分、甘蔗2角、枇杷1角、尾梨5分……看得出，虽然福州四季瓜果飘香，但他是把水果归入“奢侈品”，一次只买一点，过过瘾。

说到饮料，那时候非常简单。《日清簿》记载的饮料和价格有：“香片1毛”。香片，就是茉莉花茶，福州特产。“玫瑰茶叶1.3毛”“茶叶1斤2.44元”“甘和茶8分”。另有“糖果5分”“话梅3.4毛”。有一天专门记“冰棒1毛，若冰”，估计是给小孩“若冰”买的。

文化娱乐挺丰富

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有“学习簿1毛”“扫盲学费4毛”“缴扫盲书钱，7.9毛”。退休的职员，应该不用扫盲。看他的文字，是念过“人家斋”（私塾）的。可能是他家里人交的扫盲学费。而“简化字簿7分”就是他自己要跟上社会的潮流用的了。《日清簿》中，他写的大多是繁体字，有一些简化字，还有他自创的简笔字。1956年10月1日起用的第二本《日清簿》，第一天就有“数簿，100页，4.6毛”，应该就是买这

本《日清簿》的。还有“曲本2.5毛”“周报5分”“日历2.3毛”等。还有就是“相片2毛”和“照相，8毛”，后者可能是一家人的花费。

娱乐方面，他喜欢看戏，当然是闽剧，都是当时著名的戏班演出。1956年8月14日“补12晚戏票5张，1.35元”，是陪在外地回来的儿子一家去的，自己平时是一个人去看戏。比如：“剧券，光荣院，赛天然，3毛”“赛天然剧票2.5毛”“早场剧票1毛”“复兴票2.5毛”“复兴早场票1.5毛”“三赛剧票2.5毛”“四赛剧票2.5毛”“文庙看剧，日夜门票，1.4毛”“晚文庙剧票5分”。偶尔，也去看电影。如：“电影票1.2毛”“电影票，居会，2.2毛”“电影票1.5毛，剧票2毛”。

主人公颇有雅趣，从《日清簿》上记载“字画2张，2.4毛”“木胡1.5元，琴线1.5毛”“横笛1把，8角”“漆器2件8.15元，玩物8件1.31元”等等，就可想见一二。

闽都的“老汤”

福州自古就有浓郁的温泉文化。他和许多老福州人一样，非常喜欢泡温泉，也是一个地道的“老汤”。《日清簿》隔三岔五就有“洗汤8分，车票6分，合1.4毛”“洗汤1.3毛”“洗汤等1.9毛”“洗汤等8分”“洗汤2毛”“冬节，洗汤”“汤点车2.4毛”“洗汤2.4毛”等记录。“福龙泉洗9分，点心等1.3毛”的福龙泉，是

福州老牌的澡堂。他经常去东门洗汤，那是福州的温泉集中区：“洗汤，去东门，1.4毛”“洗汤8分，往东门车点，1.6毛，共2.4毛”“洗汤9分，东门车票1毛，伴（拌）面1.5毛”“洗汤9分、鱼丸1毛、车票1毛”。原来洗汤容易肚子饿，要吃点心的。

除了洗汤，个人卫生方面还有“剪发1.5毛”“剪发一次1.7毛”，好像提价了，好在一个多月才剪一次。

快乐过节庆

平时过日子，平平淡淡，他也喜欢逢年过节不一样。1956年11月9日，记载：“即十月初七，生日。面2斤、芋半斤、蚬子2分、油菜5分、玻璃1.5毛、点心1毛、太平5毛、豆付（腐）2分、洗汤车票计1.4毛。”这天，他也买鸭蛋，但记录是买“太平”。福州人过生日，都要吃长寿面，也就是线面，本人还要吃两个鸭蛋，谐音“压乱”，寓意太平。家里其他人各吃一个鸭蛋。

主人公当然少不了要坐车去洗汤，清清爽爽过生日。

1956年4月17日，买“月饼”，说明他喜欢吃糕饼，月饼不一定要中秋才吃。6月9日是农历五月初一，准备过端午节，买了“生仁、术米、蒲艾、粽叶草”，包粽子，挂蒲艾。6月13日注明“瑞（端）午”。那天是端午节，买了“糖、黄烟、香烛、花、荷叶包、香菇、粉干、肉、鱼、猪肚、淡菜、春饼、豆芽、葱、烧酒、花生仁、红枣、油条。共4.6元”。非常丰富，民俗味又浓，真是过节的样子。

9月19日，中秋，买“香烛、花，老酒、高粱”。前一天就买了“中秋饼10块5毛”。12月22日“冬节，羊12两，6.2毛；洗汤车价1.4毛”。1957年元旦“东门车票1.8毛，味和点（2人）3.6毛，看显微镜8分”。这个显微镜，不知道是不是“西洋镜”。1957年元月31日：“是旧历元旦，香糕4对（午点）2毛，鼓山车票二人，8毛。”1958年2月18日“本日春节，气（汽）车票1毛，西湖展览券3分”。登鼓山、游西湖，是那个年代福州的经典旅游项目了。

1958年4月5日：“清明日，清明粿1.2毛，肉3毛，义肉5毛。”6月20日“明日端午”，买了蛤、蛭、蚱血（海蜇红皮）、温菜、燕皮、切面、粉干、春饼、白粿、膏粱、荔枝酒、圭（鸡）老、皮蛋、虾干、香菇木耳、肉皮浮、猪、鲜圣、豆芽、盖兰、太平、珠蚶、鲳鱼、香烛、目鱼、粽、葱等，共6.87元。乖乖，要摆满满一



旧粮证

桌啊。

满载记忆老物品

《日清簿》记载的日用品有：“肥皂 1 对 2.1 毛”，标明是“工农”牌。“固本肥皂，2 对，4.6 毛”。现在人家用洗涤剂多了，但是还有人用这种肥皂。

“洋火 2 盒 4 分”“自来火 1 包 1.5 毛”，都是火柴，叫法不同：“洋”是指外来，“自来”是说一划火就来了。“石油 1 斤 2 角”“煤油 1 斤 5.5 毛”“柴 14 把，抽（挑）工 2 毛，3.52 元”“煤炭半斤 1 毛”“煤炭 20 斤 4.6 毛”“煤仔 50 斤 1.15 元”，都是家用能源，很少电器。“柴配 1 毛”，引火用的。“炭有 5 斤，2.2 毛”，有，是空、虚的意思。木材闷烧成炭，烧透了，放炭瓮里捂灭，就成为有炭，易燃着但不经烧，也是引火用的。

“被针 3 分、棉线 6 分”，这是自家缝被子，福州话“搭被”。“扫手 3 毛”，扫帚谐音写成扫手，是做卫生的。“洗衣桶 1 个 2 元”，那时都手洗衣服，还没有洗衣机。

更多的技术活，是请专门师傅修理，现在叫“购买服务”、请钟点工。《日清簿》记录了一些当年福州的老行当和行情：“修理厨具 2.5 毛”“修理表 5 毛”“修理钢笔 2.9 毛”“修理石磨工钱 3 毛”“挑水 20 担 1 元，每担工 4 分”“修理鞋 5 分”“串鞋工 2 毛”。串，穿，纳鞋。“补伞工 2 毛”，伞是油纸伞，不小心搞破了，就要请师傅用



棉纸和桐油来补。

日常生活还购买：“炖罐 1 个 2.8 毛”“锁匙 1 把 2.9 毛”“粗纸，1 毛”“草纸 1 毛”，粗纸和草纸都是厕纸。还有“锅盖 4 毛”“煤炭鏟 2.8 元”“葵扇 1 把 2.5 毛”“洋铁贯 2.5 毛”“电泡 2 个 8.4 毛”“镜框 1 个 3.5 毛。玻璃 1 片 1 毛”“铁钉 2 分”“水呼失（热水瓶水壶塞）5 分，纸夹 6 分”“毛巾一条 5.7 毛，兴化巾一条 3.8 毛”“被单布 9 尺 3.3 元”“布鞋 1 双 4 元”等等。

与外界信息沟通，现在上网和打电话是家常便饭，过去电话很少用，只记录了一次“电话 2 分”，应该是打了一个公用电话。邮政部门收去的钱倒是不少：“寄信（上海）8 分”，邮票就是 8 分。“明字片 5 分”，明字片是明信片。那时候邮资 4 分，售价 5 分。“寄上海、东门 1.3 毛”“信封纸 1.5 毛、邮票 8 分”“寄邵武信 8 分”。

《日清簿》两年多还记录了两次台风，反映了福州刮台风的自然现象：1956 年 9 月 24 日“本夜台风”、1958 年 7 月 15 日“今晚台风”。如今，台风一年能来好几次。

油纸伞的故事

陈丹

南方多雨，伞自是福州人生活中常备的一种日用品。福州有一俗词“包袱伞”，意思是出门人所带包袱中都有伞。还有句歇后语“出门带伞——老客”，说的是有经验的远行的人知道带把伞在身边。

纸伞是“福州三宝”之一，历史悠久，做工精细。工人们采用油画、彩画喷花和绢印等方法，在纸伞上绘制花鸟、山水、人物等图案，十

分雅致美观。一把优质的纸伞可在撑开、收回一万多次后仍不变形，水里浸泡 24 小时不变质，在近 50℃ 摄氏度的高温下也不变质。福州纸伞除国内市场外，还畅销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中国是伞的故乡，伞相传为大禹妻子所发明，也有传说是鲁班的妹妹发明的。据说春秋末年，著名木工师傅鲁班常在野外作业，若遇下雨，常被淋湿。鲁班妹妹想做一种能遮雨的东



西，她把竹子劈成细条，蒙上兽皮，样子像“亭子”，收拢如棍，张开如盖。这就是最早的雨伞。

最初的雨伞是南方人用竹叶和竹骨编造的。直至东汉蔡伦发明纸以后，出现了在伞纸上刷桐油用以防水的油纸伞，文人雅士亦会在上油前于伞面题诗作画，以遣情怀。南北朝的《玉屑》中记载：“元魏时，魏人以竹碎分并油纸造成伞，便于步行。”明朝《天工开物》提到：“凡糊雨伞与油扇，皆用小皮纸。”沈括《梦溪笔谈》也提到：

“以新赤油伞，日中覆之。”据《福州史志》记载，福州的纸伞工艺技术，是唐末五代王审知率兵南下入闽建立闽国后由中原和江浙一带传进来的。据传，当初由开闽王王审知带来的油布伞是直柄式，伞身粗大，但能遮雨御日，可用多年不坏。后来闽清生产的油布伞、油纸伞的样式大多来源于江浙地区的样本，工艺上又有了改进，油浆足厚，可经得起烈日暴晒，也不怕暴雨打击。经过宋、元、明几百年的更新换代，福州纸伞一枝独秀，得到快速发展。由于取材优异，精工细作，式样美观，携带方便，福州纸伞不仅在国内深受顾客欢迎，还出口远销国外。

直至清代，福州的制伞业仍很繁荣。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州雨伞出口量仅次于布匹、瓷器，居第三位。清末民国初，全市雨伞店号最多时达300多家，1920-1937年，最高年份销量达30万把，最低年份也有十几万把，其中70%销往中国香港地区以及南洋、欧洲一些国家，30%销往邻省和北方各县市。其中以中亭街的



“杨常利”伞店最为著名。“杨常利”纸伞选料考究，做工精细。其纸伞的伞骨采用闽北5年以上的青山老竹，伞面选用本省特制的棉纸，一把雨伞要经过8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杨常利”伞店在选料、上油、绘花等三道工序上形成独特的工艺风格，即选料精，上油腻，绘花雅。该店生产的纸伞晴雨兼宜，既遮挡盛夏的炎炎烈日而不发泡、不爆裂，倾盆大雨冲淋一小时亦不脱骨、不漏水，伞面的绘画图案色泽不变。有人曾经做过试验，“杨常利”纸伞经1170次的反复收撑，不起顶、不断线、不裂槽，经五级逆风吹20分钟，伞柄不折、伞骨完好。“杨常利”的“双喜牌”纸伞在民国时远销南洋各地，被誉为全国雨伞的冠军。1915年，福州“杨常利”纸伞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赛会”上获得一等奖。1933年，“杨常利”纸伞又在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上获得优秀奖。1945年，海军将领萨镇冰为“杨常利”纸伞题了一副藏头诗联：“常持圆盖

防淫雨，利用高遮御太阳。”1955年，“杨常利”伞业作坊并入国营福州伞厂后，又维持了二三十年的辉煌。

与“杨常利”伞业“双喜牌”同样辉煌过的，还有“富贵牌”。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州二度沦陷，制伞企业纷纷倒闭。1944年，刘棣生在江中洲路设厂生产富贵牌伞，不仅在解放大桥头的中国国货公司设专柜，还远销大陆主要城市、台湾省及南洋群岛等地。新中国成立后，富贵伞厂和“杨常利”伞业一道并入了福州伞厂。

至20世纪80年代，福州伞厂职工曾多达1800多人，月产纸伞10万把，产品依然大量销往中国港澳地区和欧美各国。据说，1982年初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到香港时，手中就撑着一把福州生产的精致、漂亮的小花伞。第二天媒体报道后，香港超市百货货柜上的福州花伞被一抢而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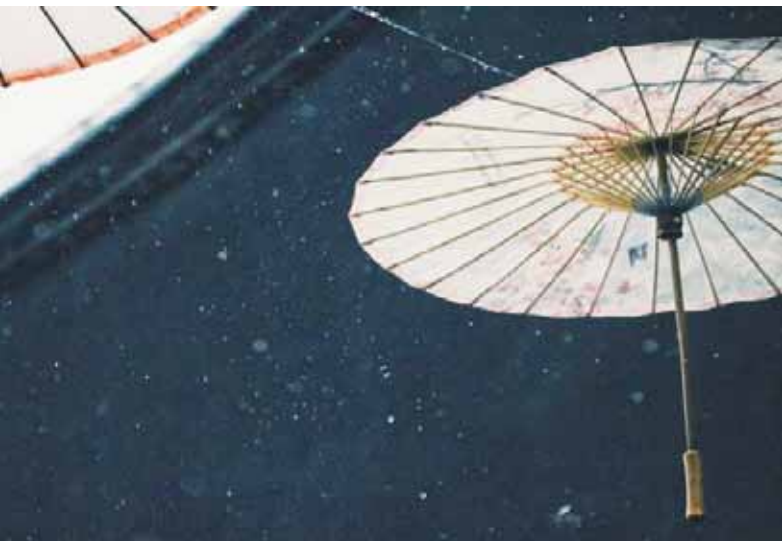
1915年，海关公办吴养贤发起成立国货促进

会，把福州本地生产的伞称为“国伞”，与洋伞抗争，而此称呼一直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在辛亥革命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中，福州市民大力提倡使用“国伞”，以抵制铁骨布面的“洋伞”。

福州的制伞传统工艺分有制伞骨、制伞、伞头、伞柄、绘花等五部艺，五部艺各自独立，分工合作，互相依存，一个人若能完成其中之一即为“全艺”，可见工艺十分专业。制作品质控制严格，要求“四沟”平整不露接头，“牙子”不露口，“胚子”不露“猪鼻孔”。“制伞”虽属主流，但也只是完成“伞胚”“上油”“装配”等后部分工序，所以它必须由别处买进伞骨、伞柄、伞头等等，另外还得聘请绘花师傅，15天左右的制作周期才可完成。

据“杨常利”伞业的后人杨斌先生回忆，当年福州雨伞商号属于厂商级规模的大户，除“杨常利”和“富贵”两大企业专门制售绸伞和各种纸伞，中等规模的还有陈世泰、林新利、潘忠明等十余家，专制全料伞，有时也制上等纸伞；小户有200多家。新中国成立前专门制售制伞原料的专业户，多在福州市北郊、义中、古城、南港、陈厝等地，其中做伞柄的10户，做伞纸的6户，做伞头的3户，做伞轨的2户，做伞环的1户。在福州纸伞产业中，制伞骨技术最棒的当数“后洲帮”，20世纪50年代“后洲帮”张开禄所制绸伞骨握在手中，如同一节麻竹筒，看不见缝隙，注水不漏，堪称一绝；制伞柄最有名的则是洋中亭王依犬家。伞画艺人很多，佼佼者有





程家宝、刘梦秋、林永钦等人，其中程家宝字画俱佳，冠绝伞画界；林永钦的花鸟、人物画享誉高；刘梦秋的“洋山水”也颇有名气。而专门盘售雨伞的商号还有潘永泰、魏大妹两家。大陆客家人迁移至台湾定居，也令中式油纸伞在台湾生根发展。油纸伞除了是挡阳遮雨的日常用品外，也是嫁娶婚俗礼仪不可或缺的物品。中国传统婚礼上，新娘出嫁下轿时，媒婆会用红色油纸伞遮着新娘以避邪。

福州的纸伞品种繁多，主要有花伞、明油伞、丝绵纸伞、蓝绿礪伞、双层花伞、绢印彩画花伞、绢印套色童伞等等，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装饰观赏效果，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中国古代文化总是对“油纸伞”寄予很多文化内涵，例如油纸伞代表多子、多福。油纸与“有子”音近；伞架为“人”字形（由几十个人

字形组成）；“伞”字从繁体字角度看，是人字头下面四个小“人”字，自古寓意为五子登科。伞骨为竹，代表长寿，寓意节节高升。伞形为圆，寓意美满、团圆、平安。此外，自古油纸伞下演绎了多少经典爱情！《白蛇传》中，许仙与白素贞在西湖断桥以红伞为媒，结下千古奇缘的佳话。戴望舒在《雨巷》一诗中描绘的“一个丁香一样的”撑着油纸伞的姑娘，韵味十足。

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便利、实惠的折叠伞的冲击下，誉为“福州三宝”之一的福州纸伞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国营的福州伞厂也于1996年宣布解散。如今，虽然福州纸伞由于工艺复杂已悄然离开繁忙紧张的都市生活，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纸伞工艺品作坊仍然坚持着传统，但它却作为一种精美的工艺品仍深受人喜爱而被欣赏和收藏。